文化百科丛书

收藏拾趣

夏红 著



文物出版社

文化百科丛书

收藏拾趣
梨园快语
雷动星流
古城追忆
兰汤沐芳
北京礼俗
天下洪洞
街巷雅趣
文化生肖
养生养气
天涯芳草
天桥碎语
六朋画事
宗臣史家
书林片叶
点睛成龙
书人书札
花信东风
琴韵流水



文化百科丛书

收藏拾趣

夏红 著

文物出版社

李賀詩集

十批判書

第一分册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责任印制　王少华
责任编辑　崔　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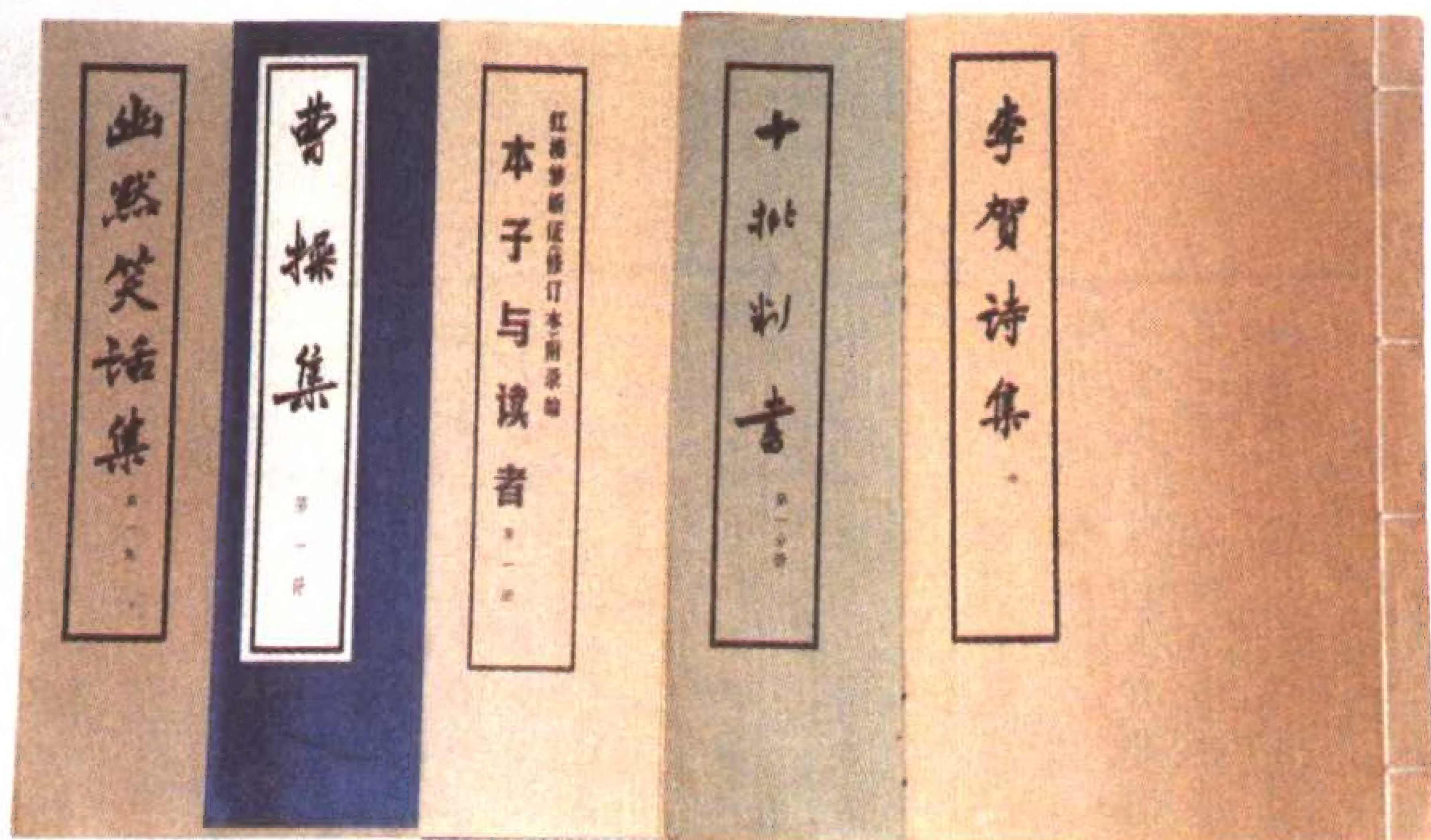
收藏拾趣／夏红编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9
（文化百科丛书）
ISBN 7－5010－1646－1

Ⅰ．收…　Ⅱ．夏…　Ⅲ．收藏-基本知识
Ⅳ．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7413 号

收　藏　拾　趣
夏　红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850×1168　1/36　印张：7⅓
2004 年 9 月第一版　200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646－1/G·104　定价：18 元



大字本五种

卢慎之给侯仁之先生的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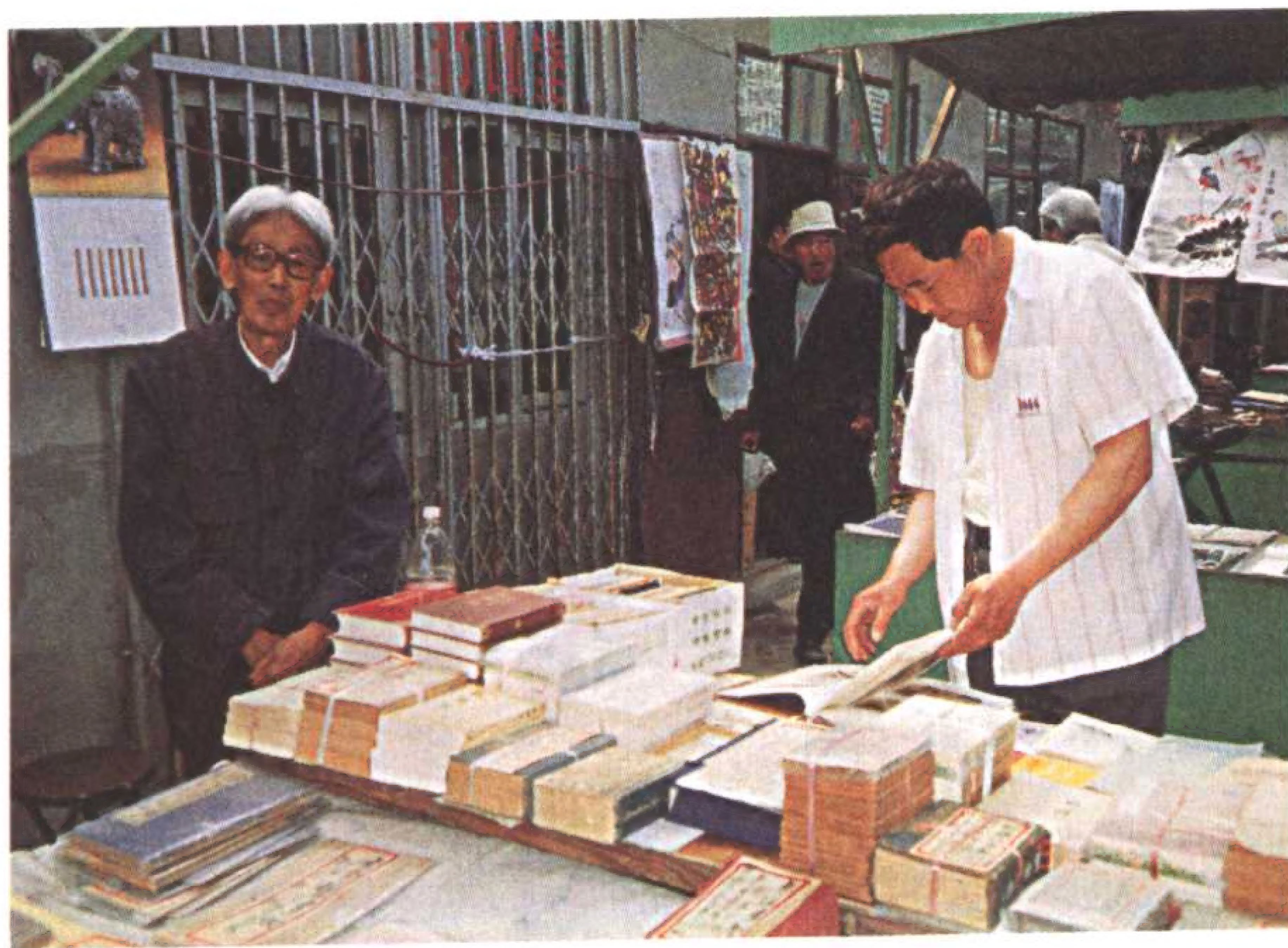


经，但是若全无一点识力、胆量、气魄，怕也是不行的——因为即使从生意经的立足点来看，也未必就能全保畅销获利〔二〕，说不定还会有蚀本的危险。在百廿回本独霸、八十回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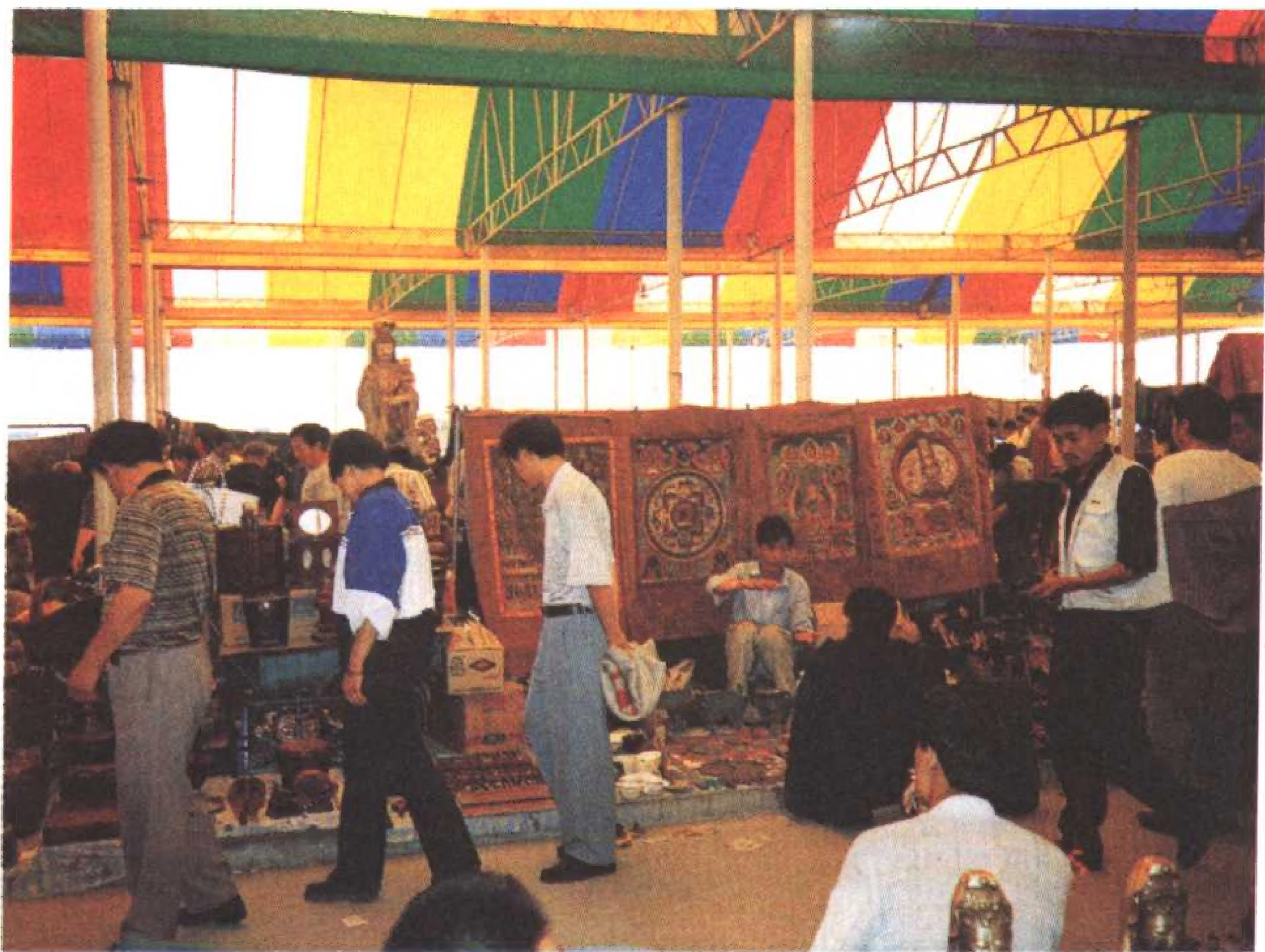
〔二〕解放后我还在东安市场旧书肆看见一批戚本的旧货底，完好如新，可见当年未必畅销。

湮埋的百数十年间，他第一个出来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有异于坊间俗本的旧钞本，实在是事非容易，他确实做了一件好事，立了首功，值得着重表扬。从打戚本印出，「红学」特别是红楼梦的板本学便开始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当然还得有其他历

大字本内页——周汝昌《红楼梦新证·附录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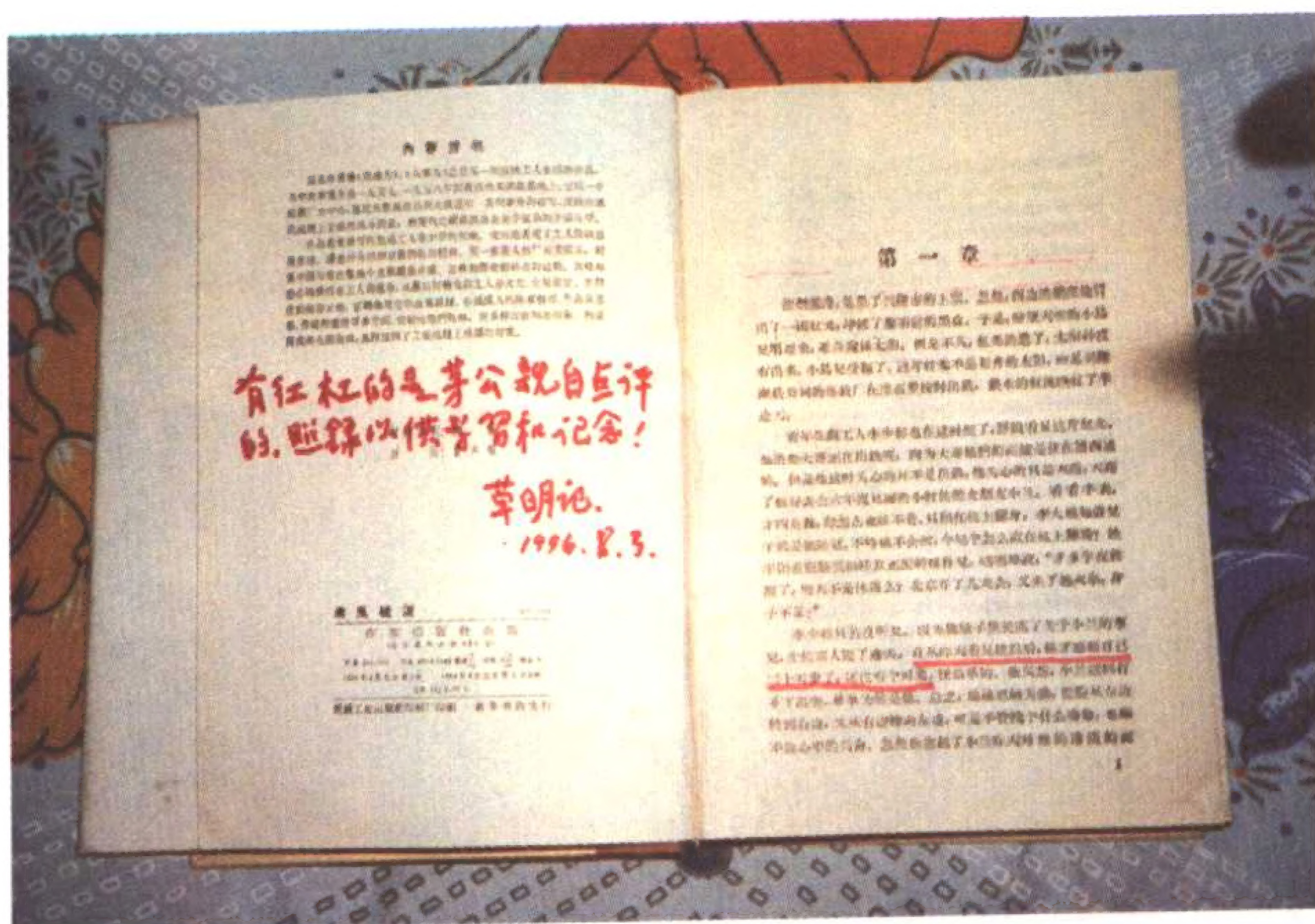
潘家园的摊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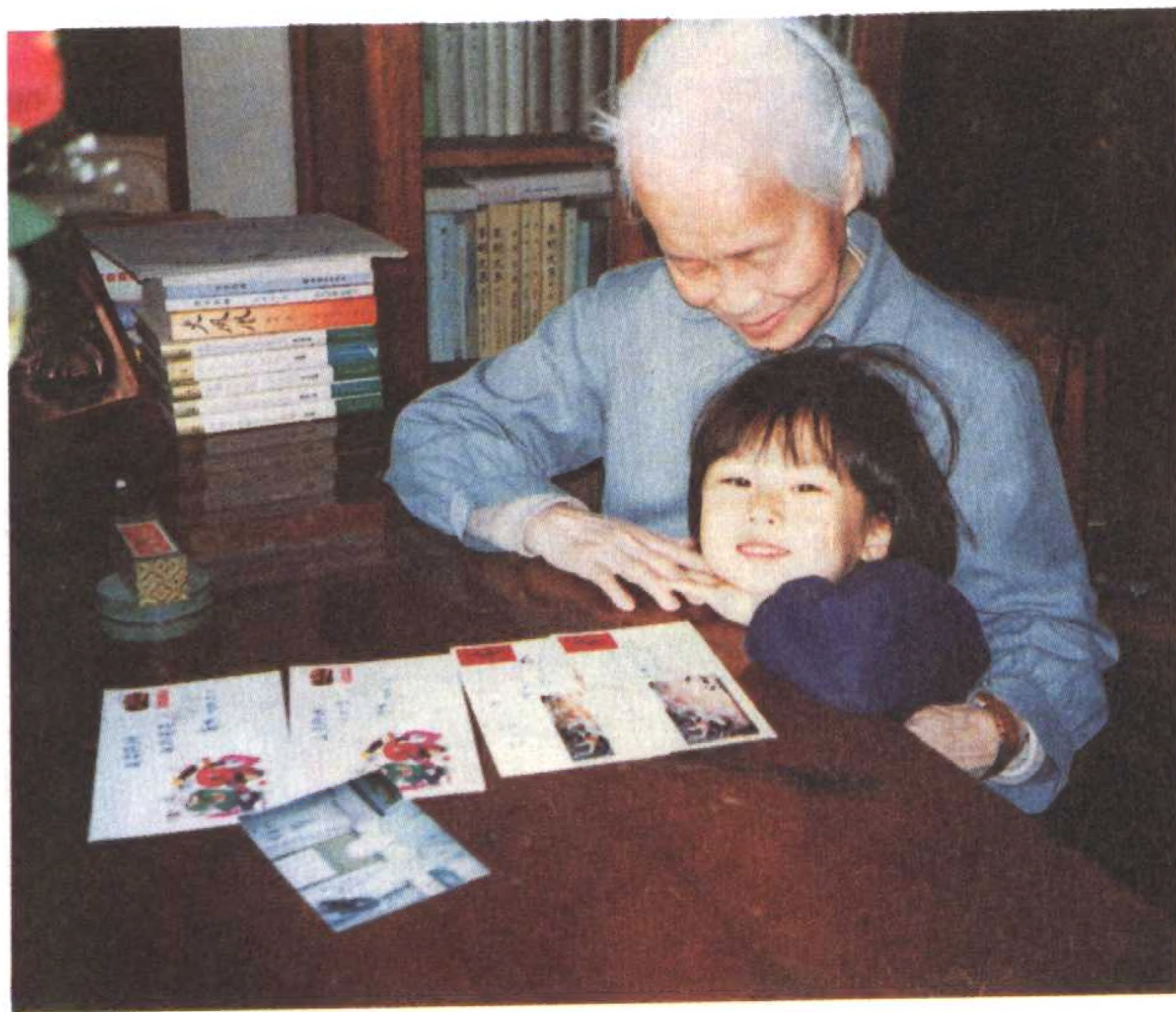
潘家园内景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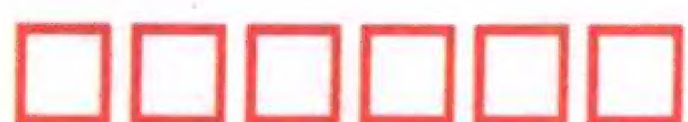
潘家园内景之二



茅公评点草明的《乘风破浪》



草明题签











草明题署的首日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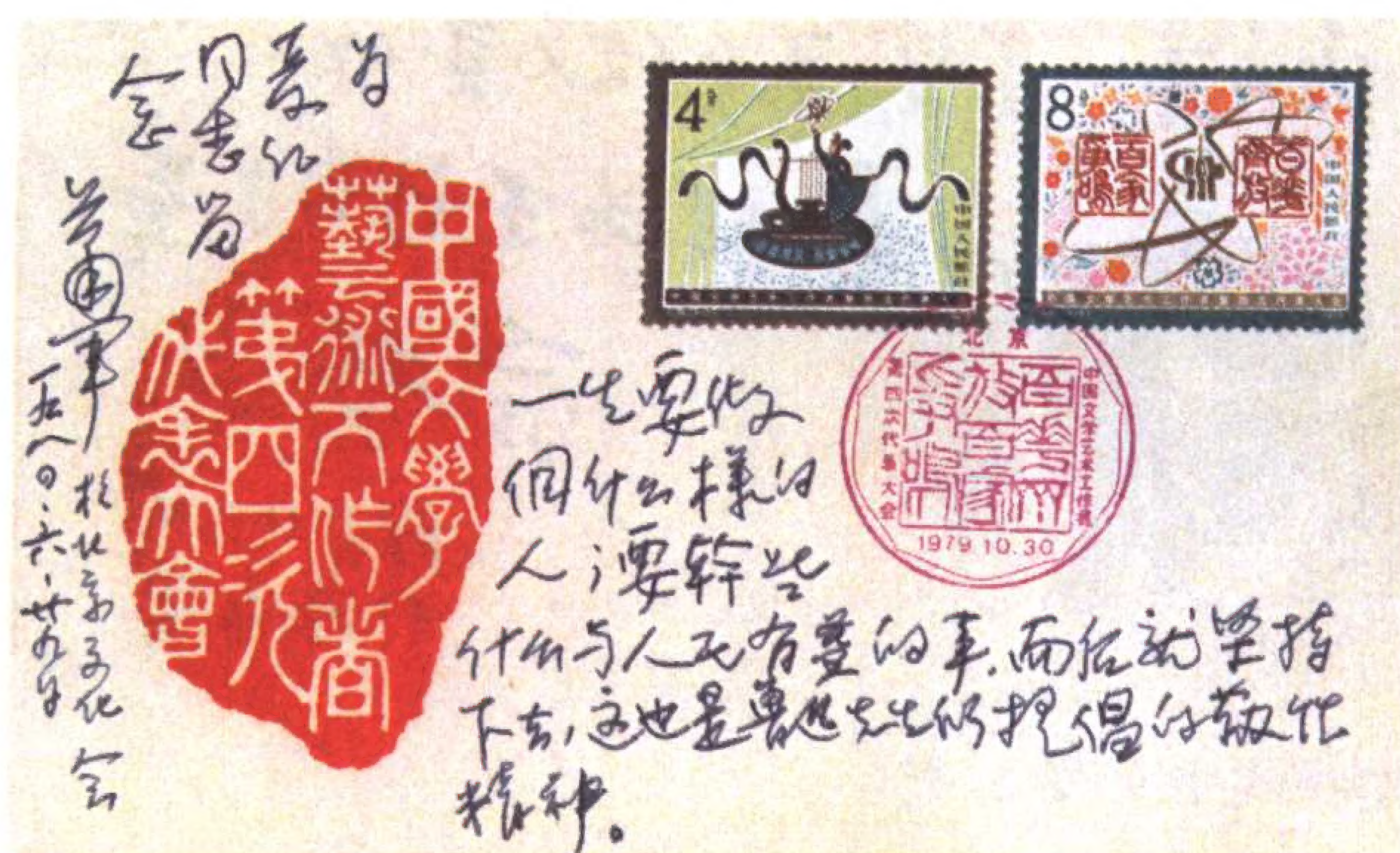




管桦题署的首日封



本书作者与侯仁之先生、夫人等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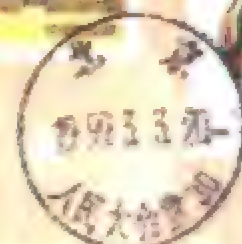
萧军题署的纪念封

1	0	0	0	2	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全国政协常委会议厅



北京东直门北大街8—803
李甡先生



北京人民大会堂 张守义

邮政编码

张守义题署的纪念封



本书作者与张守义先生在藏灯展台前

送
[illegible]

9-1

1962

刘绍棠来访简况

四月十日，刘绍棠来本会谈了他近年来的情况。

刘绍棠自1957年犯错误以后，即在北京[illegible]劳动了两年零七个月，[illegible]，劳动了一年零八个月。[illegible]。今年二月三十日摘掉了右派帽子。[illegible]

刘说，[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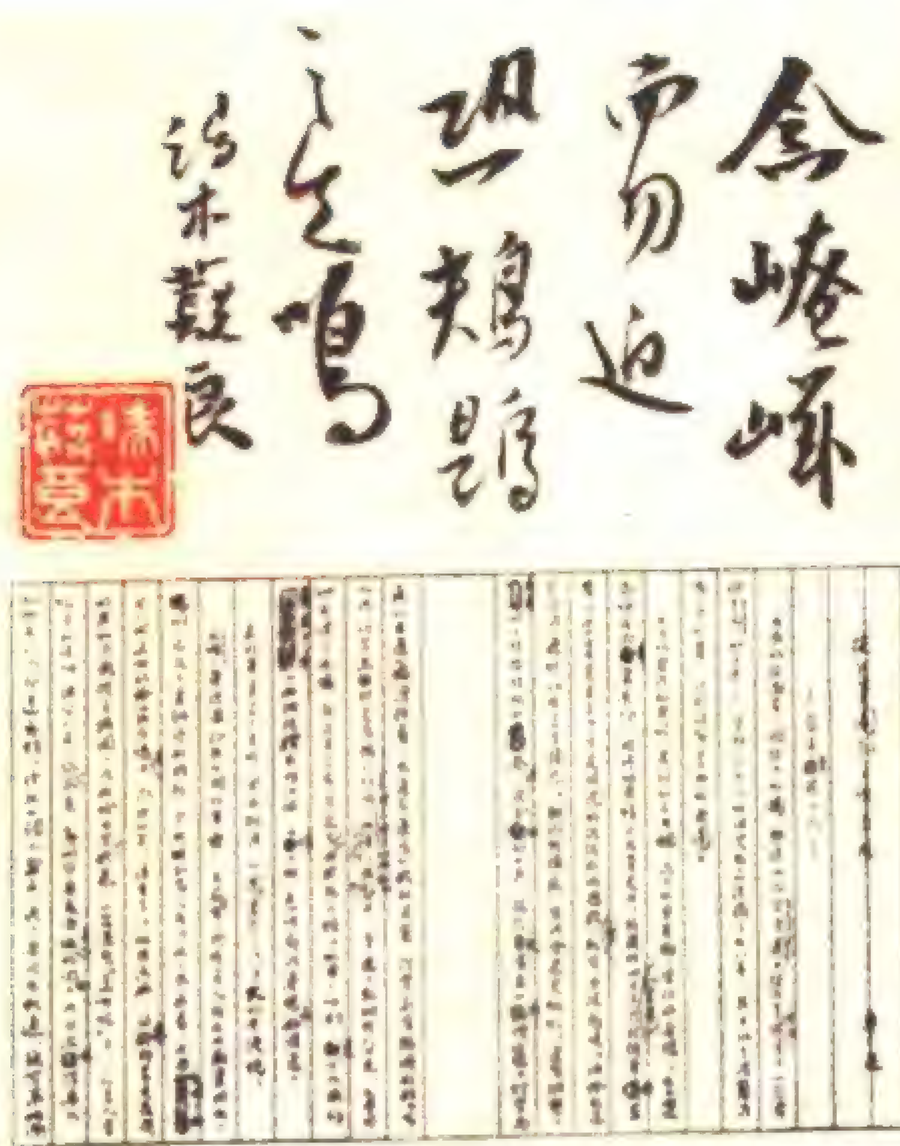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1962.4.11记

刘绍棠来访简况原稿





首日封　　F. D. C.

端木蕻良题署的首日封



端木蕻良先生和夫人

李雄学友：

近年常在报刊上读到你的文章，令人欣喜，使我回忆到你在文化大革命前写来的许多短篇小说，都是写得朴实而又充满生活气息，已表现了你的艺术功力。以后，我们共同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雨。又以后，你服从党的分配到了领导岗位，一直在工业战线，我以为，这对你的今后写作准备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对作家来说，这些年你是在真正的踏实地生活，在繁忙工作中虽不能随心所欲地有从容时间进行创作。我想，当你离休以后，一定会写出很多的短篇、中篇和长篇杰作。

问候你全家。

握手

管桦

三月十八日

管桦先生给本书作者的书信

茅公《文课》书页

郭沫若批示过的书信



徐志摩墓地的诗碑



郭沫若题郁曼陀诗碑

黄华题署的首日封

老账本内页



刘硕仁、卢天骄题署的首日封



卢天骄、刘硕仁题署的首日封





丰子恺故居——右边门上留有日军炮击的痕迹



北京百货大楼



讲解王府井古井发现的过程和保护价值



新发现的古井



台湾省台北野柳奇岩



刘硕仁、卢天骄夫妇



台湾九族文化村的图腾柱



台湾的槟榔小屋

收藏生活的乐趣

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收藏的习惯，有人说收藏是一种爱好，我却说收藏是一种本能。只不过由于人的性格、精力、喜好、财力各个方面的不同，已及周围环境的差异，所以收藏的内容不尽相同罢了。

说来说去，收藏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每个收藏者都曾为得到一件朝思暮想的收藏品，而得意忘形；也曾为展示把玩自己的收藏品而陶醉，虽然每个人所藏的具体物件不同，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整个收藏过程就是享受的过程，所以说大家收藏的都是生活的乐趣。不管收藏什么，这个人只要有这个爱好，那么他就一定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即使他目前的处境不大理想，那么他对前途也是充满信心的。我们还没有听说过一个悲观失望的人去搜集什么的。

收藏是轻松的，有的人每到一个地

方，不论什么季节，都要采集一片树叶。他把树叶夹在书里脱水，然后粘在一本册中，下面写着何时得于何地。当他年老出不了门的时候，把这些本册拿出来，一页页，一叶叶都是美好的回忆。

收藏是沉重的，有的人每次出门都要寻找石头，有时要翻山越岭，或者要在河滩里奔波。等到回家时，别人带回的是土特产，他则是大块小块的石头。到家后，爱人叨叨，孩子啼哭，他全然不顾，只是欣赏自己的收获。

收藏是紧张的，有此爱好的人，几乎没有业余时间，八小时以外，全都给了自己的事业。有的人在收藏品交易市场，一蹲就是几个小时，他要绷紧每根神经，打量每一个来人，直到天黑场散了事。等有了时间再接着来，纯粹一个守株待兔。而且都特别自信，觉乎着自己过的充实，没有一个为这个叫苦的。

收藏是放松的，有的人听着音乐，翻看自己的藏品，甭提多惬意了。他觉得这比打牌、钓鱼舒服多了。打牌有个输赢，有时不赌钱还赌气呢！钓鱼有钓上来时，还有钓不着，恨不得往下跳去摸鱼的。

收藏是死心塌地的，有的人为了一

件藏品简直到了赴汤蹈火的地步，比如收藏奇石者，屋里摆满了橱子、架子，里边都是他的宝贝，自己睡在一个很委屈的角落里，可是他天天睡得香甜。

收藏是显示机灵的，有个人告诉我他的收藏特别多，但是不占地方，而且永远也不会被人偷去。听起来像是谜语。其实，他的收藏品就是记忆。平时装在肚子里，用的时候写出来，或者说出来。高兴的时候可以一口气写几千字，遇上对脾气的，可以几个小时不住嘴，藏品可谓丰富啊！

收藏是执著的，有时特需要专业知识，并不是把东西积累到一起就完事。收藏者几乎都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很少有玩玩就收兵的。我认识一位老先生，是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分子，很早就注意收藏文物，曾被批评为“玩物丧志”，也吃了些苦头。后来，他得到一本清代收藏家陈介祺的铜镜拓片。本来这些镜子都是陈介祺本人收藏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镜子散失了。这本册页里的拓片，也杂乱无章。这位老先生，硬是把拓片按制造时代排列起来，而且给每面镜子都正了名，量了尺寸，释了铭文，把花纹特征也说得明明白白。总之，每面镜

子都有了详细的说明文字。他还写了一篇总论，把镜子的产生发展，直接功能和间接功能，都说了个一清二楚。这还不算，他还在附录部分收集了有关镜子的诗词歌赋、成语典故，真是集中国镜子文化之大全。您说，这样的收藏是不是藏出味道、藏出内涵、藏出水平来了？

后来，我们文物出版社还给他出了宣纸、线装带函套的《陈介祺藏镜》。书出来后，很受欢迎，马上再版。对了，老先生名叫辛冠洁，是我国第一任《大众日报》的主编。因为编这本书，我们还成了忘年交，不时地聚会畅谈。这不也是藏出来的乐趣吗？

收藏是无私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来，收藏几乎和捐献成了一对同义词。许多收藏者把藏品看作生命，重于子女，但是突然间做出惊人的决定，把藏品无偿地捐献出来。有的人不理解，说是树大招风，怕惹麻烦才这样做的。其实，这是十足的偏见，叫以什么人之心度君子腹来？我认识一位书法家、戏剧家杨鲁安老先生，他把多年收藏的文物8000多件，捐献给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其中碑帖、古币和印章多为精品。市政府十分重视这件事，把全国文物保

护单位清康熙和硕公主府，改建为杨鲁安藏珍馆，并聘请杨老先生为名誉馆长。文物出版社也给出了一本《杨鲁安藏珍馆藏品菁华》，在北京还举办了图书的出版座谈会。您说，收藏到这份儿上，是不是藏出滋味儿、藏出格调来了？

关于收藏还有许多说道，那真是一言难尽啊！

说说回来，本书所说的收藏，也是很有情调的。夏红先生和许多文人名士都有交往，文人间既有来往，彼此就有书信往来。或者是有些小的物件相赠，当时也许是很随意的，但是若干年后，就成了珍贵的收藏品。而这些物件的本身价值也许不高，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情意确是难以言表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夏红先生收藏的是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无形资产，那就是情感。

我们在谈到文学或者艺术时，往往说要突出个性，而夏红先生的收藏好就好在个性上，和谁的都不雷同。我们读了他关于收藏的文章，就好比跟着他去拜访那心仪已久的名人，似乎听到他的脉搏在不住地跳动。我们的心潮似乎也跟着他们的情感思潮而起伏，对于收藏也就又有了新的认识。

古人说，做学问要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其实收藏也是这样，夏红先生在许多地方留下了足迹，他的收藏就随着丰富起来，他的感情世界也就愈加开阔。在这方面，他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让我们也学着他的样子，“拾趣”于收藏中。

崔陟　甲申酷暑挥汗于红楼

目　录

收藏之乐

业余爱好收藏，时断时续，算来也廿载有余了。回过头来看看，除了收集一堆可能只有自己视为“宝贝”的破烂儿以外，还收获了不少乐趣。我珍惜后者胜于前者。这些乐趣归结有六。

一曰寻觅之乐。纵观京城的大小收藏市场，每逢双休之日，大都宾客盈门，甚至拥挤不堪。旧书摊前翻翻捡捡，古玩摊前指指点点，陶瓷摊前摩挲细看……到头来，真正买进可心之物的人并不多。但寻寻觅觅之中，却获得了很大的乐趣，不仅不觉失落，而且因为饱了眼福，反觉很是开心。人们管到旧书市场买书，不叫买书，也不叫挑书，而叫淘书。一个“淘”字，把淘书人的执著、艰辛、乐趣都囊括其中了。淘书的过程就是享乐的过程，就是在希望之路上奔波的过程，“淘尽黄沙始见金”嘛！

二曰获宝之乐。大收藏家张伯驹“变产借债”买到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因名所居为“展春园”，并自号春游主人。可以想见藏主得宝之后是何等兴奋，何等畅快！当然，一般收藏者既没有张伯驹的财力，恐怕也没有他的眼力和魄

力。对绝大多数收藏爱好者来说，自己喜爱的就是“宝”。比如我收藏的一些东西，放到商海里去衡量，可能不值几文；但我是把它们放在我的心海里，所以，任何一件我喜欢的藏品，我都视如珍宝。

三曰捡漏之乐。用大大低于藏品价值的价格买进藏品，就算是捡漏儿。因为我写过一篇《向潘家园交学费》，说的是这几年在潘家园买东西上当的故事，有朋友看了就问我，难道你就没有过捡便宜的时候吗？我想想还真有。几年前，在潘家园西院的大坑里，一个临时摊位上摆着一本线装书，是《鲁迅全集》大套书的三本散册的合订，显然是哪个有心人把校对清样凑在一起，装订起来的。印刷用的是元书纸，大号铅字。要价很低，几元钱就买了下来。我当时只是觉着这样的书新鲜而且不贵，并没有多想。待买回来一看，又做了点“调查研究”，方知这书还真的不那么一般。毛泽东主席晚年患白内障，视力严重减退，但读书的热情并未减退。为此，1972 年起，先是在上海，后来又在北京，专门建立了毛主席用书——“大字本”的印刷厂和印刷车间。字体先是四号宋体，逐渐加大，到 1975 年，由文化部统一制作了

36 磅铅字铜模，下发给京沪两地的专门印厂铸字排版印刷。开始印量极小，每种上送只五册；后来印数不断增高，但直到毛主席逝世，最多也只要上送 60 册，足可见这种书的珍稀性。四曰发现之乐。我曾在潘家园的旧书摊上觅得一册 1926 年广东大学编印的《演讲集》。集中载有沈雁冰先生在该校的演讲辞。经查，竟是茅盾先生佚文！这不仅填补了《茅盾全集》的遗缺，而且填补了茅公 1926 年去广东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空白。这一发现着实令我兴奋了好一阵子。因为茅公在我初学写作时给过我巨大的鼓励，这一发现便成了我报答茅公的一个实际行动。即使是淘宝的行家里手，也有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识的时候。视而能见且见而能识，也就是说能有所发现，那既是一种机缘，更是一种快乐！

五曰交友之乐。有几位藏友不成文约定：每获得意藏品，都不敢独享其乐。几位同好相聚一起，以藏会友，欣赏观摩，鉴别真伪，互相切磋……日积月累，友谊加深了，藏识丰富了，品位提高了。朋友的圈子越来越大，交友的乐趣也越来越多。

六曰“打眼”之乐。一些行家买主，在市场上也有打眼的时候。何况许多收藏爱好者，初学乍练，失算走眼，受骗上当，实是在所难免。据说，行家若是买了假，那是绝对不会声张的，因为丢不起人。但一般收藏爱好者则大可不必。几个藏友一起总结经验，共同记取教训，提高鉴赏能力，不亦乐乎！当然，谁若是上一当，心里总不是滋味儿，虽然也在笑着，可苦涩之味明显隐含其中。但如果看到自己一人交了学费，众友得到教益，那不亦是一件乐事吗？

当然，收藏之乐远不止此。搜求于山川河野，可以陶冶情性；徜徉于市场店铺，可以大饱眼福；浏览于展厅藏馆，可以提升鉴赏品位……收藏之乐，可谓其乐无穷！

（2003年）

潘家园观潮

京城市场多。遍观京城众多的农副产品市场、服装市场、建材市场、旧货市场……若问哪家市场人气最旺？恐怕回答是一致的：惟有潘家园旧货市场！

原本只是个自发的游击式的马路市场，京城多处都曾出现过它的踪迹。虽屡经围追堵截，封杀驱赶，但它竟如原上之草，烧之不尽，且东奔西突，顽强图存。最后，终在有识之士的安顿下，落户京城东南一隅——位于朝阳区潘家园街道办事处界内一方闲置的废墟之上。

十年发展　形势喜人

1992年始在废墟上营建市场；1994年正式挂牌成立“潘家园旧货市场”，占地20亩，摊位不到2000个。几经改造扩建，到2001年已发展为占地50亩，摊位3000多个，双休日客流平时有三四万人，高峰期可达十万人，外宾几千人。用“人流如潮，购销两旺”来形容这个市场的盛况，恐不算过分。而透过人潮与商潮，我们看到的是群众性文化收藏的热潮。在全国它建立最早，创旧货市场之先；论规模它称得上旧货市场之最。但如此规模却仍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社

会需求。

这种需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潘家园人气之旺不仅仅在于人数众多，还在于层次之广。那熙熙攘攘的人潮中，从穿着打扮看：粗衣布鞋的，西装革履的，艳丽时装的；从语言看：北京的，外地的，外国的；从年龄看：中老年居多，但青少年亦不算少，更有那扶老携幼、举家光顾者；从职业上看：普通市民，公务人员，文艺工作者——其中不乏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音乐、歌唱、戏剧、舞蹈等方面的表演艺术家；外国人中，有旅游者，外交官，连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华的第一夫人希拉里也曾带着女儿光顾这个市场，并兴致勃勃地选购了许多“旧货”。

为了改善购物环境，在市、区主要领导的直接关心支持下，去年以来，潘家园市场进行了重新规划和扩建，露天市场搬进了采光很好的四座大棚，环绕大棚的是一圈古色古香的两层门府，而且新建了有 300 个车位的地下停车场。整个市场看上去既传统又现代，既美观又实用，既保持了过去的市场特色，又大大提高了硬件水平。可以预见，全面竣工后的潘家园市场，将会吸引更多的

经营者和更多更广的收藏者、淘金者和国内外旅游者，成为首都群众性文化收藏和国内外旅游观光的一大景观。

闹市成因　耐人寻味

潘家园市场能有如此兴盛的人气和商气，绝非偶然。这一现象是很值得探讨和耐人寻味的。

市场需求，增长迅速

盛世兴收藏。虽不能说今天我们已经达到了天下太平、共同富裕的理想境界，但比之十年、二十年前，我们大多数同胞的生活是安定、富裕起来了。这既是收藏市场繁荣兴旺的物质基础，也是精神基础。试想人们如果连温饱和安全都没有保障，谁人还有心思和闲钱去搞什么文化收藏！

潘家园的人潮中，以看客居多，饱眼福，看热闹，增知识，长见识，找乐子，陶冶性情，选购商品只不过是偶尔为之；再有是收藏爱好者，这支大军不可低估，虽然高低不一，良莠不齐，但其中不乏各类藏品的收藏大家，且不少人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这支大军是支持潘家园市场"商气"的中坚力量；再就是以赢利为惟一目的的职业商贩，他们来自京城内外以至境外国外，其中不

少人是生意场上的佼佼者。每到双休日，这几路大军从四面八方涌向潘家园市场。有积极的每个双休日都是全勤，有赶早的凌晨三四点钟就进入了市场，有认真的一个不落地逐个摊位进行搜寻，更多的是走马观花，热闹热闹眼睛，至多是“赏心悦目”而已。

值得关注的是，大众性收藏仍在升温。许多过去从不涉足收藏领域的人，或因与亲朋好友交往而受到“传染”，或因多种媒体宣传诱导而产生兴趣，或因看到这个市场有较大的增值空间，或因自身文化的积淀而自然萌发了冲动——总之，由于多种偶然与必然的因素，使得他们纷纷加入到收藏的大军中来。而且这种势头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态。

藏品丰富，无奇不有

俗话说“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这里的藏品用“五花八门”都难以概括它的品种之多、门类之广。青铜、陶瓷、字画、书报、信札、拓片、地图、古墨、老纸、兵器、木器、漆器、玉石、珠宝、古装、戏衣、织锦、照片、邮票、钱币、烟标、火花、票据、量具、算具、锁钥……应有尽有，而“文革”主题的图片、书报、像章等，则已自成

一类，受到国内外收藏者青睐。

更何况这里“奇货”不断出现，新闻热点不炒自爆！例如：1997年4月，上万幅曾经参加过全国影展的摄影名家吴印咸、黄翔、石少华、陈复礼等人的作品，只用几元一斤就被一位方家买走；1998年上半年，一批从已故著名宗教界人士赵紫宸家中流失出来的胡适之、郑振铎等顶级文化名人写给陈梦家的书札，让经手的摊贩和买进的藏家着实兴奋了好一阵子！1999年从人民文学出版社流出一批当年在编印《郑振铎文集》时征集的书信，包括有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周作人等人的书札多通，被摊商居为奇货，售价颇高；1999年3月，著名藏书家刘建业只花千余元在地摊购得钤有清代礼部藏书印鉴的明刊本《十三经注疏》（缺册）；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第一夫人希拉里带着女儿参观潘家园，不仅大饱眼福，而且采购了不少“旧货”……这些信息都成了京城以至各地媒体的热门话题。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口头“新闻”亦不胫而走。比如有一位许姓收藏家，在潘家园用几年时间苦心搜求，开销近百万。不幸忽然一病不起，竟撒手西归。其遗藏被亲属

处理，大部分藏品又回到了潘家园，又分散到有兴趣的收藏者手中。像这样的“新闻”虽未经任何媒体披露，但在潘家园的摊商和常客中，几乎是尽人皆知，而且确有实证。

商贩云集，藏龙卧虎

商贩活跃了市场，市场又吸引了更多的商贩。据了解，经常在这里出摊的商家，北京人只占少数；外地商贩，不仅有来自京城周边的河北、天津、山西的，而且有的来自东北、内蒙古、青海、西藏等边远地区。

为了筹集好卖又赚钱的商品，商贩们走南闯北，深入到偏远的小村古镇；在京城则要走街串巷，跑大机关，蹲出版社，去造纸厂，访文化名人宅邸，甚至到废品收购站一泡就是一天。

商贩中有一批老的业内人士，其中不乏造诣很深的专业人才和颇有经验的书商、邮商、古玩商。有位书商，年过八旬，但精神矍铄，每双休日都出摊售书。他原是一家大出版社的职员，业余研究“红学”，且颇有修养。多年来积累大量有关“红学”的书刊资料。因年事已高，虑家中无人后继从事此项研究，便把家藏拿出奉献社会。红学界许多学

者都是他的朋友兼顾客，我就曾碰到过中国红学界知名人士在他的摊前选书和与他交谈。但多数摊商是半路出家，市场不仅养活了他们，而且把许多本没有多少文化功底更没有文学、艺术、文物知识的本地或外地市民、农民或退休职工、下岗职工，培养成了鉴赏和经营的行家里手。有位从山东农村进京打工的小伙子，几年前卖信札不论何人所作都是五元一封。记得当时他曾对顾客说，我不管是谁写的，国务院总理写的也是五块钱一封。然而，现在谈起各界名人来他如数家珍。对作家，他不仅熟知郭沫若、茅盾、老舍等大家，连八九十年代始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作家也十分了解。有个摊商，几年前随父亲在那里摆摊时，不过十四五岁。这么个农村少年，其知识和阅历可想而知。现如今，不仅长成了大小伙子，知识和经验也大有长进。用他们行里人的话说，他“玩”起字画来一门儿灵。学界有“教学相长”之说，潘家园的摊商与顾客，既是买卖关系，许多人又是朋友，经常一起切磋技艺，交流经验，沟通信息，彼此之间诚恳相待，收藏知识和鉴赏能力也互有提高。

交易灵活，购销两便

这里的所有摊点、商号一律开放式售货，所有商品一概无定价销售，卖主可以“漫天要价”，买主也可以“就地还钱”。常客们都有“侃价儿”的本领，不仅是本地人、中国人，有的洋人也很在行，就连克林顿的女儿那天在潘家园购物时，也体验了一番“侃价儿”的乐趣。不会“侃价”或不好意思杀价，其结果就可能是要么交易不成，要么造成买主吃亏。常听有人说买什么东西花了冤枉钱，买什么东西“打了眼”，但多数人说起这些“遭遇”时，往往表现得心态平和，或者带有调侃的味道，说是又交了一次“学费”。这种自由灵活的交易方式，为这个市场营造了一种宽松活泼的购物环境。

在潘家园“侃价儿”可算一景。一买一卖之间，斗知识，斗智慧，斗勇气，有时候相互之间心照不宣，有时候彼此之间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侃价儿不仅是一种经验，而且是一种艺术，一门学问。如果有人编写一本《侃价心理学》，在潘家园的买主和卖主中一定都是抢手货。当然，在成了真正朋友的摊商与客户之间，是不需要这么“斗

法”的。

社会关注，经营有术

舆论关注。可以说，没有一家市场引起过如此众多媒体的关注。不仅是首都，而且在全国，包括港澳台，媒体上有关潘家园的报道、文章经常可见。国外媒体似乎也对它情有独钟。而且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大都是潘家园的常客，写的都是亲历亲见，真情实感，读来亲切自然，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更不同于商业性广告或“软新闻”。况且，这个市场接长补短地爆出热点，让新闻界人士趋之若鹜。

邻导关心。北京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都曾亲临市场视察工作，并对潘家园市场的经营管理作过指示。朝阳区党政领导对这个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市政协委员到市场视察，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前几年关于市场动迁的意向，去年关于市场改造方案的最后敲定，都是在市、区主要领导的直接关心、参与下才得到圆满解决的。

经营有术。这主要体现在市场定位的高明，大大提高了市场号召力，使得目标顾客十分广泛，可以说是雅俗共赏，

少长咸宜，国人洋人都予积极认同。

提升品位　营造“特区”

潘家园能有今天，实属不易。当前的重头任务是提升市场品位，强化市场特色，努力创造京城文化收藏特色园区。

加强管理。目前不尽如人意处所在多有。如何防止重要文物流失；如何保护国家秘密；如何保持市场安定、安全；如何不断提高市场文化品位；如何强化文化收藏市场特色；如何为摊商和顾客提供优质服务等方面，都需要从加强管理入手，都大有文章可作。

提高素质。摊商、管理人员的素质都有待提高，而管理人员是关键。要选聘那些既懂市场经营管理，又有较高文化以至文物素质的人才担当重任。要教育摊商树立守法、诚信的观念和职业道德。许多摊商与收藏者成了好友，桥梁惟有诚信。

营造潘家园文化收藏特色小区。“潘家园”现在已成为中外驰名的品牌，在这一地区还有同样驰名、文玩商品具有一定档次的“古玩城”，专营明清家具的“兆佳市场”。如果以“潘家园”为龙头，三家积极联手，优势互补，共同打造文化收藏特色园区，把整个潘家园地区建

造成文化收藏的大市，那就可能成为京城文化产业和旅游事业的一个大亮点。

文化收藏特色园区的建设，不能靠自发自流，而必须纳入市、区规划，刻意营造。“园区”的领导体制也要创新。可以设想为：市、区领导，街道运作，企业参与。只有把行政和市场两个积极性都发挥出来，才有望成功。

（2002 年）

郭沫若手迹频频见

郭沫若，这位中国文坛的杰出诗人、学者，集文学、历史、古文字研究等诸多成就于一身，书法也独树一帜的大家，又是新中国文艺文化高层领导人，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郭老的手稿书札，甚至是一个签名，也当是十分珍贵、十分令人珍惜的。

潘家园旧货市场，不断耳闻目睹出现郭老手迹。听朋友说的不算，单我亲眼所见，就有郭老的三件批示、一篇诗稿和一篇打印文稿。尽管我一年里去这个市场也不过十来次。

1965年6月，国外一个文学杂志致函郭沫若约稿。郭老在这个约稿函中文译稿上用红铅笔批示：

“送请作协考虑。我意可请适当的同志写一篇，但不用我的名字，由我推荐。如何？

郭沫若　七、廿一日”

从这个批件上的几个旁批旁注可以知道，同一内容的约稿函也寄给了茅盾先生，茅公表示了婉谢。

郭老的又一件批示，是写在当时任职北京市文联的著名诗人王亚平致郭老

的信笺上。王亚平在信中说："有五位海上战士写成一首诗，托我转给亚洲和平会议的代表。你是该会的主要筹备人，我只有送给你了!"信尾署"七月卅日"，无纪年。估计当在一九五三年前后。

郭老在信的右侧用钢笔批示："此稿请适当处理。"签名并署"七、卅一日。"不仅字写得潇洒，而且在王写信第二天就作了批示，处理公文之迅捷，也很令人敬佩。

再一件批示是写在郭老写的题为《在理智的光辉中》诗稿上，诗稿和批示都用的毛笔：

"朱××同志，这是为'保卫和平'杂志写的诗。

郭沫若　六、十七"

诗题和署名各拉出一条红线，标示"制版"。

这首诗是歌颂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的，肯定已发表。但经向我所在的机关和首都图书馆查询，都找不到《保卫和平》杂志。据了解，该杂志主办单位早已并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但询教于友协资料室，也告无存。后来在北京图书馆才查阅到这本杂志，郭老的这首诗发表于《保卫和平》1952年6月第

13期上。

早就有人感叹，因中国历史悠久，文物遗存太多，而国人保护文物的意识又不够普及不够强烈，因而出现了用古长城砖垒猪圈的荒唐故事。其实生活里这类事情是太多太多了。古人且不论，就说当代文化名人的本该属于有关部门存档或收藏的物件，却随处可见，不仅是郭老，文艺文化界许多知名人士如茅盾、萧三、冰心、巴金、夏衍、丁玲等人士的书信、手迹、公文批示等，都时常可以见到。当然，现今中国的文化名人也的确太多了。尽管如此，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发展史上，如郭老之成就与地位者，又有几人？

值得一问的是，许多需要存档或值得长久保存的文化遗物，为什么会被当作垃圾处理？对各单位特别是文艺文化单位的文件、档案管理人员，在进行保密教育的同时，能不能也进行一些保护文化文物的教育？这些部门的领导同志，该不该也增强一些保护文化文物的意识？以免许多有价值的文化遗存散失民间或流失海外，甚至流入造纸厂的化浆池！

（1998年）

茅公佚文锋芒再现

1996年8月的一个星期六，笔者在潘家园旧货市场西院的一个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参加过中共“一大”，但后来成为大汉奸的陈公博题写的书名和签名手迹，并钤盖了手戳。这是一个大学的《演讲录》，并印有“民国十五年八月本校秘书处出版部印行”字样。

掀开封面，内容皆为铅印，目录标明，集内共收录沈雁冰等17位名流学者的演讲共22篇。

茅公的一篇，标题为《最近国际情势与中国革命策略》，注明乃“甘家馨、林一元笔记”。通篇看来，观点鲜明，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和战斗力。

首先，“演讲”宣传了在中国共产党支持影响下，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指出：“现在许多人说本党联俄，乃为枪械与卢布。这话看似好听，其实是恶意的。又有人说，本党联俄，乃为俄国已废除一切对我的不平等条约。这句话也只说到一半；其他一半，则为中国国民革命，为要求自由平等，打倒帝国主义，俄国也是如

此。既然目的相同，利害相同，故不可不联合奋斗，此即联俄其他一半的意义。”

第二，对“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反苏反共反对工农的错误主张，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批驳。指出：“如此次一班人不明了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闹到西山去开会；虽没有开得成，但总之他们是反对中山先生的联俄政策。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民族革命是要迎合世界的潮流；中山先生的政策是革命的政策，而开所谓西山会议的反对之。”更进一步指出：“有人很怀疑本党的联俄政策，甚至于为帝国主义者所利用，造出种种谣言危害本党，故我们可说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的新式工具。”

第三，在批驳国民党右派的同时，以大量的生动的事实，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特别可贵的是，“演讲”从经济角度——帝国主义争夺市场、掠夺资源、开发投资等方面，揭露了资本帝国主义内部争斗和对弱国施行经济侵略的实质。这对我们认识今日之世界，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政治冲突、军事冲突的深刻原因，也是颇有教益的。

《演讲录》刊行于 1926 年 8 月。查

阅有关资料：茅盾先生 1926 年 1 月从上海抵达广州，与恽代英、张廷灏等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担任了由毛泽东任代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1926 年 3 月 20 日，发生了国民党阴谋反共的“中山舰事件”，当月末，茅公遂离开广州返沪。

据此分析，茅公的这篇演讲，当发表在 1926 年 1 月至 3 月之间。

（演讲全文刊载于《茅盾研究》2000 年 7 期）

（2000 年）

茅盾评点《乘风破浪》

以写工厂生活而享誉文坛的老作家草明给我打电话，兴奋地告诉我：她从茅盾纪念馆借到了茅公当年阅读并评点过的《乘风破浪》。

《乘风破浪》是草明继《原动力》、《火车头》之后又一部反映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是这位女作家长期深入鞍钢挂职体验生活后的力作。我听了非常高兴，很快赶到她家，以一睹为快。

茅公批阅的《乘风破浪》是作家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大32开精装本，扉页上有“作家出版社赠”的条形印章。打开里页可以看到在许多书页上都留下了茅公的手迹，红笔道道密密麻麻，文字评点有三十几处，详批细评有十余处，足见茅公读书态度之认真和对文学事业之钟情。评点内容有褒有贬，夸赞处无过誉之词，批评处平和而有力，看上去，他是信手拈来，笔随意走，所以读来感到亲切自然，坦率中肯，很像是茅公在与作者促膝倾谈，当面指点一般。

茅公评点，有的很是简单明了，他常在一些段落旁点上一句：“此段很有意思”，“以上一段写得不坏”。有些地方则

评得十分具体，如在第 9 章结尾的空白处批道："这一章写得很好，因为在恋爱、亲子之情等方面，宋紫峰（书中主人公之一，炼钢厂厂长——作者注）的性格和他在事业方面的性格是一致的，虽然表现方式不同。"在第 13 章结尾处批道："此章写得好，从侧面写陈家骏，着墨不多，可是已把陈的性格写出轮廓来了，并且又进一步写宋紫峰、汪丽斯、吴棱枫等等，把这三个人的性格进一步刻画出来。"有些批评是严肃而中肯的，如在第 22 章处批道："许多人物都给一个圆满下场——何大姐和刘全的婚姻是其中最不必要的一桩。"

我正看得入神，草明同志说："我拿着茅公评点的书，你给我照个相吧，这很值得我纪念。"我取出相机，草明同志早已双手捧书坐在沙发上等候。尽管她已是八十有三银发满头的老人，但她当时那谦恭的姿态，那激动的神情，简直像个充满幸福与骄傲的孩童！

这不是茅公第一次评论草明的作品，早在 1949 年，草明描写工厂生活的中篇小说《原动力》问世后，曾送请茅盾先生阅正。茅公很快读过并写了一封三页纸的长信给草明，信中说："《原动力》

拜读过了，写得很好，特别因为在现在很少描写工业及工人生活的作品，所以值得珍视……《原动力》是关于这方面的第一部中篇作品，论规模和气魄它还不及《水门汀》，然而这在今天是一部好作品，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原动力》在政治上把握得正确，那是一眼就看得见。其次，它写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那也是毫无疑问的。”同时，茅公在信中指出了书中“关于描写的技术方面”的一些毛病，并列举了具体的例子。

茅公关于《原动力》给草明的信，使我联想起当年恩格斯对英国女作家哈格娜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评论。恩格斯对女作家在小说中写了纺织女工大加称赞，因为那时期世界上描写工人特别是女工的作品凤毛麟角，而且称赞作者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茅盾先生不仅关心草明和她的创作，对全国反映工业题材和工人生活的文学作品都十分关注，五、六十年代茅盾先生发表的大量作品评论和读书札记，就有不少是评论反映工厂生活和工人作家的作品，对专业作家和工人业余作者的

创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和鼓励作用。在诸多方面，我们许多同志都是受益者。

（1997 年）

李一氓手札荐文章

一九五三年三月四日，李一氓同志自布拉格致函国内有关部门，告知：二月中旬德国报刊《新德国》上发表了一篇介绍我国古代诗人屈原的文章，题为《屈原——一位伟大的中国诗人》。一氓同志并附了这篇纪念文章的译文。

李一氓同志在信中说："以后有关这类东西，当继续收集寄上。"并嘱告："搜集甚难，务望不要随便搁置，最好有一位同志负责；或先就与北京图书馆商量好，凡有这类东西寄你处时，都随时交给北京图书馆。"

李一氓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一篇和这一类文章呢？想来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众所周知，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曾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列为1953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据李一氓同志信中所附译文透露：

"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建议：于1953年庆祝下列伟大人物周年纪念——

荷兰画家凡古诞生百周年纪念；

法国名作家拉伯雷逝世四百周年纪念；

中国爱国诗人屈原二千二百周年纪

念；

波兰天文学家哥伯尼逝世四百十周年纪念；

美国哲学家爱默生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纪念。”

尽管五位伟大人物排序如此，但接着即可见到文章作者、编者对屈原的态度不同一般。文章写道：“关于这些伟大人物的生平，我们将作简短的报道，以飨读者。今天首先介绍中国诗人屈原。”

五位世界级文化名人屈原居首作介绍，是理所当然的。单从历史之悠久来说，屈原出生距当时已两千二百年，而晚于屈原早于其他三位的拉伯雷，逝世只有四百周年，两位相距一千七百多年。一位死去两千多年的诗人，至今被中国人民如敬神般怀念和纪念，又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足见其文化影响力是多么巨大呵！

从译文看出，文章作者对屈原和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独特方式，了解是很多的，有些细节写得绘声绘色：“每年中国人民在扬子江中举行龙舟竞赛，以示庆祝。人们把龙舟装饰得五颜六色，在河中驶来驶去。人们吃着粽子——把糯米包在芦苇叶里面煮熟了的食物，穿着

花花绿绿的衣服，在龙舟上表演各种玩艺儿。若是问他们，为什么庆祝这个节日，他们就会这样回答说：我们庆祝是为了纪念屈原。屈原对在封建国王统治下把中国变成一个幸福的国家已经绝望，就投在江里死了。”作者把屈原的爱国热忱和中国人民对屈原的挚爱，写得多么生动而逼真呵！

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新德国》这一举措确实值得重视。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期间，美国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对中国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封锁，妄想孤立中国，进而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在这样的时刻，世界和平理事会建议纪念屈原，《新德国》报载文宣传屈原，这对打破帝国主义封锁，向世界宣传新中国，都具有重大意义。

李一氓同志不仅是一位老革命家，而且称得上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名人。他早年从事革命文学活动，曾主编左联刊物《巴尔底山》；建国后虽公务繁忙，公余仍从事中国古代典籍和金石书画研究，主要编著有《花间集校后记及补记》、《宋本杜工部草堂诗选》、《一氓题跋集》等。他的个人素质和他的工作决定了他必然十分重视国外对中国文化的宣传，

因此，他力主收集和保存这类信息，且身体力行，并提出了交由北京图书馆专门保管的建议。

很可惜，从事情的发展看来，李一氓同志的建议并未被完全采纳，不然，这封信和这篇译文，就不会出现在潘家园市场的旧货摊上了，当然我也就无缘与他们见面了！笔者认为，李一氓同志的主张，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查，1953年最后决定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与《新德国》所说建议人选有了变化，我国邮电部1953年12月30日发行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邮票可为佐证。这套邮票共四枚，各枚邮票的名称是："中国诗人屈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作家拉伯雷"、"古巴作家马蒂"。比原建议少了凡高和爱默生，增加了荷塞·马蒂。

（1998年）

与侯仁之先生的书信缘

在潘家园收集到一封历史学家卢慎之先生 1961 年写给著名史地学家侯仁之教授的信札。文字不多但内涵丰富，读来深为两位文化老人交好之深、情谊之笃所感动。信札全文如下：

仁之同志：

九月二十六日大札早已收到。孙君彬如日昨来，谈及贵体情形。我有好友赵以诚大夫，脑系专科，中外知名，未知执事来津就医，系赵君诊治否？至念至念。承孙君与执事美意，感谢！孙君云，我于贫字，或不甚合。不知执事于十七年前为我奔走，卖书与孙君，救我一条生命。此乃道义之交，不贫何以至此。生平不肯叫穷，偶因孙君忆及，执事便中告知孙君，可一笑也！专颂健康！

卢慎之手启　时年八十六

一九六一年国庆节后三日

读后我很想拜见侯先生，一是因为这是一封散失的信，如果侯先生需要，我愿它完璧归赵；二是我对信中提到的关于侯、孙、卢三位间卖书筹款治病救人的情结很感兴趣。于是，在我的朋友

侯先生过去的学生康奉先生陪同下，前往北京大学燕南园登门拜访了侯先生。

侯先生在简朴的客厅里接待了我们。那间客厅只有一张三人沙发，是专为客人落座的，侯先生则习惯地坐在沙发对面的木椅上，侯先生的夫人张玮瑛老师也坐下来和我们一起交谈。朋友替我说明了来意，我恭恭敬敬地把信札呈展在先生面前。侯先生看见不知何时散失的这封故友旧简显得十分兴奋，说："太好啦！我正在写一篇文章，内容与这封信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接着便滔滔不绝地说起了信中提到的侯先生与卢、孙两位多年前的那件往事。

那是1944年的事。侯先生当时在天津任教，卢先生因患重病需要手术但一时手中无钱，便托请侯先生将藏书卖掉以做医用。侯先生因自家财力有限而爱莫能助，便转向好友天津私营企业家孙冰如求援。孙先生问明情由，慷慨陈言："你问卢治病所需多少，我如数照付就是了；至于那些藏书，还是请卢先生自己留存为好，因为你们都是读书人，我只是个生意人，书对于你们比对我重要得多。"

侯先生将孙先生的美意转达给卢先

生，不想卢先生竟表示："如果孙先生不肯要书，我是宁肯不去治病，也绝不要钱！"

这可难坏了侯先生。为解卢先生治病的燃眉之急，侯先生接过孙先生的钱转送给卢，又和两位学生一起，用排子车把卢先生的书运出来，暂时存放在岳父家里。新中国成立前三天，侯先生去英国进修归来之后，便将存书悉数捐赠给了中国科学院历史所……

当时，侯先生是带着浓重的感情色彩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故事里的那人、那事、那情、那景，渐渐地都在那页静止的书札上浮动起来，活灵活现在我的眼前；而且，仿佛它饱含着一种至真至爱至善至美的力，冲击着我的脑海，冲击着我的心灵！

我再次表示要将信札赠还。侯先生诚恳地说，你这么喜欢它，还是你收藏着比我保存着好。

临别时，先生赠给我一本图文并茂且中英文对照的《燕园史话》，还在扉页上题写了热情的文字：

"李甡同志为我珍藏不幸散失之书简，感激之情难以言喻。检得拙作旧书一册，敢以相赠，用作纪念。

仁之

1998年10月28日燕南园”

侯先生写完题字，高兴地对坐在一旁的张老师说：“你看啊，我今天能够写出小字儿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的确，写在签名之后的那行落款，只有五号铅字大小！

已入深秋，近晚更觉凉风侵人，但侯先生挚意送我们到户外。他用力握着我的手说：“我写那篇文章一定要把你和这封信也写进去！”

（2002年）

名人书札的文化含量

有的朋友知道我喜欢收集文化名人信札，不解地说：有那时间还不如多买几本书读！我说：不然！文化名人的有些书信，一封信比一篇一般化的文章甚至于一本书，其文化含量要厚重得多！道理很简单，文化名人是有文化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们都具有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知识和成就，他们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理念，他们大都具有独立见解，而书信又往往是亲朋好友间自由交流思想感情的重要载体，如此说来，文化名人信札不是很值得我们收集、赏读和研究吗？

我有位朋友是个杂家，搞理论，喜收藏，亦擅写杂文。80年代初，他曾寄信给写过大量讽刺诗和杂文的刘征先生，陈述自己关于杂文的看法并征求刘先生对杂文的高见。刘先生复信说："尊文拜读，我完全赞同你的意见。"接下来便生动地阐述了自己对杂文的主张："杂文，是个怪物，要叫它蕃衍滋长，一要当局不排斥它（谢天谢地，现在已好多了），二要它'怪得好'。这方面则在作者。忌肤浅，务深沉；忌窳陋，务丰腴；忌一

本正经，务幽默。苏轼有言曰：文如流水行云，行其所当行，止其所不可不止。行云流水四字，用于写杂文，再妙不过了。”真是言简意赅，畅快淋漓，切中杂文通弊又点明了写好杂文的要诀。

近年来，刘征先生在古体诗词的创作和普及上也做了大量工作。他创作的旧体长诗《红豆颂》获得了大奖赛一等奖，一时轰动了诗词界。他在北京诗词学会举办的讲座上讲授的《唐诗明白如话》，给众多的诗词爱好者特别是初学者以极大的鼓舞。

笔者也曾得到过刘征先生的一封书札，随信还赠我一帧先生的行书墨宝，写的是先生自作迎香港回归诗一首。诗句情真意切，字字潇洒自如，精神抖擞。信中仅用了一句话谈书法：“时人书习，多狂怪，我则不然。”但短短的11个字，却把书界当时存在的浮华与浮躁的风习，一语道破；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为书之道。

书信随短，但文化含量丰厚，从刘征先生的几封信札不正可见一斑吗？

（2003年）

刘绍棠那“凄凉一刻”

在潘家园的一个摊位上见到一堆发黄的废纸，翻捡中意外地发现有一件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室整理的“刘绍棠来访简况”手写原件。访谈时间是1962年4月10日，整理“简况”的时间是4月11日。这个“简况”记录了刘绍棠1957年被错划右派以后的生存状态和当时的心境，看后令人心酸不已。于是便把它买了回来。

今年春节前，我去和平门宿舍拜访刘绍棠，曾向他谈起此事，并说准备复印一份送他存作资料。不想，他像是没有听见一般，未作任何回应，还是侃侃而谈他的创作，谈他对北京老工人作者的关心，还高兴地为我题写了一帧册页，题赠我一本他出版的近作，并请他夫人为我们照了合影。时隔不久，绍棠同志便与世长辞了！复印件当然也无法再送给他。

“简况”是根据刘绍棠来访自述整理而成的。天头上有两位当时中国作协领导人“圈阅”的标记，但未加任何批语。

“简况”首先记述的是刘绍棠被划右派以后的劳改情况：刘“……自1957年

犯错误后，即在公安局领导下去农村劳动了两年零七个月，后去木材厂劳动了一年零八个月。和他一起劳动的都是五类分子，因此管理较严格，强调法纪”。——这一段文字说明，这一时期，刘绍棠是作为“专政对象”与“地富反坏右”一起进行着名副其实的劳动改造式的“劳动”！

对如此极不公正的待遇，刘绍棠抱何态度呢？“简况”写道；“开始劳动时，因不愿和这些人（指“五类分子”）在一起，有抵触情绪。后看到有两批右派分子摘掉帽子，思想上有转变。”——这该是多么痛苦与屈辱的“转变”！

“简况”载：刘“现在很想工作，但不想职业化”。为此，他曾写信给当时的团中央负责人胡耀邦。胡耀邦同志约他4月11日去谈话。胡耀邦同志过去曾要求他每半年写一封信给他，但刘绍棠没有写，“因觉已犯错误了，没什么可写的。”记得《北京晚报》曾发表过一篇刘绍棠的短文，记述胡耀邦当年如何关心他的成长，但是否涉及此事，我已记不清了。

“简况”还记述了刘绍棠在劳改期间学习与写作的情况：“刘在下边将近四

年，很少看到《人民日报》，仅看了一些小说，《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等都看过。也断断续续写了80万字的长篇初稿，主要是写些冀东对殷汝耕斗争的。”可见绍棠在逆境中并未沉沦，而仍在努力学习，努力写作。那80万字初稿，当即是后来公开出版的《地火》、《春草》、《狼烟》。上海研究刘绍棠作品的专家栾保俊在一篇文章中曾描述过刘绍棠那时的境况：“他相信党不会忘记他，在农村连张写字桌都没有的‘鬼宅’里，读写不辍，写出了《地火》、《春草》、《狼烟》三部长篇小说。”

那次“访谈”距今35年了。当年，刘绍棠作为“神童作家”被打成右派可能是全国亿万人都知道的事件，但刘绍棠在被错划右派以后的境遇，却很少有人披露。刘绍棠本人对此更是若无其事一般。阅读“简况”，我不禁想起杰出的奥地利作家兼收藏家茨威格（1881—1942）说过的一句话：“我收藏的贝多芬的遗物，至少可以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一生中那最凄凉的一刻——这是世界上没有一家博物馆所能提供的。”写到这里，我也想说，我从潘家园收集到的这一纸“简况”，不仅可以让人们看到刘绍

棠一生中那最凄凉的一刻，而且从中可以看到刘绍棠同志对事业的忠贞不渝和他的博大胸怀！

（1997年）

春节得赠书小记

今年春节，让我好生高兴。节日期间和节前节后，陆陆续续收到多位作家赠赐大作，放在一起厚厚一摞，竟有十多部！

钟耀群女士先后赠我两部。一部是她和曹革成编辑的《端木蕻良作品评论集》，一部是她亲自撰写的《端木与萧红》。关于端木与萧红的恋情与婚事，过去人们褒贬不一，常有微词。钟耀群新著把端木对萧红的挚情挚爱，写得真切感人，这对消除过去的某些传言和误解，也肯定会有益处。

老作家草明，笔耕六十载，坚持以工厂生活为题材，以颂扬工人阶级为己任。我见过文坛泰斗郭沫若、茅盾在读过草明的第一部中篇《原动力》后写给她的书信，评价很高；也读过茅公阅批过的草明著《乘风破浪》的珍本。我书柜中藏有草明同志亲笔题赠的《神州儿女》。这些长篇巨制都是以工厂生活为背景，以工人阶级优秀分子为主人公的。草明为何能六十年如一日坚持写工厂写工人？春节前她赠我的新著《世纪风云中跋涉》的前言，概要回答了我这个问

题：那是与“我所处的时代、生长环境和党对我的教育与指引分不开的”。

老作家管桦陆续出版了六部文集，先后都送给了我。春节期间又通过凤翔兄带送我一册《管桦作品评论集》（集中收入了我的两篇小文），读后对管桦其人其作有了更深的了解，增添了更多的敬慕。

早听说出版了已故著名诗人田间的书信集，但京城内外遍寻不得。去年收集到一封田间写于六十年代初的信札，便复印了送给田间夫人葛文同志，想同时求赠一本书信集。不想葛文同志告：书信集虽已编就多日，但至今尚无处出版。她送我一本《田间诗文集（第六卷）》，内中也收有书信若干。更可珍贵的是葛文同志题签后又在扉页上钤盖了两方田间印宝：一方是椭圆形名章，一枚是刻有一名一人一车一马暗喻田间长诗《赶车传》的方章。

多年沉寂文坛的王慧敏和谭谊同志，都曾在北京的文艺部门担任领导工作，过去在岗时忙于公务，很少动笔。离休后却闲里更忙，创作上大获丰收。王慧敏同志“抗战八年”，写作出版了长篇《战地黄花》；谭谊同志以古稀之年顽强拚搏，写作出版了长篇《安魂吟》。这两

位为许多在岗时想写作而又因工作重担不得不放弃“大部头”的离退休老同志，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北京杂文学会在北京日报社召开理事会时，老会长胡昭衡、高扬同志各送与会者一本他们的杂文集。胡昭衡同志在讲话中曾说：“盛世也需要危言”，我深受启迪，便请胡老即席在他的书上题写了这句话。

著名儿童文学女作家葛翠琳，寄赠我一部第五届冰心儿童图书新作获奖作品集，一部她的作品和评论集《童话梦》。书中有冰心老人的一帧墨宝，对这位颇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的王路遥，赠我的儿童文学作品《王冠的秘密》，属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著选粹丛书”系列，当然也很值得我珍爱。

女作家舒丽珍多年勤奋写作，成绩不菲。近日又出版了《艺苑趣话》，四十几篇文章，描述了五六十位当代著名作家艺术家鲜为人知的轶闻趣事，读来饶有兴味。长期工作、生活在京郊延庆的孟广臣寄赠我他的第二部小说集《在长城那边》；一直工作在编辑部里的阵容，送我诗集《此情绵绵》，那是他用“乡

情、友情、恋情，组成生活一个个精彩而优美的图案”。孟广臣、阵容两位，作品都如作者一样，热情而质朴。一凡赠我《通惠魂》，文笔流畅，也是他忙于《北京工人》杂志编务之余的辛苦之作。这本书是应一凡之命，由我题写的书名，对我来说，当然更觉着亲切。

已经到了正月廿二，北京工人老作家在老舍茶馆聚会，以汇报写作成果的形式纪念北京工人老作家联谊活动三周年。老诗人禾波的女儿特意赶到会上，送给我和几位文友诗人新作《似水流年》(上下集)，同时告诉我禾波同志不幸于两天前病逝，二月二十日将举行告别仪式。我把这个噩耗报告给当时在座的文友，并动员大家届时去八宝山向禾波同志告别。而那天我却因公务缠身没能为禾波送行，留下了不小的遗憾。

我平生爱书且喜收藏，尤其是作者题签书更令我珍爱。这十多本著作，无一例外地都有作家题字签名，有的还钤盖了印章。短短月余，收到这么丰厚的珍贵礼物，怎不叫人兴奋？这显示了：牛年里，作家们勤耕细作收获大；预示着：虎年里，文艺园地更加欣欣向荣！

（1998 年）

新春斗室读藏书

窗外雪花飞舞，室内春花竞放。春节休假，得暇斗室，翻捡家中藏书，竟体味到了另一种“家书抵万金”的滋味。吟读条条格言隽语，句句诗词楹联，随读随想随记，共得五则。“老”话虽多却饱蕴新意，文笔虽杂并非乱而无章，不揣浅薄，捧献读者，权作新春小礼矣！

一

为了首都人民的利益，北京市颁布法规禁止在市区和部分近郊地区燃放烟花爆竹。今年春节，除夕夜的北京街衢的确没有往年“热闹”，但室内兰花水仙正开，灯光烛影互映，节日气氛显得更浓。望着烛花的耀动，我默默地诵读着：

“做人也要像蜡烛一样，在有限的一生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温暖。”（肖楚女）

“我情愿变成一支两头燃烧的蜡，照耀人们前进！”（卢森堡）

“人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我不能腐朽，我愿意燃烧起来。”（奥斯特洛夫斯基）

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奉献精神，这就是牺牲精神！这种精神在革命年代

需要，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同样需要。在这种精神面前，那种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处事哲学的人，还能有地自容吗？

二

旧时过春节，供奉神佛是许多家庭必不可少的活动。而今虽不兴礼佛拜神，但佛教文化的兴盛却不亚于过去。许多庙宇的匾额楹联，或翻新，或重写，常有妙语连珠、寓意深刻之作。

众佛中慈眉善目的乃大多数，但如弥勒之朴实无华、平易近人者，却也实在不多。在许多供奉着弥勒的殿堂内都可见挂有措词大同小异的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慈颜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真是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当然，神佛也有严厉的，板着面孔还不够，更要让做坏事的人吃一顿棒喝、出一身冷汗。贵阳的城隍庙里挂有一联，幽默中带有警告，严斥中又含着劝诫：

“站着！你背地做些什么？好大胆还来瞒我！

想下！俺这里轻饶哪个？快回头莫去害人！”

这哪里是楹联，简直是挂在城隍殿

堂上时时发出振聋发聩之响的警世钟！

三

由神而想到鬼。世间本没有鬼，鬼都是人造的。造鬼之大师，无高过蒲松龄者，有郭沫若先生赞语为证：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

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著名书画大家吴作人先生为山东淄博蒲氏故居的题联，更把鬼与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说得十分透彻：

“岂有真鬼狐，前贤形此箴世；

安得装妖冶，后代剥它画皮。”

可悲的是，把前贤“箴世”之作当成“耳边风”的大有人在，不然怎会有林彪、“四人帮”者流跳出来充当反面教员，任人们“剥它画皮”呢？

四

许多格言谚语都写了春，表达了对春的无限赞美。但我对哲人们关于惜春的告诫却更为钟情。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感叹：“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爱国名将岳飞则警示人们“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可见，珍惜时光，珍重生命，珍爱事业，古人已经深谙其理。近代俄国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

有一段近似谜语而又充满哲理的话更是耐人寻味：

“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

当然，在这一类格言中，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关于人生的一段自白，当是最能给人以启迪的：“生命属于人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这段曾经在五六十年代使千千万万中国青年为之倾倒的话，历经风雨几十年，至今读起来仍然那样令人怦然心动！这说明具有崇高思想内涵的语言，不仅可以跨越国界，而且可以跨越时间；甚或可以说，它是永恒的！

五

唐朝诗人张若虚的长诗《春江花月夜》，几乎句句嵌有诗题中的一个字。而我写这几小段文字却不能时时紧扣春的主题。自责之际，忽然想到少年读书时

老师常常爱讲的一句话，倒也嵌着一个“春”字，那就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呵，立春过了，春节到了，春天来了。我们该用什么去迎接和塑造春天呢？对此，你欣赏哪一则关于春的格言？抑或你在春天里，用行动或思维也创造出一则关于春的的格言来！

（1994年春节）

雷加赠书

老作家雷加同志送我一本不久前出版的《半月随笔二集》，是中国文联“晚霞文库”系列中的一部。我已记不清这是雷加同志送我的第几本他的著作了。读着这书，倒使我忆起了与雷加关于书的一些情结。

大概是1970年的一天，雷加同志给我打电话，说他有些书要处理，让我去他家挑选我需要的送我。我当晚下班即骑车前往。进屋门一看，像是正“清仓查库”的样子，满地满桌堆的都是书。墙角有几只大箱子，有的已经装得满满的，也是书。见我来了，雷加同志说：你随便挑吧，喜欢哪册拿哪册，要多少就拿多少，不然明天中国书店就来拉走了！说话时，他的情绪是郁郁的。

开始我有点欣喜若狂，又有点眼花缭乱。因为当时的图书馆已经关闭，新华书店里除了鲁迅著作，其他文学作品几乎都下了架。但翻来拣去，我只选了几本便迟疑了。不是我不喜欢，更不是不需要，而是实在有点于心不忍。这倒不是怕占他的便宜，因为当时中国书店收购这些书，一公斤不过七分钱而已。

我想的是，一位作家，是在怎样复杂的心境下才肯把经年集藏的心爱的书卖掉呢？是对扼杀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的抗议，还是为不要作家也不要文学的反常现象而沮丧？我不好问他，但也无心再挑选，便拣了几本认为以后可能不会再印也难以读到的带走了，里边有《郁达夫日记》、莫泊桑的《羊脂球》等。

1972年初，我在机关图书馆看到了一个“开放书目”。其中有雷加五十年代初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即《春天来到了鸭绿江》、《蓝色青冈林》、《站在最前列》，便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正在房山县石楼公社下放劳动的雷加同志。很快收到他的回信，开头便说：“接来信，十分高兴。因为……开放书目，可比拟为解放干部。在整个文学长河中，为解放初期保存下来几部文艺作品，这是我们党的文艺工作者所切盼的吧！这样，你我都应该为之庆祝。因此，我急切地希望知道，除我那三本之外，就我们熟悉的人来说，还有些什么保存下来的？望抽暇示知。”

我记不得是否马上给他复了信，但不久又接到他的来信，告我：“在县里开党员干部会，有机会到宣传站，看到首

都图书馆的开放目录，其中文学部分大约有150种。”然后便开列了满满两页共28位当代知名作家的六十来部作品目录，还开列了几位外国作家的作品，有高尔基、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

粉碎“四人帮”后，雷加送我的第一本书是多人合集《我站在毛主席纪念堂前》。这本书中收入了他的一篇散文新作。从他亲自把书送到我办公的机关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对发表这篇作品是多么的重视。是啊，从老作品被开禁，到新作品得以发表，这对当时的作家来说，确不是件小事情。

1994年4月，应我请求雷加同志开列了一张从1938年到1990年他创作发表的著作目录，如同前述抄录开放书目的情况一样，他写了密密麻麻两页信笺。这时他已年近八旬。我想这也许该是他因年迈而停笔的岁月了。但他没有这样做。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又出版了《半月随笔》、《半月随笔二集》，而且整理发表了前几年草成的中篇小说《三门峡工地》。

鲁迅先生曾说：我倘能生存，我仍要学习。雷加同志则用行动向我们昭示：我倘能生存，我仍要写作。

人们应该活到老学到老。雷加则是活到老写到老，他的艺术生命与他的寿命是共存的。

（1997 年）

雷加的书单

一

在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读到了老作家雷加同志一篇《短论小辑》。那诗一样的语言，句句打动着我的心：

“生活并不是平凡的，它像海洋一样深邃。关键是要真正投身到生活的海洋中去。去认识它，体验它，挖掘它。”

“一个作家永远不会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生活。”

“生活领域越宽越好，这是生活的深度所要求的。”……

毫无疑问，许多有成就的作家对生活都是视如宝藏的。雷加对生活的感情之浓烈，追求之执著，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大约在七八年前，北京市文联在新侨饭店召开一个小会，雷加和曹禺同志都与会在座。交谈中，曹禺问雷加最近在忙什么，雷加兴致勃勃地说：“我刚从黄河三门峡回来，正打算写点什么。”曹禺同志马上双眸闪亮，嗓门儿也加大了，说：“好！哪天我去你家拜访，请你给我讲讲三门峡见闻。”雷加说：“不，不，我去你家看你，你给我个联系

电话。”曹禺同志上下衣兜摸了个遍，摇头说：“忘记带名片了。”于是，曹禺同志在我送给雷加的那张名片上写下了：“曹禺，复外……电话……”

在曹禺埋头写通讯地址的时候，雷加兴奋地指着曹禺对我说：“你看见了吗？这就是作家！”可能见我有点不解，又补充说：“听到生活，神经马上就高度兴奋起来了！”我理解，对生活充满激情，这是作家特有的本能。雷加形容曹禺的这句话，不也正是他自己的写照吗。

散会后，我向雷加要过曹禺同志写了姓名地址电话的名片，把字照抄在我的另一张名片上交给雷加。他不解地看着我说：“那一张……”我说：“对不起，这张我收藏了！”

二

在最近召开的北京市第十届二次人代会上，我又遇到雷加同志。当我问及他生括与创作的历程时，他为我开列了一张“清单”——

1938～1939 年在冀中平原半年，写了《一支三八式》、《王冠的宝石》等一组小说和特写；1942 年在绥德下乡，写了《揽羊人》、《沉默的黑怀德》等一组陕北风情小说；1945～1950 年在东北一

家造纸厂工作，创作长篇小说《潜力》三部曲；1956 年去洛阳拖拉机厂……1958 年去玉门、克拉玛依油田，写了《三八钻井队》和《记王进喜》；1962 年去云南横断山脉参加综合考察，写了一集《冰斗与大川》……1982 年去长山列岛、漠河，写了一组北疆特写；1984 年安康大水后前去采访，写了《百年一遇手记》；1988 年后三次去胜利油田……1990 年前后三次去东北垦区，写了《大地温暖》、《母与女》……

以上各条，当然是我摘选的，因为如实按“清单”抄录，版面就占得太多了。但不能不说，尽管这是择其要而抄之，同样可以把它们看成是雷加创作的实践记录，也是前述雷加《短论小辑》的有力注释。

今年的北京市人代会，代表分了三个驻地。主会场在京丰宾馆，我和雷加同志同住燕丰宾馆。虽然两馆相距不算很远，但每次大会都要集体乘车往返。第一天大会后，雷加就对我说：“我真后悔没带来我的自行车!”我听了一怔。他已是七十九岁高龄的老人了，居然还敢骑自行车，居然还能骑自行车!

无论是从文学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生

活的角度，我都不能不由衷地对这位典型的关东大汉的脚力表示钦佩！

（1994 年）

书外觅情

潘家园市场东西两院，共有上百家旧书摊。书分古今，手抄线装皆可见；报有大小，“文革”小报备受青睐；期刊杂志，不管新老，创刊号最为抢手。

我则对书上题签最感兴趣，每每遇到，便不想放过。因为读书之外，品味欣赏书上题签，也别有一番情趣。

前不久，曾购得几位著名作家签名题赠给一位也是著名作家的作品。看来是因为这位受赠作家已经辞世，所藏书籍便被当作废物处理了。其中有本萧军先生题赠的著作《吴越春秋史话》，扉页上赫然写着“1981年3月3日萧军敬赠”几个苍劲有力的墨笔字，并钤有阴文名章。签名和钤印，与套色封面所印完全一致，使得这本书真个是锦上添花。尤其是我有幸曾亲见过萧军先生的音容笑貌，睹书思人，更觉亲切非常。

有些书不仅有签名，还有识记。有一本名为《殉情》的五幕八场剧本，是据席勒名作《阴谋与爱情》改编，而且改编得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剧中人物有“北京政府内阁总理”、“内阁总理的书记”等，主要人物是“陆军部参议

范定南”，即“内阁总理”的公子。这个剧本至少已经过两人之手，因为一个题记写道：“这是名剧《阴谋与爱情》改编而成，从旧书摊上得来，似是为一个演员所用过。”这个题记当是从另一题记而来：“在这个时机里，我决定了把它演出，以资永恒的纪念。”署名“钱龙”。从剧本内容看，凡属主人公范定南的对白，都标了阿拉伯数字的序号，幕启幕落，一共有“定南”的台词 183 段。此书因破损缺页，出版时间无考，推断可能在二三十年代，据说有人正撰写北京话剧史，不知是否知晓有这么个本子，这个本子在何时何地演出过，主要演员钱龙又是何许人也？

还有一本上海骆驼书店 1946 年出版的译作《相持》，有名“孟信”者，题记也很耐人寻味：“仿佛是一头牛，用自己的乳汁，换来自己的食粮。这虽然得不着满足的喜悦，但会得着收获的慰藉。去啊，孩子！用你的精神结晶，换取你精神的食粮吧！”并特别注明：“以稿费买书后记。”读着这题记，我仿佛看到，一名文学青年用辛勤笔耕的报酬买得这本书后的喜悦、快慰、奋发之情，仍在已经发黄的书页上喷涌！

还曾购得四卷《毛泽东选集》精装本，其中一、二卷上有中国留苏学生的题字。从名字和字迹判断，当是一位女性。她写道："1953 年 1 月在苏联萨哈托夫收到祖国寄来的《毛泽东选集》，感激又兴奋，结论只有一个：祖国要我好好学习，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字句朴实无华，但生动地反映出当时远在苏联的中国学子对祖国的眷恋之心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渴求之情。

（1996 年）

北京工人创作现源头

近日在旧书摊上淘书，偶得一张老报纸。读后惊喜地发现，北京的工人创作，竟是伴随着北京的新生而兴起的。

这是出版于1949年4月2日的一张8开4版《北平解放报》。这一张是5—8版，其中第6版是文艺副刊。副刊上共发表九篇（首）短文和诗歌，而其中五篇（首）是出自工厂作者手笔！他们欢庆翻身解放，欢唱当家作主，赞扬人民解放军，歌颂领袖毛主席，情真意切，时隔近五十个年头，读来仍很感人。

五篇工人作品中有三首诗歌。登在头条的是一首题为《给毛主席》的诗，署名石景山发电厂工人李兰亭。诗中表达了对毛主席的热爱之情，也表达了发电工人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听说你来了，/我们高高地举起手来，/……/用成绩，/迎接你的来临。/白天，/你到街上去看看，/所有工厂的马达，/都隆隆地响着，/不会因为没有电而停止。/晚上，/你到街上去瞧瞧，/只要是有电灯的地方，/都照得通明。……”

再一首是石景山发电厂运行股李树

泉作的《发电厂解放进行曲》，表达了以实际行动欢庆解放的激情："一九四八胜利年，/解放军解放了石景山，/他为人民来服务，/呼儿嘿哟，/无产阶级把身翻。/职工一齐翻了身，/大家的责任要认清，/团结努力多做工，/呼儿嘿哟，/保障北平不停电……"

另一首《劳军歌》，署名石景山钢铁厂电力厂德平。诗中表达了钢铁工人与解放军血肉相连的深情和以搞好生产建设支援解放全中国的决心。

两篇短文，一篇题为《开火车的不是骡马了》，作者是"北京车站火车房"的"进城"，很像是个笔名，文字不长，但把解放前铁路工人受国民党兵痞欺压虐待的情状描写得淋漓尽致，抒发了铁路工人翻身得解放以后的欢快心情。

另一篇《母亲和弟弟》，署名石景山发电所赵瑞，似是位女作者。文章以母亲对女儿述说的方式，讲述了母亲去部队探望新参军的弟弟的经过，把当时解放军军营生活描写得生动活泼，官兵之间、士兵之间亲如兄弟。看了之后，你会由衷赞叹：这样的军队，怎能不打胜仗！

看到这张报纸，我仿佛找到了北京

工人文学创作的源头。这些工人作品，有力地证明：北京的工人创作，是伴随着北平的解放而兴起的；同时也证明，工人文学创作，始终是与国家的命运，工人阶级的命运，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许可以说，这正是北京工人创作的传统和主流。

至五六十年代，北京工人创作形成高潮，工人创作队伍浩浩荡荡，出现了一批在首都以至全国都很有影响的作品和作者。“文革”十年，这支队伍没有被摧垮，并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重整旗鼓。短短三年时间，这支三十几人的骨干队伍，已经出版了几十部“大部头”作品，发表了千余篇（首）文章和诗歌。更令人鼓舞的是，文学新人不断涌现。去年，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里举办的北京工人文学创作研修班，有几十人获得结业证书，出版了作品集；近日，第二期研修班已经开课，报名入学者多达160人。

从北平解放至现在，北京工人文学创作队伍的出现和成长发展，反复证明着一条真理：工人文学事业的繁荣，是与生产力的解放和国家的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可以预见，伴随着祖国和首都

的改革、发展、稳定，北京市的工人文学事业一定会呈现出更加繁荣的景象！

（1998 年）

一幅特殊年代的地图

我在潘家园市场买到一幅已经皱折残破的地图，确切地说，是一张刊印着地图的“文革”小报——《地图战报》。

“文革”初期，被“革命”搞昏了头搞热了脑的人们，觉着不搞它个天翻地覆便不算彻底革命，于是乎乱箭齐发，“革命”的口号震天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革命”的矛头“所向披靡”，就连街名、地名、店名以至人名，都成了革命的对象。这张《地图战报》就是这场“革命”的真实记录。

《地图战报》是出版地图的权威部门——地图出版社编印出版，当然，也是以“革命”的名义——小报上标明，出版者是“工代会地图出版社革命委员会地图战报编辑组”。战报8开双面套红印刷。正面印着毛主席着军装在天安门检阅照，毛主席语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地图两幅，一幅北京市全图，一幅北京市城区街道图。那“城区街道图”就是经过了“革命”的，编者特意在图上方开列了一张单子，标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破旧名立新名战果表之一”，下

边开列的名单包括：“破旧名”共69条街道，经过“革命”和撤并，“立新名”52个。其中，“革命”色彩特别浓重的有：张自忠路和地安门东大街路合并易名工农兵东大街，白石桥路、中关村路、海淀路南段合并易名文革路，景山东街、景山后街东段合并易名代代红路，东交民巷易名反帝路，东扬威街因为有前苏联大使馆，易名反修路；公园名被破旧立新的五个：北海公园易名工农兵公园，景山公园易名红卫兵公园，颐和园易名首都人民公园，陶然亭易名劳动人民公园，日坛公园易名向阳公园；此外，还有一个市场（东安市场易名东风市场），一个剧场（天桥剧场易名红卫兵剧场），一个体育场（先农坛体育场易名工农兵体育场）。

这场易名革命无异于一场闹剧。但闹剧所以能够上演，有时还很叫座儿，总有它内在的“合理”性。多少年来，社会生活中有些人有些事，只要一以“革命”的名义出现，人们便容易接受或容易被迫接受，尽管许多人并不真的以为那是在革命。

曾记否，“文革”中不少人出于一种激情或迫于形势，对自己的名字也革起

命来，凡与“封资修”沾点边的，便常被改掉，再涂以革命的颜色。一时间，“卫东”、“卫彪”、“卫青”满天飞；但曾几何时，多数又不得不改了回来。“批林批孔”时，沾孔孟字眼儿的不少人也起来革命了，于是“尊孔”便改成“批孔”，学孟改成“斗孟”，似乎这就能与孔孟之道彻底决裂了。然而，也有革不到的地方，尽管批判孔孟之风那么轰轰烈烈，也还没见有哪位姓孔的改姓“批孔”，姓孟的改姓“批孟”，不然百家姓里又要生出两个新的复姓来了。

历史是公正而严肃的。新不新是要受历史来检验的。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才算是新事物，否则，不论以“革命”的名义还是“破旧立新”的名义，那“新”也是立不起来的。历史有情也无情。“文革”初期的这场闹剧没演多久即告谢幕，也足证明了这一点。这段革地名的命的历史尽管短暂，但实在应该写入北京的地名志。

（1998年）

老账本上的吉祥语

过去，工商企业多设账房，如同现今的会计科、财务处，掌管着企业的财务进出。解放前夕，我进过一个小公司的账房，墙上挂着一个木牌，称“水牌”。上面用墨笔记着临时的来往账目，数字既不是一般的汉字，也不是阿拉伯数字，而是一种专门用来记账用的数字符号，业内人士称为“苏州码”。地上放着一只大钱柜，锁着很大的一把铁锁。钱柜上贴着一张斗方红纸，上书“黄金万两”四字巧妙组合而成的一个组字。这个组字与“招财进宝”组字，是过去每到春节在许多店铺里常见的。近几年，这些几乎绝迹了的老话儿，又出现了，而且金粉印刷的、大红剪纸的，在年货市场上都可以见到。想来也是，国有也好，民营也罢，谁不希望盈利发财呢?

我收集到一册老账本，方知吉祥语不仅贴在店铺的墙上柜上，而且在账册里也随处可见。这是一家建店于清光绪十八年的粮店的一本资本账，记录了从1919年到1949年一段的历年总资本账。封面上冠名“万年鸿账”，显然寄托着店主们永世发财的美好愿望。立账日期不

写具体，只属“民国八年己未新正月吉日立”。但翻开账本第一页，有一篇“立另订万年账”的“证言”，却披露出这家老店经营不擅的惨淡境况，实在并不美妙！曰：“缘本号于前清光绪十八年开张，经营二十余载，逐渐亏累，无法续作，原有资本仅余一百元。于是共同议定，即以所剩之百元作为本号固本资本，另由公义局七十五元，刘云卿二十元，又共出浮存公义局一千七百二十五元，刘云卿浮存五百七十五元，一俟生意恢复原状，再行撤出。事出两愿，各无反悔。恐后无凭，特立此账为证。”后面写有四位“中见人”的名字、立账的日期，而且没忘写上吉语：“民国八年新正月初六日吉立　财连金城”。

此后诸年，一年一结，分存洋、债权、余利、按股分利各项。从账面文字看，每年都是正月初六立账，在日期之后写上一句吉祥语，而且内容不断变化出新，如“财连金城”、“财崇五岳”、“日进斗金”、“财发万金”、“利达三江”、“财连银汉”、“招财进宝”、“利市仙官”等，没有一年漏写。在盈利一栏，前面还加上一句：“天赐余利”。在股东股本和余利栏内，从始至终都列有“财神”

若干股，分利若干元。这笔钱从哪里来，最终又到哪里去，我至今没有搞清。据说有一种可能，就是作为行贿或打点各方面“关系”的专项用款。

且不说经营好坏，单从这本账簿历年所贴印花税票来看，从最初的“京兆”、“北平”，到后来的“民国印花”，直到1949年初的民国印花一百元改值“人民政府批准改值五元”，无一年漏贴。看来，这家老店虽然经营不擅，但至少是个完税户。

（2003年）

端木赠菊

大约是1978年冬天，我和文化界的一位朋友去虎坊桥小白楼拜访老作家端木蕻良。才坐定，瞥见两只沙发中间的茶几旁的墙壁上，贴有端木亲笔写的一个纸条，上书："时间宝贵，谈话请尽量缩短。"我一时有点尴尬。但因为几年不见面了，端木和我及同去的朋友似乎都有些话题想说，于是，虽然我时刻记挂着纸条上文字的提醒，但还是在那里耽搁了一些时间。

几年以后，1981年国庆节的第二天上午，我再次去小白楼拜访。到了端木家门口，我却又踟蹰了。这不单是因为记起了上次来访所见的字条，而且今天又见到他家的单元门上，贴了一张"告示"，大意是"上午不会客，来客来访请下午三点以后"。这无异于吃了个"闭门羹"。我不知端木家还有这些"禁忌"，来得真有点后悔。可转念一想，今天还是节日期间，会客时间理当破例。于是，重又鼓起勇气，连声叩门。我随女主人钟耀群同志进了屋门，见端木正伏案写作。本来就很狭小的房间里，桌上案上凳子上全是书稿。钟耀群的桌子也铺着

稿纸。察言观色看形势，显然两位都正在埋头笔耕之中。

我不解地说：“你们难道连国庆节也不给自己放两天假吗?”

端木只是呵呵一笑。钟耀群心直口快，说：“我们哪里有工夫休假，赶还怕赶不及呢!”

一看一听，我重又后悔起来，两位老同志如此珍惜时间，我怎好意思无端打扰，于是提出告辞。端木热情挽留，说：“你好久不来了，来了不能不坐坐就走。”当我稍坐片刻再次表示告辞时，端木说要送我一张他新作的国画。说着就从书柜上面取下一卷，从中选出一幅如同国庆晚会上施放的礼花一样绚丽多彩的“菊花”，并挥笔题写了六十一个字。从题字内容我才知晓这是端木头天夜里即“国庆夜灯下……为贺中华振兴”而作。一卷画，有十来幅，昨夜可曾画到几时？会不会已是金鸡唱晓、旭日临窗方才住笔呀!

后来，我便很少到端木蕻良家登门造访，主要是怕耽误他们的宝贵时间。但平时，还是偶有书信往还。来信有的是端木亲书，有的是夫人执笔。而十多年来，几乎每封信都是说他们正在“赶

制”《曹雪芹》。从上卷到中卷到目前正在写作中的下卷，他们始终在“赶”。一个“赶”字，包含了多少辛苦，多少憧憬，多少奉献精神！曹雪芹写《石头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端木蕻良写《曹雪芹》，则是“赶制十年”。而且，据钟耀群同志告诉我，从1978年起笔《曹雪芹》至今，在“赶制”《曹》著的同时，端木还写作发表了七百余篇近百万字的诗词、散文、杂谈、评论、序跋等。可见，作家是以怎样一种姿态在和时间赛跑呵！

今年春节，端木刚从中日友好医院出来，我往西坝河东里去探望兼拜年。端木精神蛮好，只是腿脚不如先前稳健了，屋里走路亦需拄杖。其时，室外正漫天雪花飞舞。端木望着窗外，情绪极佳，提议钟耀群为我们照个合影，并且高兴地说：“九十年代第一春，很有纪念意义。”我说：“是呵，而且恰逢瑞雪兆丰年！”

不久，耀群同志寄我一信，附有合影彩照，并一帧端木赠我的诗文墨宝，上写：“春风昨度玉门关，万马奔腾属马年；岁月峥嵘同历遍，琼花玉树满前川。”

我反复吟诵欣赏，被老作家这样奔腾激越、乐观豪放的诗情所鼓舞，虽自知不通韵律，但仍诌出四七二十八个打油打水一样的文字来，寄奉端木和耀群同志求正：“香河园里楼门关，老骥伏枥战正酣；流水高山共一曲，雪芹三唱千古篇。”

称“千古”并非单指著作而言。我感到，老作家这种锲而不舍、韧性顽强的可贵精神，确是我们中华民族流传千古且会万代流传下去的宝贵财富。

我还珍藏有在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端木题赠给我的纪念鲁迅的邮票首日封，上面题写的是鲁迅先生集屈原《离骚》诗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主题又是惜阴。爱惜光阴，或许已成了作家时时刻刻心之所想，体之所行吧！看来，端木蕻良之所以几十年著作丰厚，且能至老而文思不衰，笔耕不辍，珍惜光阴乃是一大能源。其实，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哪一个又不是惜阴胜金呢！

（1990年）

端木新春试笔

端木蕻良先生走了，他是带着美好的憧憬而去的！

今年春节前，端木脑血栓复发住院，我到中日友好医院去探望。他虽坐在轮椅上，但情绪乐观放达；他虽说话吐字尚不够清晰，但仍是谈笑风生。

一段时间来，我一直担心《曹雪芹》下卷会因为端木身体状况不佳而辍笔。尽管有与他朝夕相依相伴的夫人钟耀群全力相助，但毕竟端木是第一主笔。我不止一次地向他们建议：把其他的“文债”全部推掉，集中精力“突击”《曹雪芹》下卷。那天在医院，我又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并且半认真半玩笑地说：我离退休已经不远了，那时候，我帮你们抄稿子！端木听了呵呵大笑，拱手说：“不敢当！不敢当！”

端木先生对我的文学创作一直十分关心。八十年代初，我刚刚恢复文学创作活动，发了两篇小文章，端木知道后马上给我写信说：“最令我高兴的是你又拿起笔写东西了！这是最可贵的。中国不是作家多了，而是少了，你生活积累是厚的，但愿你把它用笔表现出来……”

字里行间对我寄予很大鼓励和期望。在同一封信里，端木还对我国木偶戏的发展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他写道："前几天看电视，看了葛翠琳的《安徒生童话》，我认为剧情、对白、道具、角色创造都好。我国的木偶戏在世界上应该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应该大力提倡，应该大力发扬。"那天在医院，他又问起我的写作打算，我说，我在工厂生活了十几年，在机关工作了近三十年。过去一直写工厂，以后也想写写"官场"，写写"官场"里的真善美，假恶丑，是是非非……端木听了显得很兴奋，说：这类题材写的人不多，歌颂美的，揭露丑的，很有意义。你若写这类题材的书，我帮你抄稿子！先生这几句亦庄亦谐的话语，饱含着关心我创作的深意。

我看端木的精神很好，便请他为我和我的一位收藏界朋友各题一枚贺年明信片。他给我题的是："鼠年大丰收，大吉大利"，给我朋友题的是："鼠年大吉大利"，在"鼠年"之后还特意括上一句："我的本命年。"很显然，他是在祝福别人，也是在祝福自己。

夫人钟耀群一直站在身旁欣赏着端木写字，并且高兴地说："新年以来，端

木还是头一次动笔呢!”端木得意地说:“真是!”于是又在给我题字的明信片上添了一句“新春试笔”。从题字看,端木先生当时思维清晰,笔力劲健,全不像是患了脑血栓的病人和已八十有三的老人!

我衷心地祝他早日康复,体健笔健。但病魔实在残酷无情,终于没有让他安然度过他的“本命年”!端木蕻良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永远的乐观大度、奋争不息,对明天总是充满美好的憧憬。

(1996年)

踏雪访竹

庚午新正，瑞雪连连。我踏着马年的头场晨雪，叩开了老作家管桦的家门。

管桦同志和夫人李婉都很热情，在不算宽敞的客厅里，以芦柑和香茶待我。

管桦谈兴极浓。李婉一直在座，并不时插话。我们的叙谈称得上是海阔天空！

老作家管桦是位很有正义感的人。他对那些是非不分、善恶不辨的人，是不愿与之为友的。李婉就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位求画者，好话连篇求墨竹，管桦就是不肯赠予。为何如此呢？皆因管桦了解此公是个缺少正义感的人。我听了很是感动。我想，竹子本是“未出土时便有节”的高贵物，如果连是非善恶都分辨不清，他与竹子还有何缘！

说起画竹，李婉问我：“管桦给你画过了吗？”

我说：“在去年初的市文代会上，管桦同志当面允诺要给我……”

管桦忙认真地说：“那是一定的！我最近画了几张，咱们去选……”

管桦之小说、诗歌，文艺界和读者早有定评，在作家头衔上冠以“老”和

“名”该是当之无愧的；而近年，他的墨竹画作，亦已遐迩闻名。但管桦其人，总是风格依旧，质朴无华，乡音不改，“老传统”在他身上真是何其多也！

我随管桦走进画家自命的“苍青馆”——一间肯定不到十平方米的小画室。一张画案，摆着笔墨、宣纸、画稿，满满的，没有些许空处；四壁也少空闲，挂的是裱过或未经装裱的丹青水墨，以竹为多，也有两幅梅花，一用墨，一着彩，却也和他的竹子一样，挺拔伟岸，别具精神。

管桦打开一卷已经作好的墨竹，有七、八幅，任我选择。我从中选出一幅不大不小，以我之外行眼光认为是最上乘的佳作。那画面上两棵青竹，一很粗，一次粗，但同样茁壮挺拔，同样雄姿勃发。虽然画面有干无根，但让你感到它必是植根于深深泥土之中；画面只有大叶几片，但让你看到，那画面以外，似有参天的繁枝密叶……读画上题诗，更是激昂动人，道是“高竹临巨浪，风雷吼声急。枝立飞雨中，叶闪电光里。内心何平静，默然寂无声。”

“我喜欢这一幅！”我说。管桦端详一下：“你喜欢就好！”李婉在旁则说：

"你有眼力，这一幅是管桦很喜欢的！"于是，管桦蘸墨挥笔，题字补款……

画还未及装裱，正挂在我的书房兼客厅兼卧室里，每每伫立"清赏"（管桦题画语），常生奇想：人们爱说"文如其人"，但不见有谓"画如其人"者。因为画虎者不一定必有虎之强悍，画牡丹者更不一定有牡丹之富贵荣华。但我却觉得，管桦当属例外：管桦画竹，画亦如其人！

（1990年）

管桦题句

去年春月到西坝河拜访管桦。他正伏案笔耕，告诉我是在为孩子们写作，他要把许多神话传说编写给孩子们看，为的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听了内心赞叹：好可贵的童心！那天他写的是关于女娲补天的故事。我们从古代神话传说谈到今天的儿童教育，真是上下几千年，纵横千万里。临别时，我请管桦同志给我写几个字。他稍加思索，展开宣纸，挥笔写出："清茶待宾客，笑语谈古今。"这两句正是当时情境的生动写照。

时隔一年，管桦同志派人送来一本管桦签名题赠的书，是他出版的儿童作品集《童话神话传说》。我翻开目录一看，不禁惊呼：印出来了？好快！那开头一组"童话集"里，就有我去年在他家看他正写的那一篇《女娲妈妈》。许多童话故事虽然通过各种渠道早已广泛流传，但管桦赋予每篇故事以新意，又是专为孩子而作，所以其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可读性就大大不同了。

管桦早在1948年，就发表了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叫《小英雄雨来》。《人民日报》发表后很快被选进了学生课本。

周立波同志对这篇小说大加赞扬，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短篇”，并且鼓励作者把雨来的故事写成中篇或长篇小说给孩子们看。管桦很受鼓舞，1955 年就改写成中篇，好几个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为了给孩子们写作，管桦操起了诸多兵器，童话、神话、小说、散文、诗歌，各种体裁一起上。

作家的心与孩子们的心是相通的。他曾在本作品集中的《〈小英雄雨来〉的命运》一文中说：“我认为，文学艺术应该使人纯洁、善良、勇敢、正直、高尚起来，并给人以美感。为儿童写的作品更应如此，因为孩子们的心灵是纯洁的。文学作品应该创造出一种真、善、美的灵魂世界，使读者自愿来漫游，得到对于现实世界生活意义的理解，并激发起创造真、善、美的世界的热情。”我觉得，这是作者为孩子们写作的一篇“宣言”，有了这“宣言”，作者才能几十年保持童心不泯，才会有如此丰厚的献给孩子们的优质精神食粮！

（1997 年）

萧军先生题签记

1980年6月，继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之后，北京市召开第四次文代会。代表驻地和会场设在当时的北京市第四招待所，即现在的大都饭店。

那时，萧军先生刚刚复出文坛，不少人尊敬地戏称他是“出土文物”。会议期间，许多代表晚上都回家居住，萧军先生却每天都住在招待所。我与他住对门，所以经常见面。

一天晚上吃完饭，我见萧军先生穿着一件肥大的白色毛巾睡袍，闲坐室内饮茶，便走进屋去拜访，主要是想请他为我的一枚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邮票首日封题字签名。

我还没作自我介绍，萧军先生就指着我的代表证件说：“你怎么起了个女人的名字?”我听了一愣，说：“红字也不是女人专用的呀，顾正红不就是大丈夫吗?”萧军先生忙说：“是啊，是啊!”后来我才意识到，他可能是联想到萧红，才有此问。

我把首日封捧到他面前，请求说：“萧军同志，这是一枚全国文代会的纪念信封，请您给我题上几句话吧!”萧军先

生接过信封，很是欣赏，看了一阵才说："写什么呢?"我说："随您的意。写您的人生体验，创作甘苦，或者对我个人写几句教诲的话……"他把信封铺在写字台上，沉思片刻，痛快地说："好!"于是便信笔疾书起来。就像他早有所思似的，笔走龙蛇，挥洒自如。我生怕那信封空白地方太小而限制了他的思绪，便说："整个信封，除去邮票上以外，都可以写字，那方大印章上写了也不要紧。"萧军先生却说："别，还是要保持它的艺术完整性。"于是，萧军先生那漂亮有力的钢笔题字，错落有致地填满了信封的空白处，与印在封面上的红色印章、邮戳和两枚邮票，组成了一件和谐完美的艺术品。

萧军先生的题字是："一生要做个什么样的人，要干些什么与人民有益的事，而后就坚持下去，这也是鲁迅先生所提倡的韧性精神。

为夏红同志留念　萧军于北京文代会·一九八〇、六、廿九日"

看着这题字，我脑际忽然闪出一个盘旋日久但一直未曾找出答案的问题，便顺口向萧军先生提了出来。我说；"我有一个不大理解的问题向您请教。"萧军

先生和蔼地问："什么问题？提！"我说："当年在上海追随鲁迅先生的文化人，建国以后怎么一个一个大多陆续垮掉了？"

这一问不打紧，萧军那舒展的双眉骤然拧成了两个大疙瘩，斩钉截铁地说："宗派主义！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语调昂奋，而且带着几分怒气，双目圆睁，脸色也红涨起来。我本来以为这对他可能是一个平平常常的问题，不想却引致萧军先生如此动情。我不知应该说什么才好了，萧军先生也没有再说话。沉默片刻，我提起暖瓶给萧军先生的茶杯里加满了开水，拿了那枚题签过的首日封，道过谢便告辞了。

出了屋门，我有点后悔。悔不该唐突地向先生提出这么个问题，更后悔没有能即时说出几句宽慰他的话，比如说：我相信，中国的文学史家们，或迟或早总会对那段文艺现象有个客观公正的说法的！

（1997年）

酒仙张守义

图书装帧艺术家张守义先生在出版界是久负盛名的。我俩初识于潘家园旧货市场，是经过我们俩都熟识的摊主介绍而相识的。他那满头微微花白的长发，覆盖着一张瘦长的脸和一双不能算大但颇有神的眼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早听说张守义先生嗜饮啤酒，并收藏啤酒商标，素有“酒仙”之美称。实际一接触，远不是人们传说的那么简单，他的集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酒标收藏。张守义先生向我展示了许多酒标藏品，随手翻读，一件件如散文、如日记、如故事、如短评……汇在一处简直就是一部熔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为一炉的文艺小品专集。

张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与全国特别是首都的文化艺术界人士交往既广且深。而每次聚会，便是张先生集藏酒标的大好时机。我细看了他新近制作的酒标集藏，幽默风趣而又饱蕴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一件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用一次重要会议书面通知的背面制作的。雪白的16开纸上，左上方贴着一张燕京啤酒的酒标，右半页和酒标下方，

密密麻麻写下了与饮酒有关的文字。因为张守义的特殊身份，记述的都是文学艺术界和新闻出版界的人和事。

一则是记三月某日的一次午餐。一共三句话，记了六个人三件事：

“早春谈萧乾……”

“松颐话汝昌……”

这二句颇像鲁迅日记的风格。早春即陈早春先生，松颐乃弥松颐先生，两位都是张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同事。萧乾先生是著名作家、翻译家，以90高龄刚于年前过世；周汝昌先生是著名红学家，中国红学会名誉会长。至于陈弥两位“谈”了什么“话”了什么，都略而未记，但删节号却给你留下了许多的思考空间。

第三句是图文并茂：“同作家玛拉沁夫对酒一大杯。”后面则画了一只大酒杯，还冒着啤酒沫；一只小酒杯，也是酒花四溅。张先生向我解释说：“玛拉喝的是白酒，我是啤酒，和他对了一大杯。”说时的神态很为得意。

第二则记于三月的一次晚餐后，更显出“酒仙”的仙气了。为使张守义的“仙气儿”不走味儿，且将他记述的包括括弧里的文字皆照录于后：

“晚餐饮酒超出限量，走出饭厅脚步变形；挤进电梯见每人双头多目……电梯中巧遇‘鸠山’（袁世海），出梯搭肩合影。入住室，忆往事话今昔：‘李奶奶’健在；‘玉和’患病半残；‘胡传揆’（周和桐）、志愿军团长（方荣翔）已过世。‘鸠山’83岁高龄，老人心事之一是无力爬宅中四层高楼……告别前，老人提笔作画《兰酒如仙》一幅，赠守义老友。”文尾且缀诗四句：“鸠山”京丰会老友，旧情往事说不休。“玉和”病，“传揆”走，83岁“鸠山”天天爬高楼。

常有人论及酒文化，大多围绕着酒令、酒标、酒藏、酒具、酒风等内容展开。张守义先生创意的这种酒文化，则是由饮酒而引发的文化话题，是文化人饮酒时或饮酒后的生动记录。酒标不过是一次酒文化活动的物证而已。这与一般只注重品牌多少、稀有程度高低的酒标收藏，称得上是一种创新。

作为“酒仙”，张守义还有其独特处。他曾从人民大会堂寄给我一枚全国九届政协二次会议的首日封，上盖会议和大会堂的两枚当日邮戳，并在他的签名之后，又加盖了两枚奇特的印章：一方是“守义”的倒盖名章，一枚是葫芦

形无字章。经他指点，我才走出迷津。原来那葫芦章是他独创的自制防伪印章，是以一方硬纸板镂空一葫芦状图形——葫芦，酒仙之象征也！以食指蘸印油按在镂空处，抬手一看，一枚鲜红的肖形印章便耀然纸上，人们称之为“葫芦指纹章”。那倒印名章，亦为酒仙之喻。为这倒印名章还闹过笑话。有一次，张守义为一本关于酒文化的书设计封面，为了画、印相谐于书的主题，他特意在设计图上加盖了倒印的名章。印刷厂照设计图稿印出了封面，却被“明白人”发现了“错误”，非要印刷厂重新印过，因而延误了时间。张守义催问，告以封面印刷出了差错。张守义料到问题可能出在倒印名章上，便说：“你们对一下我的原设计稿，不一定是印刷有误！”一核对，果然不出所料。

有感于见识张守义先生独特的酒标集藏，遂作打油四句以记兴：

酒仙之意不在酒，醉心集“标”欲何求？

人间需要真善美，挥笔蘸酒写春秋。

（1999 年）

张守义展灯题扇

著名装帧艺术家张守义，书刊封面设计造诣颇深，佳作频出，享誉中外。艺事之余，他有两大藏好，一是碑酒商标，二是古旧灯盏。我曾去他家拜访，不用提出请求，他就会迫不及待地向你介绍和展示他的灯藏。客厅算不上宽大，家具也算不上时髦，能显示主人富有的，惟有各种各样的老灯。你看那屋顶吊着的，四壁挂着的，柜橱里摆着的，琳琅满目。主人会一件一件地向你介绍，这是汉代的陶灯，这是明代的瓷灯，这是民国的煤油灯……他看我兴趣浓厚，拉着我的手走进阳台，手一指说，这几箱都是！说着，搬起一箱进了屋，打开来蹲在地上就一件一件给我讲了开来，真是如数家珍。那藏品也确是丰富，造型各异且不说，单看质地，就有铜的，铁的，锡的，陶的，瓷的，木的，玻璃的，景泰蓝的……

张守义藏灯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见了老灯，就眼睛发亮，就走不动道儿，必欲得之而后快。一次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组织委员参观视察北京古玩城，一家小店里摆了一盏木质老油灯，看上

去造型土拙，做工粗糙，顶多是解放前哪个长工屋里的照明用具。在我看来既无艺术魅力，也无收藏价值。但张守义执意要买，在古玩城老总的协调下，还花了 100 元才拿到手。我当时真想说：这玩艺儿就是白送我我也不要！但看着张守义手托木灯把玩欣赏喜形于色的神态，我不仅没敢开口，而且自省：这或许就是一个普通人和艺术家兼收藏家的反差吧？

2001 年末，北京市政协举办委员活动日，主题是委员收藏展览。张守义送展了十几件他收藏的老灯藏品，使参观者大开眼界，大饱眼福。他还在舒乙委员和我主持的收藏茶座里现身说法，讲了他如何把藏灯和书刊装帧设计结合起来，提高了封面设计的艺术品位和质量，并以幽默的语言讲述了他苦心藏灯的故事。有一则说，有一天他去家里阳台打扫卫生，忽听身边有小鸟唧唧叫声，待翻箱倒柜忙了一阵，才发现在装满藏灯的一个大纸箱里，麻雀不仅安了家，而且繁育了后代，几只雏鸟齐张小嘴，嗷嗷待哺。大家听了一阵哄堂大笑。有朋友打趣说：古人有筑巢引凤之说，张委员是古灯搭窝养麻雀，可算是一则新典

故了！

在茶座讲过以后，我趁张守义仍在兴奋状态，遂拿出一纸素扇面，请他为我题上几句藏灯的感言。他几乎未加思索，拿起笔来先画了一盏他曾反复展示的民间铁油灯——手指灯，而且灯花四放，栩栩如生。接着信笔写道："灯与劳动者为伴，灯与求知者结友，灯与助人者同行，灯与度节者共乐。"签名之前还特别注明"藏灯人爱灯感受"。

欣喜之中，我打趣说：守义先生爱灯、藏灯、画灯、展灯，今天又登台讲灯，五"灯"集于一身，正合"五谷丰登"之意，这预示着张先生的艺事和灯藏，明年将获更大的丰收！张先生笑了，抄起桌上的易拉罐啤酒，饮了足足一大口。

（2003 年）

乌镇朝圣

“中国茅盾研究会”邀我出席纪念茅公逝世20周年活动，并参加第七届茅盾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手捧通知，欣喜非常，激动不已。因为，研讨会将在文学大师茅公的故乡——浙江桐乡市乌镇召开，去那里可以一览茅公作品中描绘过的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更因为茅公于我有恩——在我学习文学创作的初始时期，茅公给过我重要的指导和激励！

那是43年前的事。当时，我还是一个刚满20岁的排字工人。也算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是年初，投稿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处女作《谜》；“五一”劳动节那天，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的第二个短篇《谁是那百分之十》。此后，先是上海的王道乾先生写了评论，而且一连两篇文章都谈及我的这篇小文；接着，《萌芽》和《北方》杂志予以转载。更幸运的是，这篇小文也引起了茅盾先生的关注。在他评论1958年短篇小说的专论（题为《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中的几个问题》，收入《茅盾全集》第25卷）中，对我的小文给予了肯定。后来，被包括

《全国年度短篇小说选》在内的三本选集入选，并被译成俄文介绍给外国读者。

我当时虽然十分兴奋，但头脑也还清醒，明白如果不是大师的抬举，一篇小文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增强了写作的信心和继续写下去的勇气。

当时，我曾几次有过给茅公写信表示感谢的冲动，但总觉着茅公当时担着国家文化部部长的重任，哪里会有时间看一个青年工人、业余作者的来信？所以，终于没有鼓起写信的勇气。在后来的时日里，虽然在几次开会和看戏的场合，我都见过茅盾先生的身影，但也未能上前说上一句感谢鼓励的话。

这在我的心灵深处，确实留下了深深的遗憾！特别是当我读到茅公生前曾给许许多多青年作者、学者写了那么多热诚的复信以后，更是后悔不迭。

知恩图报，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四十几年来，对茅公的感激之情我从未淡忘。

近几年，我的业余爱好中添了一个新项目，就是星期天逛逛旧书市场。主要是“逛”，偶尔碰上喜欢的书报、信札什么的，也买个一二件。与茅盾先生有

关的书刊资料，当然也在我的搜求之列。

收藏界有一句格言，道是“可遇而不可求”。可巧，我就碰上了这么一次机遇。

1996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六上午，我徜徉在城南的潘家园旧货市场。忽然，一个摊位的大片旧书里，一本小册子跳入我的眼帘，那是广东大学1926年出版的一本“演讲集”。封面是早期的中共党员、后来蜕变为日本大汉奸、1946年在浙江被处决了的陈公博题写的书名，并钤盖着他的手戳。

鬼使神差地我拿起来翻看：小册子薄薄的，封皮和内页都已发黄。目录标明该书收录了17位当时的名流学者22篇“演讲辞”。茅公的原名“沈雁冰”赫然在目。我不禁暗想，七十年前一个大学内部出版的小册子，至今能有几本存世？有关部门是否知晓？《茅盾全集》是否已经选入？只凭一种直觉、一种感情，我决定买下。那摊主虽然年轻，但很通晓消费心理学，他看我有点爱不释手，一口价要下来便再不松动，让我花了比平时买一本同类旧书至少多十倍的价钱。

回来细读这篇题为《最近国际情势与中国革命策略》的演讲全文，我真是

惊呆了。70年前的演讲，今天读来依然感觉新鲜而深刻！他对国民党右派的批判，对孙中山先生联俄政策的阐释，以及对帝国主义列强合伙欺凌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反动本质的揭露，都十分尖锐而精辟。

我迫不及待地查阅资料。《茅盾年谱》记载着1926年1月茅公从上海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至3月下旬返沪。其间曾到一个中学演讲，但没有到大学演讲的记述；《茅盾全集》载有1926年有关文学、政治等方面的多篇著作，但目录中没有此文。

我又拜访了研究茅盾的专家学者，并通过他们征询了茅盾先生的长子韦韬先生的意见，他们一致认定：这是一篇茅盾佚文！并认为，这不仅填补了茅公著述的一个空白，而且填补了记录茅公1926年初在广州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空白。

在确认为佚文之后，我为此写了一篇短文《一篇批驳国民党右派、揭露帝国主义的檄文》，连同茅公演讲原文发表在《茅盾研究》上。这时，我的感觉是：对茅公的知遇之恩，算是做了一点报偿。

此次与会桐乡乌镇，正逢阳春三月，

草长莺飞，桃红柳绿，那原汁原味的水乡古镇，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以其特有的古风古韵，让人陶醉，让人神怡，令我留连忘返！我怀着朝圣的心情，参观了茅公纪念馆和旧居，并把复印的茅公佚文郑重地交给了纪念馆，以表达我对茅公的崇敬和怀念。

（2001 年）

水乡藏珍

我多次去过江南水乡，看到的总是一片片墨绿色的稻田，一片片金黄色的菜花，一片片玫瑰色的苜蓿，或是一方方明镜似的水塘，一座座或砖或石垒砌的古桥，一条条笔直笔直或曲曲弯弯的小河。

此次去江南水乡，却看到了另一番让我痴迷的景象。那就是水乡藏珍——星罗棋布的文化名人故居。

走进乌镇谒大师

浙江省桐乡乌镇是文学大师茅盾的故乡。

我是受邀去乌镇参加纪念茅盾活动的。主办单位赠送每位代表一本新发现的茅盾手迹——茅公在家乡读小学时的作文本《文课》，共收作文 37 篇。宣纸木版印刷，十分精美。这是我此次水乡之行的一大收获。

当时茅公只有 13 岁年纪，但在《文课》中竟能纵论天下大事。被老师赞语，“生于同班年最幼，而学能深造，前程远大，未可限量！”并惊呼，“此子必成大器！”茅公果然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

茅盾故居所在的东大街，傍东市河

而建，虽称“大街”但宽不过三米，街两旁一色的黑瓦白墙，一色的木结构两层小楼。进入街巷不远，便见一座四开两进的老屋，门外的木匾标明，这就是茅盾故居。老屋始建于清道光年间，茅公即诞生于此，并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故宅后园存有 1934 年茅公亲自设计翻修的书斋和亲手种植的天竺与棕榈。故居东邻为茅盾母校立志书院，现辟为茅盾纪念馆。

东大街之南为东市河，千米长的古帮岸，砖石相杂；岸边的水阁廊棚，倒映在潺潺流水之中，古朴自然，韵味无穷。当地人自诩为“原汁原味的水乡古镇”，果然名不虚传！

我想，或许正是这水乡古镇的灵气，给了茅公以太多的创作灵感和革命激情。当然，乌镇也因有了茅盾这样的伟人，有了茅公的作品和人品，而更令人倾慕和向往！

缘缘堂识丰子恺

著名漫画家丰子恺（1898—1975）的故居缘缘堂，在离乌镇不远的石门镇，亦属桐乡所辖。原建筑为 1933 年丰子恺在家乡设计建造，后毁于侵华日军炮火。1985 年重建的故居，保持了民国建筑的

风格，并有意保存了被侵略者炮火烧得焦黑的两扇大门。而今，镶在壁上的这两扇木门，就像是一幅揭露日寇暴行的立体漫画。故居兼纪念馆内藏品颇丰，既有画家的书画作品，也有他的著作、手稿和其他遗物，还有许多全国知名漫画家为纪念馆捐赠的书画。

在缘缘堂参观，仿佛是在亲眼目睹画家那睿智与童心、讽刺与幽默的画风与人格。

丰子恺多才多艺，不仅是书画，于散文、文艺理论、音乐都颇有造诣，著述很多。可惜在“文革”中惨遭迫害，1975年含冤病逝，1979年始得平反。睹物思人，让我在景仰与追怀中，还多了一层悲凉！

海宁寻踪徐志摩

距桐乡乘车走一个小时的路，即可达海宁。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1897—1931）的故居、纪念馆、墓地，皆在此地。

徐之墓地建在西山公园内。石制的墓室前竖着一通一人高的石碑，上书“诗人徐志摩之墓”，建造于1946年仲冬。墓旁的草坪上，摊开着两本汉白玉做成的大书，左边一本镌刻着其著名诗

篇《再别康桥》的诗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右侧的一本，镌刻的是诗人的另一名篇《翡冷翠的一夜·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几句诗，把诗人的浪漫情怀抒发得淋漓尽致。

徐志摩故居在海宁硖石干河街菜市弄32号，是一幢建于1926年的中西合璧式建筑，据介绍是徐志摩为与陆小曼结婚而造。婚后与陆曾短时居住，而徐之母亲和前妻，则长住于此。现故居辟为纪念馆，在这里可以寻觅到诗人那浪漫的足迹。

意外地，我们还找到了徐志摩的出生地，离纪念馆只有十分钟的路，据徐家老邻居叶培怀先生说，徐之先人于明万历年间迁入海宁，徐志摩1897年即出生在这个院落。院子很大，横跨于两条街巷之间，可惜的是已先于拆迁范围的

其他房屋被拆除了。整个院落一片瓦砾，只有一个破门楼孤零零伫在那里，似在向前来的人们诉说着什么。我从地上捡了一块又小又薄的青砖，抹去浮土，带了回来。我想的是，如果哪天有了兴致，或许我会在这砖上刻上几行文字，或许就刻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一门忠烈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的故居在富春江畔。富春江周边正在大力整治，拆除违章建筑，修造大片绿地，把个富春江衬托得更加春意盎然。在岸边绿地与新土之上，突兀地立着一座院落，一幢二层小楼占据了院子的大半。这便是郁达夫故居。看来，富阳人早就以郁达夫为骄傲，因为故居的门楣上镶着的红色老门牌——“达夫弄1号”，标志着这里的故居早就被刻意保护起来，而且，此次整治江边环境，不仅未伤及它的体肤，反而更把它凸显出来。遗憾的是故居有铁将军把门，未得进入。据说达夫后人就在富阳市机关供职，但因是星期天，欲探访而无缘。

后听说富春江边之鹳山上，有郁达夫之兄郁曼陀的居所和他的血衣冢，便赶上去拜谒。进山门向左拾级而上，所

见多为纪念郁氏兄弟之作。首先看到的是郁曼陀之血衣冢，旁立郭沫若撰、马叙伦书之“郁曼陀先生血衣冢铭”。读后方知达夫一家乃满门忠烈！达夫之母因富阳陷敌，“绝粒以殉”；曼陀先生因抗日爱国于 1939 年 11 月遭敌伪政权“狙击于市以死”；越七年，敌寇已降之时，郁达夫竟被日军残敌杀害于南洋，皆因郁达夫鼓动华侨抗敌之故！

鹳山腰上，依山面水有一宅舍，便是郁曼陀与其母之故宅。内藏郁氏相关史料，已成达夫兄弟之纪念馆。馆下有一亭，名“双松亭”；有一碑，上刻郭老 1961 年手书曼陀遗诗：“双松挺秀意何如，仿佛眉山有二苏；况复埙篪同殉国，天涯海角听相呼”。正是达夫兄弟之写照。

旧读达夫小说、日记、书信，觉作家对生活过于消沉，对爱情又过于炽烈，然观其大节，始知爱国至不畏死，才是达夫先生之真性情也！

此番南行，正值江南处处春光好！而江南风光，不仅在于自然造化，人文景观之凸现，着实为江南之美平添了更亮丽的色彩，更动人的神韵！

（2001 年）

207号小院

广渠门内大街207号院（旧名蒜市口16号），因了一纸清代历史档案的发现，便成了红学界、文史界、新闻界关注的焦点。

1984年，老作家端木蕻良先生在档案材料发现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张书才先生陪同下，到207号院实地考察，并撰写了《关于十七间半》的文章发表。对于当时正在创作长篇小说《曹雪芹》的端木先生来说，内中当还有一层凭吊的深情在。此前此后，周汝昌、冯其庸、顾平旦等著名红学家，多位北京市领导和市政协文史方面的委员，都曾亲临207号院巡访考察。市政协文史委、崇文区政协与中国红学会还两次召开座谈会，研究对这处旧居的认定和保护问题。首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也相继发表消息和专文……207号院着实热闹了一番。

近日，207号院又有升温。这皆因两广大街改造步伐甚快，广渠门内大街一段（原蒜市口）已经大兴土木，旧貌就要换新颜了。

这天，我途经207号门口，见207

号的左邻（209号）已经只剩几面残墙断壁；右舍（205号）也只有半壁外墙和一个门洞了。只有207号孤零零但完整无损的摆在街旁。

别看小院有点孤单，但却不寂寞。我正欲进门看看，便见有两位穿着简单、趿着拖鞋的妇女一前一后搭讪着往门里走。那年长些的说："再看看去呗，不然拆了可就看不见喽！"那年轻的没言声，只是笑。

我相随着进了门，问那位年长些的妇女："您住这院儿？"

"不是，我们是对门儿老街坊。"

"来串门儿？"

"也不是。是来看看这房子。这不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家的老宅嘛！"

"您早就知道这就是曹家老宅？"

"前些年听说的。"停了片刻，又语重心长地饶了句："若拆了可真怪可惜了儿的！"

进到中院，正房廊下站着一位老太太，经问知是房主人马振升老先生的老伴。我说明来意，老太太就让我到北屋里坐下说话。老人的二儿子也在屋里，便一起聊了起来。

马老太太说："我们马家在这院住了

好几辈了。原先，屋里院里有不少刻着字的牌呀匾呀什么的，后来一样一样的都被毁坏了。那刻着‘端方正直’四个大字的四扇屏门，也让刚迁走的一家住户给拆走了。

我说："那怎么可以随便拆走呢？"

马老太太说："人家说了，你文物部门不是没认定是文物吗？那可不就随便拆呗！"

正聊着，院子里忽又热闹起来。原来是电视台记者来了，男记者端着摄像机，女记者举着话筒，后面还有一位我不认识的中年人和我认识的张书才先生。张先生告诉我：前几天，在院里又发现了一块镌刻着"日壮鸿猷"四字的木牌，高约90余厘米，宽约20厘米，文字竖写。张先生曾将木牌送给周汝昌先生鉴赏，周先生一见便连声赞曰："太珍贵了！太珍贵了！"而且对这块木牌下了十二字评语："书法极好，年代久远，本身完整。"据周先生判断，这块木牌至晚也是乾隆年间旧物，认为对研究207号小院的历史很有价值。

电视台记者见我也关注此事，便举起摄像机对着我要采访。我忙说，你就集中采访张书才先生，是他发现了清代

档案材料，并进行过详细的考察论证。张先生是功臣，我不过只是有点兴趣罢了。

经张先生介绍方知，和张先生同时进院的，是马老先生的长子，现在东城教育部门工作。他说，迄今从来没有人说过这院儿不予保护。马家的人还指点说："您看那已经搬走的几家门口都贴着封条，而且是北京市房管局的封条，可见政府多么重视。如果马上拆除，还封什么呀！"我听了当然很感欣慰。

在这次造访中，还从马老太太口中得到一个新的信息：当年马家买这处住宅的时候，连同一块墓地也买了出来，那地方俗称草家坟，葬过马家四辈先人。马老太太认为，那本该叫"曹家坟"，叫白了，才叫成草家坟。

第二天一早，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驱车奔向十八里店乡的草家坟村。乡里的一位负责同志陪我走访了有关的人家和居民，但得到的竟是一致否定的意见，没有一人证明草家坟与曹雪芹家或别的曹家有任何联系。

对此我并不觉得失落。因为对于文史工作来说，"否定"同样是一种成果。而且我坚信，既然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在北京写出了惊世之作《红楼梦》，有关曹雪芹的佚文史迹，总会还有新的发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2000年）

百货大楼成了现代文物

王府井大街已整修一新，位于王府井最繁华地带的百货大楼也已装修改造完毕，明日重张。近来，在街谈巷议中，不时地引发出关于王府井百货大楼昨天的话题。

王府井百货大楼，是建国初期国家斥巨资兴建的规模最大的国营百货商场，故被誉称为“新中国第一店”。这个六层大楼建筑是由著名建筑设计家、建筑家杨廷宝、杨宽麟设计建造的，其建筑风格独特，是50年代的代表性建筑。故被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规定为：外观不得改动。因而人们称它为“现代文物”。

王府井百货大楼开业于1955年9月25日。开业第一天，就在北京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翻开当时的报纸，看到那版面，你简直不敢相信那是对一个商场开张的报道。然而，那竟全是事实！

《北京日报》在一篇长篇报道的开头说：“百货大楼开业了，它给全城增添了喜气。”结尾说：“人们都认为，百货大楼的建成，标志着祖国生产的发展，国营商业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来到百货大楼的人们，都深刻地体

会和衷心地感谢着党对人民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大公报》用特大字标题和一个整版篇幅报道百货大楼开业盛况，发了几幅照片，其中一幅就是邓小平同志在商业部长曾山同志陪同下视察百货大楼的情景。

百货大楼开业第一天，引来顾客 16 万多人，销售 25 万多元。这个现在看来实在算不得惊人的数字，却在当时对一些百货商店形成了不小的冲击。据资料统计，邻近地区的几家百货商店当日销售额下降 46%左右，前门大栅栏、西单等地区的商场销售额下降也超过 30%。

百货大楼开业至今的 44 年里，培育了以张秉贵为代表的“一团火”企业精神，以其良好的信誉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厚爱，而且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周总理曾五次到过百货大楼，江泽民总书记 1994 年到百货大楼视察，并题词“发扬一团火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给予勉励。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百货大楼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多家企业、20 多亿元资产的股份制商业集团。（图为 1995 年开业时的百货大楼。）

（1999 年）

关于王府“井”的感慨

日前，在王府井大街市政工程中掘出一眼古井。晚报10月17日作了报道，闻讯趋往观之者甚众。然因有关部门鉴定为民国时期所凿，无文物价值，遂以砂石填之。笔者前往观看时，井已填满，惟被砸烂的井口石块仍依稀可辨。

此井真的没有文物价值吗？此说实在值得商榷！

据北京社科院专家姜纬堂先生几年前考证，绘成于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之《乾隆京城全图》，即已明确标出此井，而且它是王府井大街上惟一建于街面的水井，其方位与近日发现之井位完全吻合。此图可证此井至迟在二百五十年前已然存在。

姜先生据图绘方位推测，王府井之井“在今王府井大街南段路西，约当今益民食品店门前。”据笔者实地勘察，该井实际位置与姜先生推测基本相符，确切的位置在原益民食品店（现已改营茶叶，店名也改为碧春茶庄）以北约七米处的路边，正对的是恒富盛工艺首饰店。

笔者曾问及碧春茶庄的店员，此前知否门前有井，都称不知。但几位中青

年店员的议论却令我多生感慨。他（她）们说：这口井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填埋？如果把井口修整一下，周边加个栏杆，完全可以成个景致，供来逛王府井的人们参观！

多么有见地的议论！是啊，那就好比去前门大街仰望几眼前门楼子，过地安门俯看一眼后门桥的石桥，那感觉多有味道！

现在，许多地方费尽心机地在修建人造景观，且有些景观与当地人文地理环境毫不相干。而王府井大街上突然冒出个与当地人文地理完全吻合的“井”点，却无端被掩埋掉，岂不十分可惜？

或有人认为，这井不过是民国产物。退一步说，即使真的如此，做为王府井大街的代表性景观，难道不应予以保留吗？君可知，建成于1955年的王府井百货大楼，据今只有43年，但已被市有关部门定为只许原样加固，不许拆除改建的“现代文物”，而这眼于今至少已有二百余年的古井，保留下来又有何妨？更何况，只因了这眼井，硬是把叫了几百年的“王府大街”改叫了“王府井大街”，足见这眼井在世人眼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了！

不知确认此井为民国建筑的部门，是否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如果仅凭井口或井壁的部分材质即作确认，似乎过于轻率。可想而知，在民国初尚在使用的水井，历经几百年风雨，一定会经过多次修葺，换用了大量的新材料亦势在必然，怎可以此为据呢？试想，如果仅以近年修复八达岭使用的砖料作为对长城断代的依据，那古老的万里长城岂不成了新中国的作品？

保留王府井之“井”，于保护首都文化文物，于振兴王府井大街的商业旅游事业，都大有益处，望有关部门细思之、慎行之！

（1998 年）

王府古井回声响

王府井是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但曾经在这里熙来攘往的人们究竟有多少人想过，一条堂堂大街为什么叫了这么一个再“俗”不过的名字？而这叫来叫去挂在人们嘴边上的王府井的“井”又到底在哪里呢？

1998年10月17日晚上，坐在家里看晚报，一条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王府井大街市政改造施工中发现了一眼古井！难道是这个谜底要揭开了吗？

一周后当我出差回来，早晨上班前我就直奔王府井工地现场。可那里的景象使我目瞪口呆：古井已被填平，只有几块被打碎还未及清走的井台青石杂乱地摊在地上。

我当即向施工现场的工人询问，工人的回答很简单：“头儿让填了就填了呗，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又向工地的保安人员调查，向临近的工艺商店和老字号碧春茶庄的员工了解。真想不到，那里的工作人员竟说出了我想说而没说出的话：“在王府井工作了这么多年，都不知道这王府‘井’究竟在哪儿，这次偶然发现了这口古井，却又被匆匆忙忙

填了，真让人不好理解！”“如果把这古井开发保护好，完全可以成为一景致，使来逛王府井的人参观。那对王府井的旅游和商业都会大有好处！”

可到底为什么挖出来又填上呢？一些不曾相识却颇有共识的朋友告诉我：

听说，文物部门有人认为是民国时期修造的井，没有文物价值！

听说，因为已成了污水井，保留下来也没有观赏价值！

听说，怕影响交通，怕影响市政工程进度，怕花钱……总之，有千万条理由封填，没有一条理由开发、保留！

我思绪难平，回去便翻查手头资料，去图书馆和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查阅有关书刊。后来，北京晚报副总编李凤祥建议我找曾在晚报发表过有关文章的北京社科院专家姜维堂先生谈谈。姜先生热情地告诉我，他写过一篇关于王府井的长文，并附有《乾隆京城全图》有关部分。

我找到了书，文章涉及王府井大街的历史沿革，从明代在此地修建十王府以来，街名先后叫过十王府、王府街、王府大街，至清末民初，始有王府井大街之称谓。特别是那绘成于乾隆十五年

（1750）的《京城全图》，在“王府大街”的街面上，赫然标示着一个圆圈——那正是该图特指水井的标志，而且在这条通衢大道上，仅此一圈！经实地勘察，此井实际方位与姜先生据图推论的具体位置仅有15块方砖约7米之差。我把这消息电话告诉姜先生，并敬请他出山一起向有关部门呼吁保护。意外的是被姜先生婉拒了，他说：考证那里有一口古井，现在的发现又证实了，我的任务当算完成了。对此，我毫无怨言，因为如果不是风祥兄的提醒，不是姜先生的文章和引证，我不知要多费多少功夫才可能找到确证！

我郑重地向市政协交了一份提案，题为《关于保留新发现的“王府井”案》（编号：10—1042号）。主要内容如下：

“目前，在王府井市政工程中发现了一眼古井。据考证，此井位置与《乾隆京城全图》所标井位完全一致，故建议对此井进行整修、保留、开放……严重的是，目前井已被填平，路正在修，如果待市政工程全部结束再进行开发，会造成重大浪费，故此提案请及早研究及早向有关部门提出。”

市政协领导十分重视，及时批示了

明确意见："建议东城区人民政府会同市文物局研究处理。"

1998年12月15日，王府井大街开发办公室一王姓女士电话告诉我：区政府主要领导对此提案十分重视，已责成开发办公室负责办理此项提案，初步意见是接受提案建议，将在次年即1999年3月市政工程复工后，一并进行开发保护。

又过几天，接到了由时任东城区政府常务副区长陈平签发的《关于市政协第10—1042号提案办理情况报告》，文称：

"李姓委员：收到您的提案后，区政府非常重视，立即责成王府井开发办进行办理……经过查证，此井确实如您在提案中所说，其位置与《乾隆京城全图》所标井位完全一致，故决定对此井进行整修、保留、开放……"

但好事总是多磨，没几天又有节外生枝。市文物部门一位工作人员约我面谈关于王府井提案问题，并向我出示了区文管部门的一个书面答复：一、反复强调这眼古井已成为污水井，井中有四米深的污水，井壁上有孔，与污水管道相通，不时有污水流入井中，臭不可闻；

二、王府井市政工程是向国庆50周年献礼的重点工程之一，工期非常紧张；三、王府井大街“水井很多，并非只此一井。”结论是：此井“没有太大的观赏价值，况且目前也没有资金，所以，将此井开辟为景点之事可从长计议。”

好个“从长计议”！我立即向来人出示了东城区政府给我的《提案办理情况报告》，问他是按区政府的意见还是按区文管所的意见办好？来人看来不甚知情，在看了区政府的报告后，当即表示：按区政府意见办。

转年到阳春三月，大地已经复苏，王府井大街市政工程按时复工了。然而，复工一个月了，“井”观却依然如故，没有丝毫动静，而且，由于恒富盛工艺品店的装修改造，建筑材料和废料把古井的残迹都遮盖得不见了踪影！我三天两头到那里去看井。我焦心地期待着，但从未失去信心，因为我相信，政府部门不会把处理政协提案当儿戏！果然，在四月的一天，我欣喜地发现：有几个工人正在开挖古井了，污泥烂沙，碎石杂砖，摊了一堆。

此后，可以说这里是一天一个样！井口的杂砖拆除了，井里的污水抽干了，

周边的污水管道整修了……新井口开砌了，整齐的花岗岩条石代替了古井原来的那部分杂砖……

到了1999年8月，漂亮的樱花红大理石井台已经铺就；月末，又镶配上一个青铜铸成的井盖，上面镌刻的文字记述着这古井的历史。我由衷佩服和感谢这位井盖的设计者。这比把古井彻底亮出来，更显雅致、古朴，而且带有几分神秘色彩。当然，从审美和工程角度讲，美中不足的是井盖与顶面的井口尺寸稍有误差，周边露出了不得不用水泥填充的约二厘米的空隙。

1999年9月11日，王府井大街市政改造工程胜利竣工正式开街。从此，这口尘封了七十多年的王府古井作为王府井大街的标志性文物，真的成了大街上亮丽的一景！

许多游人到王府井来，都要到古井处驻足观瞻，而且常是议论纷纷。那种对古都北京的怀旧深情、那种对古都历史文化的倾慕与好奇，溢于言表。

北京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和文史委员会，专门就有关文物保护提案落实情况组织委员到王府井视察，在古井旁边，市文物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在整修

古井时，曾从井的下部取出一块砖进行查验，结论是明砖！那就是说，这口古井的历史比已知的文献清《乾隆京城全图》所刊时间，还要上推一个朝代！

王府“井”这道神秘的面纱终于缓缓揭下，金街依然迎来送往，繁华依旧。不同的是我们对在王府井买过的东西可能会失去记忆，但这口历尽沧桑的老井连同王府井的古风今韵，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刻依然会在人们心底留存。

（2001 年）

初入泉苑

写罢标题，便觉好读而可能费解。其实只解一字，全文皆通。辞书上说："泉者，古钱也。"

一日，在位于潘家园的星期天市场闲逛，忽遇老友H君。多日不见，见面未问声好，便将其手中紧握之铜币展示面前，喜称：适才从一老者手中购得三枚古币，开价二百五，只一百便出让于我，老兄妬忌否？其态酷若孩童，且又有老北京人"得便宜卖乖"之神采。

我虽未曾涉猎泉学，亦无藏癖，但对古钱也略晓一二，便索过一睹，以分享老友意外收获之喜。乃至放在手中一看，不觉心中好笑：三枚皆假币也！"合背"永通万国，纯属新仿，只作简单表面处理；一枚"五笔"政隆元宝，其"正"乃四笔加改而成，所添半笔，铜色还在闪亮。以上两枚，稍有常识者，不需细辨，一看便知真伪。第三枚崇宁通宝，崇字之"示"作"禾"，泉界谓之"木崇"，亦为后改，只是作旧之技术略精，稍难辨识。

看过铜币，再看H君，面部喜色骤然大减。改炫耀为征询，盼认同而惧臧

否。吾虽不无怜悯之心，但仍不得不据实相告："吾兄且慢欢喜，三枚皆赝品也！此伪作实属笨拙，老兄何以如此容易上当受骗？"H兄未假思索，称："钱币知识太少矣！"吾说："既然自知太少，你又非明星大款，为何一掷百元，换三块铜饼？"H兄半晌无言，忽而似有所悟，曰："吾轻信矣！那卖钱老首，鹤发童颜，眉慈目善，衣冠楚楚，且言谈举止，彬彬有礼，看上去不是大学问家，亦是老教授一辈。对其所营钱币，逐一评点，言之凿凿，情真意切，且信誓旦旦曰：'若有一假，以十相罚。若系真品，欢迎下次再来。'临别时又友好相慰：'再者，您初入泉苑，自当交了几元学费，于您又有何损？'"吾听之甚有启发，便宽慰H道："兄费一钞，买一明白，亦划算矣！"

H兄经历大喜大憾，似已解脱，一再表示要多向吾"求教"。吾则一再声言，对古钱币所知不过皮毛，远非行家里手，建议他求教于专家或者书本，以免造成误导。但H兄执意相求，情意殷殷。吾回到家中，在书橱中翻检半晌，居然找到一本《古币辨伪辞典》，便决意送给H兄参阅。送书时随附一柬，上

书："奉上《古币辨伪辞典》一册权供参考。窃以为：币假易辨，人假难识。识人之难甚于识币，而识人之重要则更甚于识币也。望兄笑纳。"

不知H兄见书见字时会作何种表情。

（1994年）

邮坛伉俪

今年五一节期间，我致信著名邮票设计家刘硕仁、卢天骄伉俪，问候健康，希望他们在“非典”疫情期间，少外出活动，多在家休息。节日刚过，卢天骄女士打来电话，说这几天比平时上班还忙。我感到诧异，还没有提问原因，她便告诉我说，国家邮政局下达了紧急任务，配合“万众一心，抗击非典”的斗争，发行一套主题邮票和相关邮品。4月29日下达任务，5月5日就要交稿。邮票印制局组织了十几位设计家参与设计工作，她是其中之一。这一来，整个五一假期，不仅卢天骄全力投入了设计工作，而且刘硕仁先生及他们的儿子也来助战，可以说是全家上阵了。5月5日，卢天骄向印制局提交了5份设计稿，几乎是一天一稿。我由衷地赞佩说：真是非常时期的非常速度！

邮苑良缘

刘硕仁先生1930年生于北京，虽已年过七旬，但精神矍铄，一派老艺术家风度；卢天骄女士1934年生于上海，六十开外的人，看上去却像青壮年，飘逸洒脱。他俩祖籍都是广东，先后毕业于

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中央工艺美院前身）。1953 年刘硕仁进入邮电部工作时，部里连他只有三位专门设计人员，堪称是新中国第一代邮票设计家；而 1954 年参加邮票设计工作的卢天骄则成了新中国第一位女邮票设计家。

许多人认为搞邮票设计属于“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刘硕仁、卢天骄可不这么看。刘硕仁认为，邮票是国家的名片，但在旧中国，我们的邮票要靠洋人设计和印刷，特别是当他想到，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就更觉得愤愤不平。卢天骄则时时刻刻牢记着医生兼摄影家的父亲的教诲：“不要因为邮票设计工作可能默默无闻而轻视自己的工作。”父亲这句朴实的话，成了激励卢天骄在邮票领域不断进取的座右铭。

四十几年里，他俩设计的邮票多达一百四五十套，是新中国迄今为止发行的 700 多套邮票的五分之一，邮品则更难以统计。他们的多套（件）作品在国内和国外的评选中夺金，单是 1980 年举办的建国 30 周年最佳邮票评选活动，选中的 30 套邮票中竟有刘硕仁 7 套，卢天骄 3 套并两枚小型张。

爱心育邮花

欣赏着卢天骄女士设计的邮票邮品，我不由得反复在想：作为新中国第一位女邮票设计家，卢天骄设计的票品为什么那么让人喜爱，她为什么能取得如此成就，获取那么多殊荣？她成功的秘诀何在？

在她的作品集首页上写着："谨以此方寸微幅，献给我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

啊，爱！热爱！卢天骄是以女性特有的爱心，把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热爱的真情，倾注到自己所从事的邮票设计事业中去。这就是卢天骄的成功之道！

爱，意味着奉献。作为女性，卢天骄工作上那股难得的拼劲，是她对祖国和人民热爱的具体体现。1984 年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 23 届奥运会，是我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后第一次参加国际性比赛的重大赛事活动。为此邮电部决定发行一套纪念邮资明信片，以纪念我国体育健儿在 23 届奥运会的优异成绩，而且明确要求中国运动员每获一枚金牌，在第三天就要发行一枚明信片。这个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交由卢天骄承担。卢天骄毫不含糊，她知道自己有设计体育邮

票的优势，30年来她设计过少儿体育、幼儿体育以及武术等体育题材的邮票。虽然赛前根据分析预先作出了若干准备，但体育比赛冷门频出，好几个夺魁项目都始料不及，因此在紧迫之上又加了一层变幻莫测。男子移动靶射击、男子自选手枪、男子50和62公斤级举重、女子小口径步枪等项目，都是事先来不及准备，待听到夺金喜讯后，马上到国家体委了解情况，迅速进入紧急设计创作，送交印厂制版、出样、印刷。那些天，卢天骄吃饭、睡觉的正常程序都被打乱了，吃饭两餐并作一餐，睡觉有时即以印厂的桌子当床。这种拼搏精神连印刷厂的工人师傅也深深地感动了。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些天，卢天骄简直成了“常驻联合国代表”了！外电对中国每获一枚金牌三天便出一枚明信片，也感到惊讶。

卢天骄的拼劲儿还表现为不落窠臼，敢于突破。她为人处事个性鲜明，艺术创作亦不愿追随流俗。“文革”期间，邮票除去内容都十分“突出政治”以外，形式上不管什么题材，一律追求大票幅，颜色也常是大红大绿。从湖北干校回来，她接受了设计《武术》的任务。经过反

复构思，她确定以白色做底，且舍去边框，只在底部衬以一窄窄的红条，暗示练功的红地毯，看上去开阔、舒展、稳重，身着彩衣的武者形象十分鲜明生动。这套邮票以全新的风格受到集邮人的喜爱。加之，采用了“对倒印刷”的版式，更开了新中国邮票之先！

更可贵的是她这种求新求变的精神，是自觉而执著的。40多年来，她步步紧追时代的脚步。她给自己立下的奋斗目标是：既要不同于别人，又要不断超越自己。无论成败，也要不断求索，不断创新。

邮海亦无涯

在许多局外人看来，邮票似乎不过是一幅画作的缩小。其实不然。邮票是一种独特的完整的艺术形式，邮票设计同样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艰苦历程。即使邮票选用的主图是大家之作，其画作也仍然是整枚邮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设计家设计邮票的一个素材。

对于邮票设计艺术，刘硕仁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说：邮票是实用美术体系里的一个分支。它带有实用与审美的双重性，且具有物质（经济）的和精神（文化）的两重意义。在设计过程中，美

术家和邮票设计家，对待每套邮票的设计任务，从主题思想、表现形式以及处理手法等方面，都是以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作到“搜尽奇峰打草稿”。这一点，它和其它绘画创作确有共同点，但作为“方寸”艺术设计的邮票，决不意昧着只要一张“好画”就万事大吉，因为在邮票设计中，既有绘画，又不等同于“纯”绘画；既有工艺，又不等同于“纯”工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品味高的设计，充其量也只能说它是邮票纸上印了一张“好画”，而不能认为它是一枚“好邮票”。邮票最大的限制是那只有方寸大小的画幅，以及设计的邮票作品通过印刷复制缩小后，才能和群众见面，这个局限性既是限制又是邮票设计的特性。刘硕仁特别强调：“艺术只有在限制中才能发出异彩，而方寸邮票这个小小的票幅空间的限制，也正是对一个美术家、邮票设计家和印刷专家才能的试金石。”

听了刘硕仁先生的高见，再去欣赏他设计的大量邮票和邮品，对那艺术上的完美和创新，便觉得比较容易读懂了。

美术大师徐悲鸿先生的“奔马”，早已誉满天下。把徐悲鸿画作印上邮票，

这本身是一个意义很大但难度也很大的艺术工程。因为小小票幅，怎容得奔腾激越的骏马自由驰骋？在邮票和小型张中，怎样才能使整幅邮票与大师的画作相谐相称？“群奔马”原作长95厘米，宽181厘米，画面上的六匹骏马形态各异，非常生动，观画者仿佛能听到疾风暴雨似的马蹄声。刘硕仁经过反复构思、多次构图，决定采用40×90毫米的票型，小型张面积为98×148毫米。邮票保持了构图松快、舒展，给六匹骏马以自由奔驰的天地，使人感到，邮票尺寸的限制并未改变原画的精神。为了不致喧宾夺主，面值和“中国人民邮政”，用银色衬在“横长卷”的两边，在黑、白、银灰色调的对比中，悲鸿先生那奔放的笔墨便保持了豪迈气势。为了突出中国水墨画的韵味，刘先生设计了用银灰色图案花绫作为主图周边的装饰。为使装饰的花绫图案印出真绫一样的效果，刘先生深入印刷车间，与工人和技术专家共同研究反复试验，终于开创了用油墨在纸张上印出真绫子效果之先河！

刘先生把邮票设计艺术的创新，当做毕生追求的目标。他说：邮票设计艺术，也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要避免

千篇一律。一个有修养的邮票设计家，不能总在用着别人的“艺术语言”，不断发展前进的时代也不允许老是重复着一种陈旧的模式。他认为，感情和个性是艺术创作的两个基本要素，也是邮票设计的生命之所在。

珠联且璧合

刘硕仁、卢天骄作为伉俪又是艺术同行，在设计创作上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追求完美，是肯定无疑的。故此，在设计访问提纲时，我特意列上了一个小题——珠联璧合。但翻遍了我手头的资料和集藏的邮票邮品，竟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后来，在不经意间，忽然发现了两枚他俩合作设计的邮品——“中国邮驿史料及邮票展览”的封片。那还是1981年8月我参观这个展览时留下的纪念品。我当然喜出望外。于是，在访问他们两位的时候，我带着这一封一片，并以此为题听他们谈了艺术上相互合作的许多故事。

仅以《唐三彩》为例，这是卢天骄1961年设计的作品，是以我国古代文物唐三彩之驴、马、驼为图案的八枚一组邮票。如何在邮票上再现这些历史文物，又能赋予其时代的新鲜感？如何既突出

每一件艺术珍品的风采，又使整套邮票体现出对比与和谐？这是卢天骄在设计一开始就反复思考的问题。两位邮票设计家的心是相通的。刘硕仁经过深思熟虑，不声不响地在纸上刷出八个排列有序的色块，交给了卢天骄。卢天骄摆开一看，不禁击掌叫绝：色调冷暖搭配得当，对比鲜明又相衬相谐。这正是卢天骄心之所想啊！这套邮票的最后图稿，卢天骄采用的完全是刘硕仁提出的底色用色方案。

应该说，刘硕仁、卢天骄两位邮票设计家朝夕相处，心相印，艺相通，许多合作都是无形的，甚至是无声的。一个建议，一个提示，一个肯定或否定，都会给对方传递过去丰富的艺术信息，都会给对方带来十分有益的帮助。这些艺术上的默契，当属于“心领神会”的境界，那是旁人难以知晓的。

功夫在票外

记不清哪位画家曾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功夫在画外。”我看这也适合邮票设计，可称为“功夫在票外”。因为设计一枚邮票，票幅虽小，但同样需要调动设计家多年的生活积累和艺术积累，决不是凭着“画面＋中国邮政＋面值”

就可以成为邮票的。

刘硕仁自幼酷爱美术，时常省下吃早点的钱去买《芥子园画谱》等美术书籍，回到家就照着描描画画。有时还与小画友们同去琉璃厂浏览古玩字画或临摹名家真迹，为此常常受到店家的呵斥。由于在小学、中学时美术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刘硕仁早年便考入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受教于邱石冥、蒋兆和、李苦禅、娄师白、吴镜汀等先生；大学二年级又转入全国最高美术学府——中央美术学院，师从吴冠中、张光宇、周令钊、张仃等先生，为刘硕仁系统的专业美术教育打下了坚实的装饰绘画基础。

有了深厚的美术功底，是不是就可以关起门来搞设计了呢？刘硕仁不这么认为。他深知任何艺术创作都是源于生活的。因此，刘硕仁在设计邮票过程中从不想走捷径、抄近道，而总是扎扎实实在丰富知识、充实生活上下功夫。

刘硕仁在设计《蝴蝶》之前，就做了长时间的知识准备。他阅读了大量相关著作，多次到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观摩研究蝴蝶标本，带着问题虚心向蝴蝶专家李传隆教授请教。但蝴蝶世界实在太丰富多彩了，实在太诱人、太迷人了！

刘硕仁不满足于已经获取的知识，他要深入到大自然中实地观察、体验蝴蝶生存的生态环境和生活习性。

那是一个非常炎热的日子，刘硕仁独自跑到北京西郊的颐和园，用风雨衣裹严自己的身体，静坐在骄阳似火的野草地里，悄悄地观察蝴蝶在野花丛中自由飞舞的恣态，从中捕捉着美感和灵感，捕捉着创作的素材，引得游人好奇地议论“这人是不是有什么病”。其实，游人哪里晓得，许多热衷于艺术创作的艺术家，正是因为有这股“痴”劲儿，才得以成就他们的事业。刘硕仁的这套《蝴蝶》历经30年沧桑，如今在集邮者心目中已进入了珍品的行列。

刘硕仁牢记张光宇先生的教导，做画时要先做加法，后做减法。因此他每设计一套邮票必先深入了解相关知识，掌握尽可能多的形象资料，而在具体表现时，则要尽量去掉一切不必要的笔墨，力求简练。1980年初发行的《京剧脸谱》也是广大集邮者十分喜爱的作品。这套邮票共八枚，内容包括京剧中的代表人物孟良、李逵、黄盖、孙悟空、鲁智深、廉颇、张飞、窦尔敦等戏剧形象的脸谱。虽然这些被众多国人所熟悉的

面孔早有大批资料可以参照，但刘硕仁不满足于这些死材料，他仍不辞辛劳地跑剧院剧团，看京剧演出，到后台看演员化妆、勾脸，到戏剧家的家里拜访，先后请教了裘盛戎、萧长华、李少春、袁世海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和翁偶虹、马彦祥、周贻白等著名戏剧创作和理论家。可以说，没有刘硕仁先生这些可贵的劳动，就没有《京剧脸谱》的可喜成就！

卢天骄虽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但她笃信“艺海无涯”，决心“活到老学到老”。1981 年领导给卢天骄派下了设计《中国古代钱币》的任务。卢天骄曾再三婉拒，原因是她过去对古代钱币既无研究也无兴趣，但领导认为卢天骄完全可以胜任，故坚持不肯易人。卢天骄硬着头皮接下任务以后，就全身心地投入了设计工作。她首先查阅了大量有关中国古钱币的图书资料，阅读了《中国货币史》、《货币史话》、《贝类学》等专著，研究了中国的货币起源及其发展轨迹，并跑到历史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等学术研究机构当面向专家请教。后来，在古币和邮票专家吴凤岗先生的具体帮助下，选定了 16 种先秦古

币作为创作素材。这些钱币，枚枚价值连城，那青铜古币上的奇妙文字和斑斑锈色，凝聚着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闪烁着中国古老文化厚重而神秘的光芒。卢天骄凝视着这些珍稀古币，爱不释手，但心里又有着历史沉重感的压力。她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在邮票上再现伟大中华民族这一历史与文化的光华。她带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倾心研究古钱币的形制、文字、锈色，生动形象地在邮票上再现了古代钱币的诱人形象，看上去既古朴纯真，又清新可人，让人愈看愈爱看。美国集邮爱好者和钱币收藏者学会对这两组中国古钱币邮票评价很高，称它们“为古代钱币研究领域增添了异彩”，并为此给中国邮电部颁发了“1982年国家年度奖”。

刘硕仁、卢天骄两位邮票设计家的作品，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始终不渝地追求着邮票的民族风格。他们十分推崇齐白石大师的名言：“用我家笔墨，写我家山水。”刘硕仁先生更自豪地说：“我设计的邮票就要让人不看国名就知道是中国的。”卢天骄虽没有这样讲，但她的大量杰作，已经向世人显示了她在追求民族风格上的努力和成功！

“方寸”外面也精彩

在方寸天地耕耘近50载的这对邮坛伉俪，近几年邮事活动逐渐减少，而在邮坛之外，却不断创造着新的精彩。

刘硕仁先生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水彩画学会会员、中华老年文化交流促进会理事、原中国藏书票研究会艺委会委员，现为东方书画函授学院教授。他几年前退休后，有了较多时间从事他钟爱的水彩、版画和藏书票创作等艺术活动。近两、三年里，他以自己的得力之作，多次参加了中国内地和香港、韩国、罗马尼亚、比利时、日本、波兰、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展、版画、藏书票展和大赛活动，并取得了不菲的成就。藏书票《森林的女儿》在罗马尼亚第二届斯拉维支藏书票大展上获荣誉奖；水彩画《荷风细雨》入选《中国美术选集》，《梦幻系列·敦煌NO.1》入选《现代中国绘画》。

卢天骄女士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第七、八届全国妇联执委、常委，第八、九、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这几年，她在担负一定量的邮票邮品设计任务之外，以高度的热情参与了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和参政议政活

动。她十分重视社会公益事业，连续三年资助西藏阿里地区十个小学女生的学费，为此先后获得了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颁发的“热爱儿童奖”，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中华慈善总会颁发的“中华慈善爱心人士”荣誉证书，她的名字被镌刻在《热爱儿童功德法碑》和《中国儿童慈善碑》上。她从重视环保和节约资源出发，在全国政协积极进言献策，提出了《使用绿色包装》提案，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去年召开的全国政协表彰会上，这一提案被授予“优秀提案奖”。在全国政协和全国妇女界，卢天骄又在方寸天地之外尽着自己的社会责任。

(2003 年)

时传祥印象

为了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90周年，邮电部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其中一枚图案是刘少奇和清洁工人时传祥亲切握手的照片。从1878年我国发行第一套邮票至今百余年，工人形象上邮票的可有几回？有名有姓的工人形象更少，与领袖人物一起印上邮票的，恐怕只有时传祥一人！欣赏着这枚邮票，二十年前访问时传祥的情景又生动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那是1964年初夏，一个晴朗的上午。儿童文学女作家杲向真同志（当时是北京市文联创作联络部的工作人员）陪同我去崇文门外的架松访问时传祥。下了公共汽车，又穿小巷，过田埂，走了好长时间才到达崇文清洁大队。大院子很空旷，安静又干净，几排红房子整整齐齐。

时传祥当时已当队长，所以他的房子里有桌有椅有床铺。墙上有好几面锦旗，北墙正中挂着一个大镜框，里边正是印在邮票上的那张刘少奇同志和时传祥握手的大照片。

我们谈话，就是从这张照片开始说

起的。我的笔记本里有这样一段当时时传祥的谈话记录：

“……1959年全国群英会上，刘主席在人大会堂湖南厅接见了我。刘主席说：你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啊？不再吃窝窝头、白菜帮了吧？不再住漏天儿草棚了吧？我汇报了我们清洁工人现在的生活情况。刘主席又问：你们的文化学习搞得怎么样啊？我说：现在好多了。过去，我们队长记名字也只是划勾勾。刘主席又问我自己的文化学习怎么样，我只回答说：工作三十多年了，没上过学，现在学也认不得几个字。说着，我难过得哭了。刘主席说：你四十多岁年纪，还能学嘛！你总不能一辈子当掏粪工呵！朱老总也在旁边安慰我说：别难过，那都是旧社会给你造成的困难嘛！”群英会后，时传祥向全市清洁卫生战线的职工介绍了刘少奇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亲切接见的情景，广大清洁工人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那时候，时传祥虽然已当上了队长，但他仍然坚持和队员们每天挨门串户地一起掏粪。有一天，他和队里的工人们开着清洁车去一家饭庄掏粪；干完活儿发现车子被几辆小轿车挡住了出路。工

人们与饭庄交涉，工作人员表示为难，因为是首长的车，不便移动。时传祥听说后，走进院里要求直接跟首长说说。正说着，彭真同志可能是听到了对话，便走出屋来，见是时传祥，便走过去主动和他握手。时传祥知道彭真同志正陪外宾进餐，而自己刚干完活儿，手不卫生，便不肯伸手。彭真同志说：不要紧呀！便拉过时传祥的手用力握了起来……

时传祥，这位当年与李瑞环、倪志福、张百发齐名的老模范，以他的思想、品格和行动，恪尽了国家主人的职责；领导人和时传祥亲切握手，正表明工人做为新中国主人地位的确立，也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与劳动人民心相通、情相连。

（1984 年）

鲁迅纪念馆两得纪念戳

上海，是中国文化革命先驱鲁迅先生晚年生活和战斗的前线，也是他病逝和安葬的地方。今年又是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怀着景仰的心情，在星期天一大早就奔向了上海虹口公园。

按照路标的指引，先去鲁迅墓拜谒，将在园中小路上捡得的几片冬青叶和如同玉兰花一样素雅的不知名的花瓣，放在刻写着毛主席手书“鲁迅先生之墓”的墓前石台上。伫立静默良久，便转去参观鲁迅纪念馆。

在纪念馆的售票处购买了一张印刷精美的如同书签一样的参观券，上面印有周总理题“鲁迅纪念馆”手迹和纪念馆图案。我试着问：“有纪念戳可盖吗?”女工作人员说有。随手便递我一方形石印，上刻：“上海鲁迅纪念馆”七字。我先在参观券正面盖上一印，又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贴有鲁迅头象纪念邮票的信封，在邮票下端的版边上加盖了这方玫瑰紫色的纪念戳。

我心满意足地离开售票处，拿着参观券走向纪念馆。入门处一位五十上下年纪的女工作人员向我要票。我向她展

示一下说：我买的是纪念参观券。她笑了，说："不收你的票！放在这里，我给你盖个戳就可以了。"哦，原来是以盖戳代替销票，这比起收票、撕副券、打洞，可算上是最文明的销票办法了。我按她要求，将参观券背面朝上放在那里，她操起一枚橡皮图章轻轻一按，呵，竟又是一枚漂亮的纪念戳！较之前者，字迹更加清秀古朴，"上海鲁迅纪念馆"七个篆字分两行排列，左三右四，按字位围边随形加框。意外的收获使我欣喜非常，便请求借过一用，遂将前已盖了售票处纪念戳的几枚邮封，又都加盖了这枚蓝色的纪念戳。

这两枚内容相同，字体、戳型、印色各异的纪念戳，前者是"求"得的，后者是"碰"。到的。人们常说，有些事情，有些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在我来说，这不是既可遇又可求吗？

(1981 年)

"一大"会址喜遇热心人

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纪念日。去上海前我就有一个热望：到了上海，再忙也要抽空去瞻仰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

是日，春雨绵绵。会址纪念馆所在的黄陂路没有公共汽车、电车可达，好长一段路只能在雨中步行。经过不断打问，路人指点，好不容易到达了目的地，却见纪念馆周围，灰砂石堆积，脚手架林立，显然，建筑物正在修葺。我伫立雨中观瞻片刻，便进入半开的纪念馆小门，想试试能否进到馆内看看。

不大的一间办公室内，坐着一男一女两位值班的年轻工作人员。待我说明来意，两位同志都客气地站立起来。那男同志说："为了迎接建党六十周年，会址正在大修。很对不起，无法请你到里边参观。"我很遗憾，但又不好强求。于是我想，参观不成，盖个纪念戳不是也很有意义吗？他们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说着，那位女同志就动手翻起抽屉来。显然是没有找到，就又跑上楼去。等了一会儿，女同志下得楼来说："钥匙锁在楼上柜子里，今天是星期天，管图

章的同志休息，请明天再来盖吧！"我为难地说："明天我还要开会，而且两三天后就要返京。"两位工作人员见我为难的样子，很是同情，但又爱莫能助。

也算是急中生智吧，我想能不能把信封留下，请他们代为盖好纪念戳后，寄到我的住处呢？我的请求又得到了应允。于是，我把贴有"一大"会址图案邮票的自制纪念信封，写好通讯地址和姓名，留给了两位热心的工作人员

第二天下午，在我开会的住所——延安饭店，收到了"一大"纪念馆来信。信封一枚圆圆的大红戳印，盖在了邮票的左下部位，信封背面还加盖了一枚同样的戳印。

纪念戳以红五星和齿轮、麦穗作花边，上嵌毛主席手书"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八个大字，下有"1927. 7."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两行小字，中间镶有"会址图"，与邮票上的图案相近而又相异，交相辉映，很是耐看。

我珍爱地欣赏着这枚信封，深深地为纪念馆工作人员的热心而感动。这是一枚政治性、艺术性融于一体的纪念信封，也是一件充满人情味与责任心的纪念品。

（1981 年）

西泠印社无社印

在杭州落宿的饭店小卖部，买到了一组印有西湖美景的信封。其中一景是西泠印社。

顾名思义，我推想驰名中外的西泠印社，定有大量的金石艺术可供观赏，而且必将有若干出自名家的金石篆刻可供游人钤印留念。如是，不正是我集邮集印的大好机会吗？于是我将印有西泠印社景色和字样的信封，加贴上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方篆刻为主要图案装饰的纪念邮票，放在提包内，直奔孤山。

西泠印社位于西子湖畔，中山公园西侧，是孤山园林的精华所在。山下有西泠桥，印社可能即因桥而名。印社为群众性学术团性，创始于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首任社长为近代杰出写意花鸟画大师吴昌硕，现任社长为浙江书画界名流沙孟海先生。每年夏季，各方金石书画名家多会于此，切磋篆刻艺术，交流书画心得。

这天下午，我们一行十余人同游西泠。自山脚拾级而上，石径两旁，花木繁茂。我顾不得左顾右盼，直奔山顶。

先参观了设在观乐楼的“吴昌硕纪念室”，正面有先生雕像，壁橱内陈列着先生和当代名家的书画篆刻。从这位艺术大师的平生杰作，已可见印社的名不虚传。山上，碑文石刻，牌匾楹联，比比皆是。而且多是出自名家手笔。售品部内陈列着大批书画碑帖，印泥章料，佳笔香墨，供游人任意选购。

我向工作人员询问；有无西泠印社的金石篆刻可供加盖留念？回答很是干脆：没有！我表示奇怪和遗憾。另一位补充说：过去倒曾有过，后来不知去向了。听此一说，犹如当头浇下一瓢冷水，着实让我的心凉了半截。看来，我苦心制作的纪念信封，只好怎么带来怎么带回去了！

可能是受了这里太多的楹联诗对的熏染吧，我随手在那枚信封上写上了两句话，以表达我抱憾离去的心境：

西泠印社居然无社印，

求刻心诚实在枉诚心。

（1981 年）

"双春双雨"封记

北京晚报登载一条消息：甲子年有两个"立春"、两个"雨水"，谓之"双春双雨"。这种现象，六个甲子即三百六十年才出现一次。看了晚报，我想如果在这数载难逢的日子里贴甲子年（鼠）邮票销以邮局日戳，不是很有意思吗？于是，我自制了一枚信封。为突出主题，我设计并镌刻了一方"六甲子一遇也"随形印章，盖在了信封的左下；右下，则手写了"双春双雨封"五个篆字，盖上名章，信封上方，并列贴了四枚鼠年生肖邮票。红章，黄票，绿字，信封显得生动而和谐。甲子年正月初二，即1984年2月4日，在北京永定门内邮电所销盖了第一个"立春"的邮戳。不几日，我因公出差，看来第一个"雨水"是非在外地度过不可了。为了不误"邮时"，只好让这枚信封跟我远行了。2月19日第一个"雨水"，我途经武汉，落宿的汉口饭店旁就有家邮局，我在那里销盖了甲子年第一个"雨水"日的邮戳。

过去了整整十二个月，1985年2月4日，甲子年第二个"立春"匆匆而来，我在北京新街口邮局加盖了当天的日戳。

2月19日，即甲子年除夕，在北京阜外邮局加盖了甲子年第二个"雨水"的邮戳。印在信封上的这四枚小小邮戳，记录了三百六十年才能一遇的节令现象，可谓是集邮与历法结合，知识与趣味共生矣！

（1985年）

按图索骥游留园

苏州园林，名闻天下，而留园可称是苏州园林之冠。因之，我国发行的第一套园林特种邮票即以苏州留园为主题，是再确当不过的了。

去游留园，我特意带着一枚刚刚发行不久的留园邮票首日封。在园内，悠然漫步，“按图索骥”，对照实景欣赏邮票，对照邮票观赏园林，的确是一种特殊的享受！

留园邮票一套四枚，票名分别是：“春到曲溪楼”，“远翠阁之夏”，“涵碧山房秋色”和“冠云峰晴雪”。现在正值阳春三月，当然只有“春到曲溪楼”的景色是最合时宜的了。你看那一溪春水，清彻碧透；桃红柳绿，香气沁人，亭台楼榭，瓦檐翼然如飞。在邮票图景的启迪下，那远翠阁外似乎已经听到了蝉鸣，涵碧山房似乎已染上了秋色，冠云峰上飘起了白白的雪花……一边观赏，一边体味，我真真为著名邮票设计家孙传哲老先生对留园观察体验之细，选美捕秀之巧，描景构图之精而折服！

入园时，我便想能在留园首日封上加盖一枚留园的印章，向入门处的工作

人员打听，说办公室在留园后边。但游到园的尽头也没有找到，再打听，却说办公室在一进园的地方。我不放心，又问了另一位工作人员，证实办公室就在入园处。

既然有了确切的地点，我便放心地在园内漫游起来。及至来到园门口，找到办公室，却吃了“闭门羹”。我着急地去问园门口的管理人员，他说：“管印章的吃午饭去了！”我一看手表，可不已过正午！又问什么时候回来，答：“下午一点半上班才会回来！”因为我还有它事要做，不可能在这里等到一点半钟。于是，只好回首三望留园大门，怅怅离去。

真是悔怨交加！悔的是没有早一步赶到“掌印人”下班前返回门口；怨的是开始告诉我办公室在公园后边的工作人员太不负责任。

(1981 年)

寒山古寺藏碑印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唐朝诗人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算得上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名作。如今，在北京王府井的工艺美术门市部或者琉璃厂的哪个“斋”里，大都可以买到一帧张继诗碑的拓片。然而，诗中所写的寒山寺现状如何，张继诗碑现藏何处，却未必如张继的这首诗那样，被众多的人所知晓。

来到苏州，各个园林内外，许多工艺品或文物商店，都可以见到印着或刻着张继诗作的拓片、砚台、金属牌陈列售卖。看到这些，就会更增加你非要游一游寒山寺不可的劲头！

寒山寺位于苏州市阊门以西，相传建于公元五百年左右，原名“妙利普明塔院”，唐时始改名寒山寺。寺内一派庄严肃穆气氛。大雄宝殿香烟缭绕；钟楼碑亭，古而不衰；两庑和回廊内有许多诗文碑刻，张继的诗碑即藏于此。据说，张继诗碑本为明朝人文征明所写，经年累月，字迹剥蚀漫漶，至清朝道光年间，经俞曲

园（樾）重写再刻。现在所见张继诗碑拓片，皆出自寒山寺所藏。

有人说，寒山寺因张继诗而扬名；也有人说，张继诗因寒山寺而传世。这我无从考证。但寒山寺在海外，尤其是日本也声望颇高，是可以找到佐证的。寺院内有几株日本五叶松，正在濛濛细雨中抖擞精神，茁壮成长。幼松旁边树立的小木牌上，分明写着；“日本爱媛县友好代表团赠送栽植”，“日本第二次石川县人民友好之翼访华团赠送栽植。”

走进寺内的售品部，四周陈列着许多珍贵的字画、文物，但最为醒目的要属高悬于壁的张继诗碑拓片了。我正倾心观看，同游的一位朋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轻声说：“看，好大个印章呵！”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原来是一位年轻的姑娘，正捧着约有八公分见方的大印，全神贯注地往一帧张继诗碑拓片上加盖。同游的朋友鼓动我：何不请她为你的邮封盖上一个留作纪念呢！我说：我当然愿意，谁知她肯不肯给盖呀！同游者见我踟蹰不前，便热情地替我向姑娘提出了请求。大概也是一种盛情难却吧，姑娘稍显迟疑，便表示了同意。我忙从所携的几枚信封中拣选出一枚尺寸最大的、贴着鸡年邮票、加盖“辛

酉年”纪念邮戳的首日封，平放在玻璃柜台上。只见姑娘在印泥盒里饱蘸了一下印泥，然后双手捧印，庄庄重重地在我的信封上稳稳一按。待她抬起手来，但见白封红泥，篆刻“姑苏寒山寺藏碑”七个大字赫然纸上，端端正正，清清楚楚。我不禁心中暗暗叫绝：好一方漂亮的宝印！

我不知这方大印出自寺内哪位高僧妙手，还是哪位篆刻艺术大家的杰作。反正盖有寒山寺宝印的这枚信封，将永远珍藏在我的邮册之中。

（1981 年）

别府“地狱”

中国友好人士访日团在东京访问三天。顾问团和各分团与日本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友好交流活动之后，顾问团便分为两路，一路由访日团最高顾问叶选平率领去北海道访问，我们则随黄华团长南下去了熊本和大分。

大分县的别府，是著名的温泉之乡。看那到处白烟升腾、热泉涌流的景象，兀地使我想起了《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写我国泉城济南的佳句“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来。

别府有许多名泉，有的只供游览参观，有的可供洗浴。我们参观的“海地狱”是专供参观的温泉公园。“海”是温泉的名字，因为这个喷涌的泉水颜色如同海水一般湛蓝，一般清澈。在“海地狱”旁边，还有一座“地狱”，水色紫红，连池中的块块巨石也都被染成紫红色，但没有名字。我曾想，如仿效“海地狱”的命名，称它为“火地狱”倒也贴切。至于温泉为什么会与地狱联系在一起，说法不一，有一说是因为它沸沸扬扬，热气蒸腾。据说生鸡蛋放人池中三分钟便可煮熟，那么人体入温泉也就如同入地狱差不

多了。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温泉胜地当然就靠吃温泉。据介绍，全日本和国外来这里旅游的人很多，每年有三四百万人，超过别府所在的大分县全县人口的总和。适应旅游业的发展，当地旅馆、饭店很多，且多以有温泉洗浴为特色。我们代表团的下榻处就是因拥有“别府八汤”之一的观海寺温泉和高档温泉洗浴设备而著称的“杉乃井”饭店。住饭店的客人只要穿上饭店提供的日本和服，即可免费入浴；如果不住本饭店而要来饭店温泉洗浴，则每人每次要付一千八百日元。

浴室宽敞豪华，且文化韵味很浓。拱形大厅中间是一环形大池，水温较高。池中置两尊塑像，一尊是观世音，一尊是如来佛，两座巨佛相背而立，慈眉善目，环顾四方，大有普渡众生之态势。大池周围，有若干小池，水温不同，功能各异，有的可以半躺池中，有的只能靠池端坐，水流翻滚，按摩功效甚佳。有的池还有名目，如，“硫磺汤”、“人鱼汤”等。“硫磺汤”水质滑腻，硫磺味儿很浓，似因水质而名；“人鱼汤”则在池中立一“美人鱼”像，似因塑像而名。

在“汤”中泡够，可以走上大理石铺

砌的平台上小憩，或仰或卧，悠然自在，亦可以去沙池中埋沙以自乐，还可以进桑拿浴室接受水蒸汽的“熏陶”。妙的是这些设施全都设在同一间大厅之中。

在温泉浴室中泡了近一个小时，对所有洗浴项目都体验了一番，不仅洗去了一路风尘，而且得到异国的文化享受，身心都觉有益。当然也有我们不习惯的东西，比如在男浴室中出现了女服务员的身影，而且旁若无人，落落大方。同是东方文化，但又有明显不同处。

游“海地狱”公园时，导游赠每人一枚印有别府温泉风光的明信片，我在园内加盖了一枚“海地狱”的日文纪念戳。在翻译的帮助下，我把纪念戳上的文字附会成二首日本徘句，以表达我对这座日本泉城的美好印象：

别府海地狱，
琼楼玉宇飘云气。
一似春潮急。

别府海地狱，
遍地清泉山水碧。
游人不忍去。

（1993年）

天草闻鸡

中国友好人士访日团顾问团的部分成员随黄华团长从东京南飞熊本县，主要是去天草为已故日本前副首相兼外相园田直先生扫墓，并拜会园田直夫人园田天光光和园田直之子园田博之先生。

这天，晨起即微雨。汽车自熊本城堡饭店出发，沿海岸公路曲折南行，一路上饱览了日本南部地区的宜人风光，历经两个多小时，才抵达目的地。

到了天草，已时近中午。未及休息，即出席了熊本县日中交流会天草支部、天草市町长会举办的欢迎宴会。天草町长久久山义人先生和园田博之先生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黄华团长充满深情地追忆了园田直先生生前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所做出的历史贡献，用“饮水不忘掘井人”这句中国俗语表示对园田直先生的怀念之情，并引用清人赵翼“江山代有才人出”的诗句，赞扬天草山青水秀，人杰地灵，人才辈出。

午宴后，我们一行人又冒雨乘车去崇芳园寺为园田直扫墓。寺内置备了香案，在园田直夫人和公子陪守下，黄华团长带领大家向这位为中日友好作出过历史贡献

的日本朋友行鞠躬礼，并每人拈上一撮香末，撒入燃着的香炉。细雨蒙蒙，香烟袅袅，使气氛更加庄重肃穆，使大家对园田直先生的怀念与敬仰之情，更显得浓烈，更显得深沉。

祭扫之后，我们一行又乘车去瞻仰园田直先生铜像并栽树留念。年已八十高龄的黄华团长，带领大家挥锹铲土，不一会儿，就在铜像旁栽种好两株碧绿的山茶树。微风细雨，滋润着这象征中日友好的山茶，预示着她一定能茁壮成长，根深叶茂，树大参天。

在天草一天的访问活动中，宾主双方在讲话、交谈中，引用最多的是园田直先生生前说过的一句诗一样美妙的话："在天草，早晨可以被上海的鸡鸣叫醒。"这句话，不仅表明了天草和上海两个城市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更表明了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深情厚谊。

为了纪念这难忘的天草一日，也为了表示对园田直先生的怀念和崇敬之情，在熊本县知事举行的欢迎晚宴上，我请黄华团长为我从北京带去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邮票首日封题字留念。黄华老放下酒杯，提起钢笔，欣然写道："园田直先生曾说，在天草能听到上海早晨的鸡

鸣。来到天草，更觉中日友谊的无比深厚。”

是啊，天草之行，我们都有同感！

（1993年）

向潘家园交学费

据说，收藏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在市场上捡了“漏儿”——花小钱儿买了好东西，也不露声色，不炫耀于人；反之，如果花大钱买了假冒伪劣，俗说“走了眼”，也从不声张，自认倒霉，因为说出去怕丢人；想开一点的，就当是交了学费。

本人有时也去逛逛收藏市场，如潘家园、报国寺等，但算不上藏界中人，因为藏龄短，藏识浅，至多是个藏趣初萌的门外汉。在市场上从没花过大钱，小打小闹找乐子而已，所以，既没有过“捡漏儿”的特别惊喜，也没有过“走眼”的特别失落。

但学费还是要交的，而且不止一次两次。

专家说：这些钱币“恐怕都不行”！

有一阵儿，我对古钱币产生了兴趣，在家翻箱倒柜找出了十几枚，但都属常见币，在市场上块儿八毛即可买到。

一天，在市场小摊上见到一枚从没见过的铜币，是唐开元通宝，但比一般小平“开元”边缘奇宽，整体如银元大小，我看着新奇便买了下来。回家一查图录，着

实吃了一惊，图录上称此种为“阔边开元”，标定为“无价”。天！难道会是一枚无价宝!?我并没有利令智昏，因为我知道，潘家园的淘金且识货者成群结队，而且不乏真正的古币专家，光我认识的就有好几位，奇珍异宝怎能逃过他们的慧眼?

那时，德胜门城楼上经常举办钱币展览并有专家咨询。我拿上这枚“阔边开元”去向专家请教，一位约五十开外的女专家，接过去只看了一眼，便很肯定地说：这是一枚变造币。我不明其意，便进一步讨教。女专家诲人不倦，说：这是用小平开元外郭又加了一圈儿紫铜，没有任何收藏价值！我按她的指点仔细看了半晌，却怎么也看不出一点破绽。但我丝毫也不怀疑专家的结论，只怪自己学识太浅。

又一天和一位朋友同逛潘家园，朋友发现一地摊上摆着几十枚大小不一的铜币。我拿起一把审看，觉有些年号甚是生疏，有的属于哪朝哪代也搞不清。朋友先挑了十几枚，以 100 元购得，余下 20 来枚，我以 150 元买下。

那天正是国际钱币邮票展览会开幕，我和朋友一同赶去会展中心看展。一进门正遇上曾任邮票博物馆馆长的邮币大家吴

凤岗先生，我忙趋前向先生问候。正好我的朋友带着才买的那十几枚钱币，便呈给吴老审看。吴老把一摞钱币放在左手心里，右手很不轻意地一枚一枚翻动一过，然后微笑着慢声细语地说：这些恐怕都不行！评语是含蓄的，但意思是明确的：无一真货。

吴先生问：多少钱买的？朋友告：一共100元。吴先生从中拿出一枚最小的铜币，捏在右手拇指与食指间说：这是一枚清代的新疆铸钱，如果是真品你知道要多少钱吗？我俩同时摇头。吴先生说：5000！光这一枚就价值5000元，而且还很难找到。为了它，我曾在乌鲁木齐转了两天，却一无所获。

我曾听一位藏币的朋友讲古币辨伪的学问，在他讲来，似乎真假之间就如同农民区别稻穗与麦穗一样简单，但在我听来却不啻听广东人与上海人用方言对话一般，不知所云。如此水平，人家当然蒙你没商量了！

是“石核”，不是龙蛋！

七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去潘家园闲逛。时近中午，阳光骄热。一个摆地摊的外地青年一边叫卖一边收拾，似要收摊回家的味道。

摊位上摆着几个椭圆形的大石球，石球一端还都有个尖尖。那时候，刚听说外地发现了恐龙蛋化石的消息，但没见过照片更没见过实物。出于好奇，我问摊主这是不是恐龙蛋呀？摊主还未答话，旁边站着的一位本地人却搭讪说：这么跟您说吧，东西是好东西，至于是不是恐龙蛋，您比我圣明，这里的“雷子”那么多，就是真家伙谁敢明着说？那摊主看出我在犹疑，便说：您若让我打保票说这是什么，我也不敢。可您再瞧瞧这个，也许能帮您下下决心。说着他从身后的麻袋里拣出一个一分为二的石球，那剖面所显示的着实让我吃惊：薄薄的一层外壳有韭菜叶宽，里边是一圈松花蛋青的颜色，再往里是一团更深的青色。在这形同蛋黄一样的核心部位，赫然镶嵌着一幅白色的龙形图案。两个半球剖面的图案几乎相同，活生生一对龙舞图，合起来则严丝合缝，完整无缺。我不再迟疑便掏钱买下。

一次在餐馆吃饭，偶然看见那“九龙山”矿泉水瓶上的商标图案，与那石球中的图案十分相像，便随手取下了商标。待回家一对照，不禁令我顿生奇想：难道古人所想所绘所崇拜的神奇而美丽的龙，真是实有其物吗？

为了证实我的奇想，我决定向科学家求助。我把石球图案照片送给时任市科委主任的朱相远同志，请他转请有关专家看看。不久，接到自然博物馆一位专家来信，称：据判断此球不是生物化石，而是“石核”，是地球运动过程中土块滚动形成球体，又经多年演化而成。核心部位的图案当是因有硅化物质而自然形成。

专家的分析有理有力，我心服口服。但心中多少还存有失落之感。专家或许猜到了我可能产生的情绪，所以在信的末尾还写了这么一句：尽管它不是生物化石，但石核中的图案还是很好看的。这句话还真给了我不小的慰藉。

“宋碗”，假了谁管退！

我不懂陶瓷，也从不收藏陶瓷。但有一次却鬼迷心窍，硬是花200元买了一个新做的瓷碗。在潘家园东部的一个散摊上，摆着几个酱色釉的碗。摊前摆出一张写在马粪纸上的告示，公然申明：新出土的宋碗，若假了管退！五六位文化人模样的人拿着一只大碗站在摊前大声评论着，还有四五个同样像有文化的人蹲在摊前忙着挑选。这种热闹场景出现在一个货摊上的时候是不多见的，引得我好奇地走过去看。这时，一位背头油亮面庞白皙的中年

男士，刚好选中了一只，用双手顺着碗沿摩来摩去，夸赞说：到底是老玩艺儿地道！再便宜点，二百吧！那摊主也像个文化人，客气地说：老主顾了，拿上吧！于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另一位蹲在地上的男士站起来，有点想趁热打铁的架势，说照这价儿我要两只。那摊主迟疑了一下，笑着说：主顾不分新老，一视同仁，您拿走。这位文化人模样的顾客交付 400 元，捧走了那两只碗。

这时，我的心动了。过去，只读过几首宋词，却没留心过这宋瓷是何模样。但我见那两位“文化人”都肯掏钱了，还能有假。况且我对那摊上摆的两只带着模具(术语称“范”)的碗很感兴趣，为了增加一点陶艺知识，于是便拿起一只细看。这时几位站着侃山的文化人都向我围拢过来。这个说，这带范的碗更有历史感和艺术感。那个说，这带着范的碗更难得，颇有点原始的味道！

我很庆幸自己的审美趣味遇到了知音，而且看上去绝对是内行的知音。一问价，摊主开价 400 元。我说刚才那人挑的那只那么漂亮才 200 元，这只粘着模子的怎么反倒贵？摊主说，您刚才没听这几位

行家说吗？带范的更难得。我稍一坚持，摊主便让了步，以200元成交。那天，正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朋友李云龙来电话，他是著名的剧作家兼古瓷收藏家，我便向他说起买到宋碗的事。他毫不含糊地说，那全是新活！我早晨也看见了，是不是还有粘着范的？我说，我买的一只就是带范的！电话里传来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我说，不要紧，反正他写着假了管退，下星期找他退了去！

待我下周再去潘家园，不要说那摊儿，那天那堆人也连个人毛儿都找不见了！花200元钱买了件不值几元的假碗，虽然让我心疼了一阵子，但几天也就忘却了，使我抹不去的心痛是那几位貌似文化人的人们。他们如果真是乔装打扮的“托儿”，那还可另当别论；但如果真是文化人却为着一己私利而干起这没有文化的勾当，那可就太令人悲哀了！因为凭着自己的那点聪明才智，干点什么正经营生，也会比干这种坑人的活计要有价值得多！

（2002年）

文化集藏忧喜录

当今“文化”一词内涵是愈来愈丰富了，什么茶文化、酒文化、吃文化、“拉”文化——“厕所文化”不正是关于“拉”的文化吗？崇尚文化是好事，标志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然而却也有另一种现象，即不知珍惜文化，甚至浪费、毁灭文化。何出此言？盖缘于潘家园市场的一些见闻也！

不知什么原因，有些文化人，包括一些作家、编辑或是文艺文化部门负一些责任的人，把颇有影响的文化人写给他们或有关部门的亲笔信札，竟作为废物遗弃，其中有些信札集政治、文学、历史、书法于一身，足以作为研究某些作家或某些文艺文化现象、某一阶段文艺文化历史的重要资料，有些还涉及对文艺文化界一些人、一些事或一些作品的评价，有些则袒露着写信人的某些思想、观点、主张和情感。

有的文化机关，对一些文化名人的信札手稿不予保存，也不移送有关部门如现代文学馆存作研究资料，却一概作为废物处理。仅笔者在潘家园市场所亲见，我国当代文艺文化界知名人士如郭沫若、茅

盾、丁玲、巴金、萧三、刘白羽、李季、臧克家、田间、魏巍、邵荃麟、严文井、邓拓、姚雪垠、戈宝权、孔罗荪等的手稿、信札和其他手迹，都曾在这里出现过。据观察，摆在市场摊位上的这些“文化商品”，大多来自文艺文化领导机关、报刊编辑部或印刷出版部门，个别则是有关人士和亲属，或不经意、或不认识其文化价值而遗弃的。更令人费解的是，文学界一位泰斗级人士的《全集》还远未出齐，而与“全集”有关的书信、手稿已经流入市场；有的作家所作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还不过月余，其手稿已经成为“第二次商品”在市场上被叫卖了！人们不能不为此而感到遗憾和忧心。

当然，忧中也有喜。据说，市场上的这些文化商品，有的是在行将进入造纸厂的化浆池时，被人们“抢救”出来的；有的是一些很有眼力的商贩，从废品收购站一座座堆积如山的废纸堆里择选出来的。尽管目的不尽相同，但他们在客观上起到的保护文化遗存的积极作用，是不能不给予肯定评价的。但这喜中仍有忧在。谁能说清，未被捡选出来、已经或正在被化作纸浆或化为灰烬的更有价值的珍贵文化资料会有多少？实在不可估量，实在不敢想

象！

当然，更可喜的是有不少收藏爱好者徜徉于此，刻意收集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文化史料，其重要作用就更应该予以肯定了。

《北京日报》曾载文呼吁“把信留住”。在此，笔者也向文化机关、文化人及文化人的亲朋好友们大呼一声：“请把文化留住！”因为重要的文化遗存，是一笔社会财富，而且是比金银还要难得的宝贵财富，它是属于人民的，属于社会的，甚至有些当是属于全人类的！

（1997年）

让你哭笑不得

逛潘家园市场，常会遇到些让你哭笑不得的事。

有一次，一位中年外地摊贩拎着一沓黄色的稿纸，操着浓重的天津口音高声叫卖："快来买吧，大书法家的手稿！"

我被叫卖声吸引，忙走过去看。他拿的是一沓元书纸印制的16开竖八行信纸，天头印有手写体红字："中国书法家协会。"细看那纸上的墨笔字写得确很漂亮，且觉得颇有点眼熟。便问："这是哪位大书法家写的?"

"林一先生！全国也顶有名的！"天津话说得又快又脆，而且透着"哏"。

我几乎笑出声来。本来我还只是猜想，他这一说，使我一下子恍然了：这肯定是我与之曾共过事的林一书同志所写的了。但又疑惑：林一书什么时候成了大书法家？又什么时候起了个"林一"的雅号?

这位天津老弟指着信纸，毫不含糊地大声说；"您看，这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专用信纸，不是大书法家能用得上这种信纸吗？您再看这儿——"他迅捷地翻到最后一页，指着签名处说："这不是写得明

明白白：林一书，就是林一写的嘛！”

我知道这位老同事已于一年前辞世。如果他在天有灵，对这位无知又只想赚钱的商贩，竟把他的名字一分为二并冠以“大书法家”的桂冠，会作何感想？反正我是有点哭笑不得！

还有一次，见一个摊位上摆放着好几张字画，因为不懂，所以并不留意看是哪些位名家的手笔。但字画旁放着一纸信笺却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张印有红色竖格的宣纸信札，纸被揉搓得皱皱巴巴，但字迹清楚，且明明白白署的是“雁冰”写给“宝权兄”的。稍有文学常识的都晓得，雁冰即沈雁冰，刚好是百年诞辰的文学前辈茅盾先生的名字；宝权，即著名苏联文学研究暨翻译家戈宝权先生。我很高兴地双手捧起信笺细看，内容说的是交付《人民是不朽的》一书译稿事，从内容看是可信的，但文字笔力稚弱，且字间结构散乱，行距不一，有的字行还偏离了红格。我虽然疑其系伪作，但想或许是茅公暮年之作，况且索价不高，便立即买下。待回家仔细端详，愈觉可疑。遂通电话向一位老作家请教。老作家听过我的描述后说：“茅公治学做事都是非常严谨的，他写信一般不会出格，从这点判断，也八成

是伪作。”我听了虽有点泄气，但仍将信将疑，或说总希望梦里成真。

几周后再去潘家园，无意中竟在两处看到了与我所购内容相同、字迹相近的宣纸信札，其中一封仿造得比我买的那一封还更像一些。这还需要鉴定吗？同一内容的信怎么会有几封？显然都是赝品！

这一次，我在哭笑不得之余，竟还有点欣慰：花几元钱又长了点见识。

（1996 年）

旧货市场里的“老外”

北京城东南三环以里二环以外，有个潘家园旧货市场。它以丰富的民间藏品和北京内外的商贩所提供的大量旧工艺品，吸引着众多的收藏爱好者。光顾这个市场的，不仅有一般收藏爱好者，还有不少名流学者、党政官员、企业干部，而且外国人来此淘金购物者也为数不少。

有一位黄头发大鼻子高身量的青年人，时常不声不语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搜寻。一天，两个相邻的摊商看他来了就小声嘀咕。这一个说；“这‘老外’整天在这儿转悠，也不知他想抓点什么货?”那个说:“你不会跟他套套瓷!”这一个便笑着对高个子打招呼:“喂，朋友，你是哪国人?”那高个子“老外”抬抬头，没什么表示，仍低头看地上摆放的商品。那一个便说:“这洋哥儿们八成儿不懂中国话。你用英语问他是哪国人。”这一个便用生硬的英语问了。不想，那高个子笑着摇了摇头，耸了耸肩，用清晰的汉语普通话大声说：“我不是人!”那两个摊商都听愣了，大个子“老外”又接着说：“我是魔鬼！不过，你们不必害怕，我不吃人，可你们也别想宰我!”声音清亮宽洪，很有

点说相声的洋学生大山的风格。两个摊商一听都笑了。这一个对那一个说：“敢情‘老外’也有嘎小子，比你还得嘎三分！”

“老外”里也不乏行家里手。有个五十来岁的男子，蹲在一个卖古钱币的摊位前，挑来选去，拣出六枚清代铜板，即向摊商示意报价。摊商打着手势告诉他六枚一共要价 30 元。

那老外说：“怎么算法？每枚 5 元？”摊商点头称是。那老外从他挑选的六枚中又单拣出一枚，说：“5 元，我只要这一枚吧！”摊商说：“单要这一枚，您得给 20 元。”“老外”故作惊讶地问：“你怎么搞的？不是 5 元一枚吗？这一枚为什么要这么贵？”摊贩说：“这枚是稀少的，要你 20 元并不算多。其余几枚，给个三块两块就卖给你。”

我出于好奇，刚想拿起“老外”选中的那枚铜板见识见识，那“老外”却抢先一把从地上抓起来说：“我买了！”随即掏钱付款，然后向我自鸣得意地说：“20 元不贵？钱币书上标价 5 美元。”“老外”走后，那摊商摇摇头说：“这家伙，敢情是‘钱虫子’，比中国人还精！”

外国人不“精”的也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外国妇女，从一个摊位上拿起一只新

铸的铜质香炉，操着不太流利的中国话问：“天坛?”那摊商迟疑了一下，随即顺口搭音说：“对，天坛！皇帝老子祭天的地方！”“真的?”“真的！”摊贩报了价，那外国妇女也不杀价，付款后抱起香炉就走，一边欣赏着口中还直念叨；“天坛！真的美极了！”摊商见外国妇女走开了，俏皮地说：“真的？真的你抱得动吗？这玩艺儿才是真的呢！”说着，把那张100元面值人民币新票举在头上照了照，用中指弹得“叭叭”直响。

（1996年）

不可小视的摊主

潘家园市场的经营者，大体来自三个方面：北京的个体商贩，外地（主要是天津、河北、东北）的个体商贩，外地来京的打工族。可以说是鱼龙混杂，也可以说是藏龙卧虎。

有位老者，年近八旬，专营有关红学研究的旧书刊。与众多摊主不同的是，这些书都是经他细心研读过并且认真作了摘记的。近三十年来，他遍览红学书刊，边读边记，至今已摘记了一百多万字的卡片，可望有一天能够付梓出版。卡片分类颇细，按人按事按景按物，据说光是涉及林黛玉眼泪的就有十几个条目。如何评价这一研究的价值姑且不论，单就作为爱好，竟下了这么久、这么大的功夫，也足令人肃然起敬了！有人问他为什么把这么多书都要卖掉？他不无感慨地说，卡片摘过，也就用不着了。与其将来被当作废纸处理掉，不如我现在用它换点钞票，吃点儿喝点儿打个“的”什么的，岂不方便；再者，别人买去也还有点用场。有意思的是，连刚刚出版不久的周汝昌先生新作《红楼艺术》，他也已经看过了、摘过了，并且卖掉了。

年轻的摊主里，也不乏希望之星。有位三十上下的年轻人，不知名姓，也不知来自何方，看上去其貌不扬，从谈吐和气质判断，文化层次不会太高。但一段时间来，进步颇快。一年前初次见他，摆着个地摊，什么破烂都卖，而且漫天要价，但又几乎给钱就可成交。一幅无名氏的粗俗画作，也许张嘴开价一千，而一幅名家书法，或许只要个百儿八十元。现在可大不一样了。我曾听他跟人侃画儿，一连气竟说出好几位新老画家的名字。听说，为了卖画和求知，他与几位画家成了朋友，遇有关于书画的问题，他便登门造访，而画家们对他也欣然接待并不吝赐教。难怪有时他对某些画作也敢评评点点的。有一帧书法条幅，他没有看清署名竟判断出是哪位方家手笔，简直令我惊叹。有次听他与人议论，似乎他看到什么人收集到了与谢觉哉同志有关的信札资料。他知道谢觉哉是“延安五老”，并且一连串说出七八位党内外老同志的名字。

看着这位貌似土里土气的年轻人，我产生了“士别三日”之感。是什么使他提高得如此之快呢？是市场。市场这个大学校培育了这位青年。因为在这里，不论对卖者或买者来说，不仅商品是金钱，

知识也是金钱，而且是含金量更高的金钱！

（1996 年）

假相后面是假货

逛潘家园市场，常常碰上一些以假相推销假货的趣事。

一个大清早，一位农民打扮的中年人，穿着粗布白坎肩儿，黑色平纹布裤子，双手抱膝蹲在市场外面的马路上。他面前放着一个农村常见的提梁荆条小筐，筐里放着一具不大的铜车马。那车上马上都沾满了泥土，湿漉漉的，让你看不清真面目。那人不吆喝也不张扬，极像个憨实木讷的老农民。

“这是什么?”有两个人几乎同时发问。

“谁知道是什么!”那老农满脸迷惑地说，“谁看着有用，就拿走!”

“哪来的?”有人又好奇地问。

那老农民讲故事似的说；“早晨锄草，一锄锄出个这！咱庄稼人要它派不上用场，谁有用给几个辛苦钱，拿走!”

说话间，围拢的人便也多了起来，这刚出土的玩艺儿显然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有一位心急手快的人，蹲下身去用手在那马身上抹了抹，锃亮的新铜色泽便露了出来。他在筐边上蹭了下手指头，没说什么便从人群里撤了出去。又一位好事者

弯下腰去伸手抹了两下，又是一片锃亮的新铜色暴露出来了，这人自己跟自己摇了摇头，也撤出了人群。这时，像是谁人下了个解散令，围观的人一下子全散开了。妙的是，众多的买主和看客中，无一人当众戳穿这个把戏。那“老农”见众人走散，才慢慢地站立起来，提起荆条筐，自言自语地说：“谁说潘家园这鬼地方钱好挣呀，扯淡！”

在市场入口处不远，一位操着浓重南方口音的小白脸儿挡住了我的去路，神秘兮兮地低声说：“老先生，要不要古董？”我见他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便搭讪说：“什么古董？”“铜佛！”他随手从一个黑色破人造革提包里拿出了一个纸包，打开两层破报纸，里边包着的原来是一件在市场上常可见到的、花上 10 块 8 块就可买到的劣质铜制品。接着，他更神秘更轻声地趴在我的耳边说：“我们在昌平的一个庙里施工，挖地基时挖出来的，少说也有几百年！”

“那你怎么不摆出来卖？”我故意问。他笑了，说：“你老先生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摆出来工商要查的，查出来是要罚的。挖出来的古物通通要上交政府的！”我故作严肃地说：“那你为什么不上交？

你不怕我就是工商?”那小白脸儿马上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也不知从我身上看出了什么，刚才那股推销假古董的热情立时烟消云散，边往后退边说，“算了，算了，你老人家不买就算了，干嘛这么认真呀?”

一位藏民打扮的摊主在叫卖“藏药”。藏红花、冬虫夏草，还有虎爪、虎骨、虎鞭……摆了一地。一位朋友想买点冬虫夏草泡酒喝，一问价格挺贵，但比起同仁堂、友谊商店来价格还是低得多。于是便抓起一把想挑一挑。摊主操着有点生硬的普通话说，“我这藏药都是喜马拉雅山上采来的，货真价实，你去药店，多花一倍的价钱也难买得来。”这位朋友忽然想起“便宜没好货”这句格言来，便说:“你这药不会是假的吧?如果你今天蒙了我，明天我就找人把你的摊儿给端喽!”那小贩一看这人来头不小，马上求饶说:“大哥，您今天别买了，我明天给您奔点真货来，行不?”“你这冬虫夏草是怎么回事?”那摊主连连作揖，放低了声音说:“全是我用面捏的!”妙的是，他这会儿说话好像也不那么舌头发硬了。

（1998年）

“托儿”们的艺术

不少市场都有“托儿”，特别是不规范的马路市场、大棚市场。潘家园旧货市场也不例外，只不过显得更“艺术”一些。

我的两位书画界朋友自远方来，带着女儿逛潘家园，远远地见地摊上有一黑色陶罐，便议论着走上前去。还来不及近前细看，突然闯过来一位背着大背包的男子，横在了他们的面前，背包鼓鼓的，很像是个大买家。那人拿起那只陶罐粗略一看，便问价儿要买。摊主开价六百元，背包男子说：“货是好货，可六百多点，四百以内还值。”摊主说：“四百以内，买都买不来。”背包男子犹疑再三，但未再加价，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离去了。见此情景，我的两位朋友没有再上前细看，以为那大买家也必是个大行家，便让女儿过去和摊主商量，如果四百元或稍多点即买下来。摊主显得慷慨又大方，没费几句交涉，四百元便成交了。待拿回住地一看，纯粹新活作旧，两位朋友方知上了那“大买家”的当。

我见过一位貌似艺术家的老“先生”。平头白发，满面红光，戴一副玳瑁水晶石

眼镜，看上去既有钱又有派。他经常站在摊位前对着商品断年代、品高低、论成色，听起来头头是道。"买货"时，则手拿百元大钞，高声砍价儿。妙的是，他经常站在一个固定的摊位前"买"货，而且常常与摊主如演相声小品，只是有点喧宾夺主，"老先生"站在那里口吐白沫，声嘶力竭，而那摊主则像个捧哏的，哼哼唧唧，十分被动的样子。我莫名其妙。后有知情者告：那"老先生"才是真正的摊主。

有位朋友收藏文房四宝，每见此类物件，便有点走不动道儿。一天，见一摊位上摆着两个破旧的锦匣，上有签条，书曰："御制香墨"。摊商吆喝不停："古墨甩卖！"朋友刚要蹲下看看，却过来一位抢先一步猫腰拿起一匣，打开来摩挲玩味，然后是问价还价，两盒共要价五百，那人还四百，摊商挥手送客，言语间还有点哂笑买主不识货的意思。那人刚走，转眼工夫又过来一位，手抚墨匣，爱不释手，还价到四百五十元，摊主仍不肯让价，于是这位也只得"抱憾"而去。

在两位不速之客看货还价时，我的朋友已然"旁观者清"，看明白那锦匣乃是人工作旧，所装墨块，则连一点伪装也没

有，不仅是新制，而且是劣质产品。朋友刚想离去，摊主却热情地说：“我看得出来，您老哥才是真正的买主儿，我是好货卖给识家，咱今天交个朋友，两盒您给五百块，我再白送您一盒！”说着，低头从麻袋里又拎出一匣。

我的朋友笑了笑，礼貌地说：“谢谢，我家居陋室，没地方放这么多宝贝！”

“托儿”一词，乃北京土语，指的假装买主儿诱人上当受骗的角色。旧社会江湖黑话有谓：“蔽粘子”一词，即勾串起来行骗的行当。“托儿”的行为谓之“圆粘儿”。窃以为，治“托儿”之术，不在识人，全在识“货”。假如购物者鉴赏能力高超，“圆粘儿”的伎俩再狡猾，恐也难奏效。

（1997 年）

乌市买刀记

到乌鲁木齐不能不去民族市场。对许多人来说，那比到北京必去王府井，到上海必去南京路，到天津必去食品街还更有吸引力。

民族市场很大，有棚，有摊，也有店铺。这里最吸引人的，除土产哈密瓜、葡萄干外，就属小花帽和民族刀了。

进了民族市场，简直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我们一行六人，个个兴致勃勃又眼花缭乱。进市场没几步，有一间小店很是别致，门面不大，但装潢典雅，透着艺术。我们几人并未商量，便鱼贯进了店门，立时把个小店挤得水泄不通。店主人是个小青年，眉清目秀，面皮白皙，络腮胡虽然刚露小苗，但可以预见他将来必是一位“美髯公”。他戴着一顶小花帽儿，见我们进屋，躬身而立，操着很不流利的普通话，热情招呼我们：“朋友，请！朋友，请！”

店里两侧四只柜橱，中间横放一个玻璃柜台，里面摆放的是各色各样的民族刀。刀柄上都镶嵌着红红绿绿的宝石；刀鞘一律牛皮缝制，上面轧出花纹；拔出刀子锃光闪亮。看上去哪一把都值得买回去

自己收藏或送朋友留念。店主人拿起一把，用手在刀面上一抹，说："英吉沙，真正英吉沙！"来乌市前就听人说，新疆的英吉沙以制民族刀著称，好比北京的王麻子菜刀，杭州的张小泉剪子一样，都是老百姓认定的"名牌"。

我们几个边看边议论，店主人突然眼睛一亮，兴奋地说："北京？你们北京人！"我说："是呵，你去过北京？""没有！"他双手一摊，似有无限遗憾，但很快又兴奋起来，那话像是一句一句蹦出来的："哥哥，北京学医，眼科，大学！哥哥说，北京很漂亮，北京人好！"

真有点他乡遇故知之感！我们同去的一位长得透出机灵的年轻人，被店主人的亲切热情所感动，或许也是被想省几元钱的心理所趋使，搭讪说："那咱们也算是半个老乡喽！"店主人笑着点头："当然，当然！"我们的年轻人进一步上前"套瓷"："那我们多买几把，价钱便宜点儿可以吧？"店主人毫不含糊："好商量！好商量！"

看到价格有可能受到照顾，我们便七手八脚，各据所好，各取所需，最多的挑了五把，我居中，选了三把。小店主始终兴奋地看着我们，等大家挑选完毕，他

说："别人，一把八元；你们，北京朋友，七元！"说话时显出很是慷慨的神态。我们如数付了款，兴冲冲走出店门。店主人彬彬有礼送出门来，脸上亲切的笑容，始终不减。

"今天出门大吉！"我们的那位小伙子得意地说，"遇上个哥哥在北京念大学的就省了好几块，若是碰上个真老乡，兴许就半价了！"

"朋友，买刀吧！英吉沙！"我们正边走边高兴地议论着，冷不丁被旁边一个大嗓门的吆喝声吓了一跳。看那摊商，身高膀阔，圆圆的大脸上满是胡须，一只大手攥着十来把民族刀。见我们木呆呆站在了他的摊前，便把手中的刀向摊案上一撒，堆起笑脸说："朋友，真正英吉沙，买几把作纪念！"随着，又快捷地将一把一把的刀子抽出刀鞘，摆放在我们面前。

我一看，与我们刚才在那间小店买的一模一样，便问："多少钱一把？"那大汉一转眼珠，显然是在盘算开多少价最有吸引力，然后，狡黠一笑："六元五！买五把，再送你一把！"开的价，比我们受"照顾"的交易每把还低五角钱！

我们六人相对而视，沉默无言。想笑，但又谁都笑不出来；可也没哭！只有

跟小店主“套瓷”的我们那位年轻人，显得比别人多了一点不自在。

（1992 年）

敦煌感言

敦煌文化，以其精美绝伦和历史悠远而享誉世界。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和旅游业勃兴，敦煌文化更为国内外众多的旅游者和学者专家所倾慕。因其如此，如何把敦煌建设成与敦煌特有文化相匹配的、与国内外旅游者需求相适应的文化敦煌，就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课题。

作为一个敦煌文化的倾慕者，我曾于去年8月浮光掠影地享用了敦煌的古老文化，同时也领略了敦煌的现代文明——现代设施、现代服务、现代经营、现代文化……但在陶醉之余，我又不无遗憾地感到：敦煌远未建成可与敦煌文化相称的文化敦煌。

敦煌市内有一家颇具规模的工艺美术商店，店堂装饰富丽堂皇，商品陈列琳琅满目，然而看上去，却总觉得不够味儿。什么味儿不够？文化味儿！艺术味儿！古老传统味儿！一只玻璃柜台里，堆了几十条做工精致的玛瑙和岫玉项链，看上去像是要“论堆儿撮”的处理商品，然而一问方知，哪一条也价值上百元。在另一柜台里摆放的是毛笔，其中不乏能为书家称道的名牌精品，然而也长短粗细、不分优

劣、杂乱无章地堆在里面。好像这里卖的不是中华文化特有的书写工具，倒像是农贸市场上的大葱！我当时想，炊具店里卖筷子的还要十双一把，裹以商标纸或绸缎条，何况兼有书写工具和艺术品双重功能的毛笔？

敦煌有不少专卖以敦煌艺术为主题的工艺美术品商店，但大多质低而价高。敦煌博物馆内有个展销会，壁上挂着两幅约三尺宽六尺长的壁画摹品，标价高达 2 万元。高昂的价格引得我伫足端详，却看出了一点惊人之处：如此昂贵的艺术品，竟然用四只图钉摁在墙上！画的四角，已经被图钉穿了好几个眼儿！我真怀疑这两幅画作价值几何？若果真价值逾万，谁人舍得用图钉穿孔？至于某些个体商贩，专以质次价高商品充斥文化市场，对于敦煌形象的损害就更大了。

敦煌正朝着旅游开放的城市发展，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都十分有利，建设有特色的文化敦煌，任务迫切而艰巨，这需要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们认真筹划，精心设计，并且采取一点“走出去、请进来”的有效措施，以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敦煌建设成与敦煌文化相称的文化敦煌！

（1988 年）

品石七味

彩　球

长岛有个月牙湾。月牙湾是用绚丽多彩的球石铺成的。这不是哪一些人或哪一代人所为，这完全是大海的杰作。

大海像一台巨型的球磨机，把七棱八角的石块陶冶得浑圆；大海像一位天才艺术家，把石块精雕细绘成奇妙的彩球。

——正是这无数的彩球，又幻化出无尽的画意与诗情。

变　幻

透过清彻的海水，看到的是一滩珠玑，一滩斑澜，一滩瑰丽，一滩神奇……

海潮退去，球石渐渐脱掉了水的外衣。于是，斑斓开始减色了，珠玑也失去了光华，瑰丽与神奇也仿佛蒙上了一层晦暗的面纱。

潮水愈退愈远，太阳愈晒愈烈。于是，留下的只剩一滩灰暗的石块，虽然还都是圆圆的，但已没有了刚才的光彩，刚才的灵气，刚才的魅力。

妙的是，这个变幻只发生在顷刻之间，而且近在咫尺。你能说清吗？哪是这长岛石的本色，哪是这长岛石光辉的顶点？

看来，一切的一切，都会因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美亦如此。关键是要把握时机，把美留住，不仅留在眼里，而且留在心中。

渔　妇

一位黧黑面庞的渔妇，劳作之余坐在海边休闲，对着迷恋在月牙湾海滩上的游客们，不无揶揄地说："这么多人，整天在这儿挑来拣去的，可图的个啥呢?!"

一位戴深度宽边眼镜的小伙子，认真地回答说；"美！图的美！"

"美？美个啥？还不就是一滩石蛋蛋！"渔妇谈吐间向小伙子投来不以为然的一笑。

——同样一滩彩石，有人看成珠玑，有人认作美玉，有人看成不值一顾的石蛋蛋！

童　稚

一群十来岁的学童，雀跃着，欢呼着，扑向海滩。

"呵，多么漂亮！"

"呵，多么神奇！"

"呵，多么绚丽！

"若是搬到北京的奇石展览会，这海滩的每块球石，一准都是艺术瑰宝！"

"那故宫的珍宝馆为什么不建到这里

来？”

“珍宝馆的珍宝再多，也没有这里的球石多呀！”

“珍宝馆的东西谁敢动一根毫毛？可这里的球石随便挑拣。”

——孩子毕竟是孩子，天真得可爱，可爱得又太天真！

慧　眼

这是一场无人组织的自发比赛。

各人拿出自认为最好的一颗球石，在一起展示评比。

“我这上面的图案酷似一头骆驼！”

“我这上面是一枝红梅！”

“不夸张，咱这是一幅关山月风格的山水画。”

“我这儿有一双维纳斯式的美乳！”

“快中秋节了，我这儿有一块自来红月饼！”

轮到她了，含蓄地一笑：“我这是一首诗。”

一只又圆又扁的淡黄色球石，横着一条淡绿色的曲线，竖着一条乳白色的直线，曲线上悬着一颗圆圆的大红点。

有人蹙起眉头，有人睁圆双眼，看看石，看看她；看看她，又看看石。没有人评论，没有人褒贬。

她看看石友们，仍是淡淡地、不经意地说："唐朝人王维，有一首题目叫《使至塞上》的五言律诗，其中有两句正是这个意境：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人们在展示着石，同时也在展示着自己。

石　缘

三位爱石者，整天在海滩上寻寻觅觅，执著顽强不亚于海滩上的坚石，但几天里谁也没有觅到一块可称满意的石头。尽管别人和他们本人都认为，这三位对石都有爱癖，而且颇具审美眼光。

大家认为最没有艺术细胞的他，却无意中捡到了一块大家都为之一惊的美石。

于是，赞美声、钦羡声不绝于耳，甚至有人提出愿以重金求让。他却站在一旁一声不吭。

于是，人们从夸赞美石，转而围着他夸赞起来："独具慧眼！独具慧眼！"

三位爱石者，更是问个没完，简直像个记者招待会。

"你是自己发现的？"

"你是在哪块海滩捡到的？"

"别保守，透露一点嘛！"

却见他，慢条斯理、漫不经心地说："坦率地说，我告诉你们多仔细也没用。

世间有些事，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这或可叫做缘分。在这里，我只想对各位说，祝大家好运！”

我　想

看着这石、这人、这情、这景，我在想：生活不也是如此吗？

看不见美，把什么都看得平平淡淡、索然乏味，那生活还有什么情趣？然而，把什么都看成美，都理想化，那也是一种幼稚病！

人生必须有所追求——正当的追求，不然生活还有什么意义？追求愈执著，可能得到的回报亦愈多。

但也不可强求。因为好多美好的事情，都是应运而生的。时机不到，一切执著可能都是徒劳……

（1996年）

台北野柳奇岩

野柳是台湾北部海岸金山与万里之间一个狭长的海岬。这里约 50 公里的陆地上，有二十几组奇岩怪石分布其间，如同一座天然奇石博物馆，堪称世界奇观。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海岸的岩层上雕琢出多姿多彩、奇形怪状的杰作。有的如大象浮于水面，有的像巨鸟飞奔天空；有的如海龟爬上岩石，有的像鲤鱼跃上海岸；这里有一组“豆腐块”，那时摆一支“仙女鞋”……数量最多的要数“菌状石”，有 180 个之多，且集中于一处。菌状石状如蘑菇，一支支黄色的锥形石柱支撑着一个个褐色的礁石样球体，煞是好看。

菌状石群中最好看的当属著名的“女王头像石”了。这石高近 4 米，侧面望去，那高贵华丽的皇冠，那端庄俊俏的面部轮廓，实在是惟妙惟肖！据分析，菌状石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深浅岩层的硬度不同，在受到海浪和海风侵蚀后，便出现了上大下小、形态各异的天然石雕了。

可与女王石比美的是“烛台石”。此石略成圆锥体，上细下粗，直立地面，顶部中央嵌一石灰质圆头，周围有环状沟

槽。烛台高者达两公尺，直径粗1公尺有余。因其形状，亦有称其为“巨乳石”者。烛台石的形成较菌状石更为复杂。可以说它是海水的长年反复冲刷、激荡回流和岩石自身的钙化和风化，这诸多因素的矛盾统一体。

野柳因地处偏僻，多年来不被人们所识。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始辟为风景区；70年代末，设台北县野柳风景特定区管理所，规划、建设、保护遂走上了轨道。但这里的管理是开放式的，所有景点都不设围栏、棚罩之类，游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景点间穿行，零距离观赏。出于对自然生态和游人安全的考虑，只规定“禁止游泳、戏水；珍贵植物、花草、贝壳、奇石等不得任意挖掘、取走”。徜徉其间，给人以宽松和谐、拥抱自然和被自然拥抱的感受。我曾担心地向有关工作人员询问：尽管没有人为的破坏，如果任海水海风侵蚀，这里的奇石景观会不会终有一天要失去今天的美丽，甚或完全消失。我得到的回答竟让我吃了一惊：这些奇石本来就是大自然赐给的，有朝一日如果真的消失了，那就是自然的回归，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说不定海水海风又为我们雕凿出更好看更奇特的新景观来。

啊，是我多虑了，因为自然辩证法本来就是如此嘛！

(2002 年)

九族村记

过去，人们习惯地称台湾同胞中的少数民族为“高山族”，皆因其多居住在高山之故。但这一称谓不能恰当概括台湾少数民族的特点，且易引起误会和歧见，所以现在通称为“原住民”，而原住民中的各族群，又各有其名。九族文化村即是集中展示台湾原住民各族群生存状态和生活特点的场所。

九族文化村坐落在台湾中部的南投县，距著名的日月潭仅6公里。它名为“九族”，实际上是十个族群集于一村。他们是：达悟族、阿美族、泰雅族、赛夏族、布农族、卑南族、鲁凯族、排湾族、邵族和邹族。达悟族世居兰屿岛，是台湾唯一居处海岛的原住民；阿美族是人口最多的台湾原住民，而邵族则是居住在日月潭畔的人口最少的原住民。九族村里展示的这些原住民，大都是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女人巧于织布，男人工于木雕。看来，具有少数民族特色和民俗风味的制品最受青睐，大家有的请红木佛像，有的买黑檀木雕，都是满载而归。

建筑在湖水中间的娜鲁湾剧场每天2—3场演出，表演的都是原住民的歌舞，

向人们展示着力与美，表现了原住民的细腻与粗犷，神秘与坦诚。每场演出，都是全场轰动，有时演员走下舞台，与观众共舞；有时请观众上台，和演员同声歌唱。整场演出，台上台下欢声笑语不绝于耳。终场落幕，观众仍恋恋不肯离去。

台湾原住民保持着他们的少数民族特色，但他们绝不是自我封闭的民族。九族村里伫立在万山神石下方的图腾柱群，是加拿大印第安人的杰作；罗马喷泉、巴洛克钟楼、集合式花园等则是典型的欧式风格……这一切表明，台湾原住民是个开放的少数民族。

九族文化村还是个大游乐场。你可以登上“爱之船”悠闲自在地游荡于长河，也可以坐上悬吊式飞车遨游于太空；你可以坐上“UFO”感受飘行云际的快意，也可以登上空中缆车在距地面几十公尺的高度，欣赏自然的山林之美。当然，对这些充满了冒险与刺激的游乐项目，我只能做个旁观者，因为那全是给青年人开辟的“快乐大本营”！

（2002 年）

阿里山神木

“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我对阿里山的第一印象，是从这首歌得来的。可以说是十分美丽却又十分抽象。此次赴台参访，亲身游历了阿里山，感受就大不同了。

阿里山位于台湾中南部的嘉义县境内，主峰大塔山海拔 2663 米。这里气候温和，四季有花。冬季山顶白雪皑皑，山下却秋色一片，枫叶火红。据说，二百多年前原住民里有一位名叫“阿巴里”的酋长，英勇善猎，经常带领族人到现今之阿里山捕捉野兽，且每每都是满载而归。族人们为了表达对这位酋长的感念，就把这座山称作阿里山。

我们住进阿里山腰的阿里山宾馆，已近下午四点。大家放下行李，穿上租借来的皮衣，便赶忙进入森林去看神木。神木群，是阿里山的一个重要景点。但见那一棵棵参天大树，突兀地伫立在群树之中，给人以鹤立鸡群之感。神木是生长在阿里山的一种红桧，树龄都在千年以上，有的已逾三千岁；树高有的竟达五十米开外，而树围一般都有六七米粗。有一棵“三代

木”是红桧树的“三世同堂”。第一代的树基上生出了第二代，第三代又在第二代的树基里生成，且树龄亦在千年以上。三代红桧源于一根，告人以历史的沧桑与连绵。可以说，这里的每一棵神木都是一件文物。十五年前，邻近森林铁道的一棵神木突然通身劈裂，一少半横卧在铁道上。一年后，人们把那活着的多一半也锯断放倒，为的是让它“回归自然”。这种崇尚自然的态度，不失为一种别样的大气与豁达。可惜的是，偌大阿里山上，那本来曾经分布在漫山遍野的红桧，都被当时占领台湾的日本侵略者盗伐了。这仅存的二十来棵神木，当是日本鬼子投降前未及掠走的吧！

去祝山看日出，是阿里山的又一景观。凌晨四点半即起床集合，乘汽车至神木车站，再转乘 20 分钟的森林小火车即抵祝山车站。攀山路步行十余分钟，便登上了祝山峰顶。这时，晨曦乍露，山色清明。山上晴空万里，远山近岭层次分明；山下云雾升腾，当地人谓之“山岚”。这使我想起读过的一幅对联，道是：“暮霭朝岚常自写，侧峰横岭尽来参”。不正合这般的意境吗！六点半整，只见一团刺眼的强光，从镶着金边的对面山顶突然迸射

出来，居然看不出这里旭日是什么样轮廓，也看不准它是什么颜色！我在泰山之巅看过云海日出，那云蒸霞蔚烘托出一轮红日，又圆又大；我也在北戴河“鸽子窝”看过海上日出，那金色的太阳把波涛汹涌的大海照耀得更加气势恢宏；我还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看过草原日出，那桔黄色的太阳有节奏地跳出地平线，绿色的草原立时罩上了金黄色的纱装。我本以为今天观日出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未曾料到，此时此刻在祖国宝岛的阿里山，却又领略了一番日出新景！

（2002 年）

槟榔小屋

从台北到台南，几天的旅程里，所经之处都可看见道路两旁密集的槟榔小屋。其密集程度没有哪一种行业可以和它相比。那小屋名副其实，一般的只有一两平方米，三米见方的就是“大型”的了。虽是小屋，但装修的档次却差异很大。有的只是四根木棍支起的小棚铺，有的却是塑钢门窗，三面透明。那小屋都有一个很动听的店名，如阿春、阿秋、阿星、阿月；有的则蜜意柔情，带着酸溜溜的味儿，如俏佳人、黑珍珠、俏宝贝、海棠红、甜蜜蜜……小屋里卖槟榔的，多是妇女，中老年多是常人打扮，年轻姑娘们就不同了，大都打扮得花枝招展。更有不少只着泳装，袒胸露背，十分妖艳。导游说，槟榔小屋并非色情场所。起初卖槟榔的没有这种打扮，随着槟榔市场的日益扩大，竞争也日益激烈，人们发现打扮得俏一点，生意要好做一些，所以槟榔辣妹就应时而生了。近来，台湾也像大陆一样在搞扫黄，舆论界对“槟榔辣妹”的穿着非议很多，一是认为有伤风化，再是容易分散行车司机的注意力，影响交通安全。一些地方因此而比较收敛了。但为了生计，许多店铺

依然如故，卖槟榔的小姐还是“三点式”打扮。

正说着，导游突然叫停，汽车嘎然而止。只见导游敏捷地跳下车，走进了一间装饰华丽的槟榔小屋。小屋里的姑娘，浓妆艳抹，长发披肩，喜笑颜开和导游说着什么。不一会儿，那槟榔小姐拿着两盒槟榔，轻快地走上我们的汽车，向大家分送槟榔。小姐带着手套，肩上臂上纹着彩绘，落落大方，笑容可掬，全无半点媚态。

细看那槟榔青绿青绿的，很像那未熟的青杏。中间开一小口，嵌入一小块果脯样的东西。待小姐下车后，导游才发现大家都是一只槟榔在手，谁也没吃。便说，台湾有许多人喜食槟榔，年销量极大。特别是重体力劳动者，吃槟榔可以增加热量。槟榔里夹的那一小块是中药甘草，既可调味，又可健身。大家不妨嚼上几口，感觉一下。我们一行大多数人没吃过槟榔，在导游的动员下，互相观望着，谁也不肯动嘴。直到导游把槟榔放到自己嘴里大嚼起来，大家才慢慢地跟着咬一口，嚼几下。我是想认真体味一下吃槟榔的滋味，所以把槟榔放到嘴里，便不顾后果地大嚼起来。开初，只觉淡而无味，继而便

觉身上发热；不一刻，更觉头晕脑胀，状如醉酒。过去读苏东坡“两颊红潮增妩媚，谁知侬是醉槟榔”，并不太理解，现在经过亲身体验，算是明白了许多。显然，有这种感觉的不光是我一个，因为喊头晕的已不只一两位了。导游笑着说，没关系，一分钟就会过去，对身体不会有什么害处的。果然，我吐出嚼了几口的槟榔，眩晕的感觉很快就消失了。此后，全车人围绕着吃槟榔的话题，说笑了好一阵子。

这时，不知谁从身后传给我一个盛有半盒槟榔的纸盒。那盒子的封面上印着穿艳装的槟榔小姐照片，而艳照旁边却印着一行十分吓人的文字，是卫生当局的“警告”：“吃槟榔会引起咀嚼功能障碍及口腔癌”。我想，当地的人们一定都知晓这一警告，但多数人也一定是照吃不误。否则，便不会一路上见到那么多的槟榔小屋了。这就像许多纸烟盒子上都印着“吸烟有害健康”一样，世界各国包括我国的烟民，似乎并没有因为这一提示而日见减少！

我把装槟榔的纸盒拆开，按折印折好保存起来。我想的是，或许哪一天，槟榔盒会同纸烟盒（烟标）、火柴盒（火花）

一样，被人们竟相收藏。那时，我的这枚“槟榔标”就会成为有特别意义的藏品，因为她来自祖国的宝岛。

（2002年）

巴黎得贝

自巴黎出发，乘大轿车到三百公里外的一个小镇，去参观一家有六十年历史的面包生产厂家。参观后，即去镇上一家不大的西餐馆吃午餐。餐馆主人是一对三十多岁的年轻夫妇，热情好客。午餐算不得丰盛，但鲜美可口。鲜嫩的牛排，喷香的炸鱼，焦脆的马铃薯片；漂亮的甜点，还有干红葡萄酒、干白葡萄酒。

用过午餐，大家坐在那里喝咖啡，聊闲天。我则想在餐厅里参观一下，无意中发现柜台上摆着一个竹条编成的大盘，里面放满了一块块还挂着红色泥土的海生物化石，小的如现在的青蛤，大的似蜗牛状，直径有 20 厘米。

我偶尔集石。在南京买到过五彩斑斓的雨花石；在贵州黄果树采集过海贝化石；在大连棒棰岛遇到过一块光芒四射的“太阳石”；在山东长岛，第一次去拾到过惟妙惟肖的少女头像，第二次去集石虽无大收获，但却“采”出了一组散文《月牙湾石情》。今天，在远离祖国的法国小镇有此“艳遇”，我当然感到兴奋，便通过翻译问女主人：“这化石什么价格，本人有兴趣想买一块作为纪念。”女主人告：

“是从附近田地里拣拾的，属非卖品。”然后笑着指着我说：“如果这位先生喜欢，可以送给他一块，但只能送给他一人。”意思是不能全团三十多人每人都送。我不知如何作答，因为是非卖品，当然是要作为礼物送给我了，那我该如何答谢？因为是来餐馆吃饭，不可能随身带着礼品呵！我正犹豫不决，女主人又对翻译说：“但我有个条件，就是请这位先生为我们的贵宾留言簿题写几句话。”随手即从抽屉里取一个十六开大小，装帧考究的簿子。我接过细看，那真皮的封面上还烫着两行金字，里面已经有十来位客人签名题字，女主人说：“这个留言簿已经有不少尊贵的客人题了字，但你是题字的第一位中国客人。”

我见她对中国似乎很有感情，便掏出笔来在簿子上写下了如下的字：

“小镇餐馆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十分感谢主人的盛情和美餐。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女翻译为餐馆主人作了笔译，男女主人看后都很高兴。男主人握着我的手说：“我的妈妈，去年去过中国，去过北京。北京很好，很热情！”我说：“欢迎你们夫妇也能到中国、到北京去，我们也会热情

地接待你们!"

两位主人示意要我随意挑选。我从盘子里拣了一块不大不小的扇贝化石，征询主人意见。两位主人都用手势表示了赞同，女主人还用餐巾纸为我包好，递到我的手里。团里的同志都为我高兴，并为我和两位主人在那摆放着化石的柜台前照了合影。

（1997年）

参观卢浮宫的联想

参观巴黎卢浮宫，着实令我惊喜。馆内藏品之丰富，档次之高超，保存之完好，堪称世界水平。然而更令我吃惊的是，卢浮宫的一些上乘藏品，竟有那么广泛的知名度！

在赴巴黎途中，参观卢浮宫就成了大家的主要话题，许多人知道“维纳斯”，知道“蒙娜丽莎”，甚到熟知“最后的晚餐”的典故。我们一行三十余人，来自全国各地，文化层次高低不一，生活阅历深浅不同，但为什么都或详或略地了解这些西方古典艺术品呢？想来想去恐怕得归功于人家的对外宣传。

我不认为“炒作”是宣传传统文化艺术品的最好办法，但外国舆论善于不断寻找新的视点开展传统文化宣传这一作法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比如，前几年意大利比萨斜塔出现倾斜危机，后来政府出资抢救成功，一件事的两个阶段，都曾成为世界报道的热点，我国的大小报纸，包括“内参”，几乎都发了消息并配发照片。今年四月我去巴黎访问，正赶上巴黎圣母院进行修缮。回国不久在我们的报纸上就看到消息和照片：巴黎圣母院修缮完毕。一个“蒙娜丽莎”，人们

从新闻媒体上可以不断得到有关她的新信息，包括一些无聊的考证：一会儿是医学专家从画像中看出蒙娜丽莎得过什么病，一会儿是有人分析画中人物就是画家的情人某某某，更有人说画中人实际是画家自己形象的幻化，等等。这些信息对也罢，谬也罢，反正“蒙娜丽莎”是更广泛地深入人心了！至于维纳斯女神的塑像，我国的许多工艺美术商店几乎都可以买到，作为装饰艺术品的维纳斯雕像，更是已经深入到了许多普通市民的家庭。

代表国家水平的外国艺术佳作在中国传播以至普及，是件好事。它标志着中国国民文化艺术素质的提高。但值得思考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如何向世界更多更广的交流，在世界上占据她应有的一席之地。

中国是举世公认的文明古国，具有世界上许多国家无与伦比的文化艺术宝藏。但许多艺术珍品却鲜为人知。这种反差的形成，不能不认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与我们对外宣传的力度不够有关。就以首都北京来说，长城、天安门、故宫、天坛、房山周口店猿人遗址……这些古代建筑、历史遗存，其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绝不亚于许多国家的名胜。且不说故

宫那珍宝馆、绘画馆、陶瓷馆、钟表馆……珍藏着多少件奇珍异宝，单说那宫廷建筑本身，也足令人叹为观止了！但她的知名度与巴黎的卢浮宫、凡尔赛宫相比，其深广程度恐怕就有距离了。

许多优秀文化遗产对外宣传不够，恐怕又与对内宣传不够关系很大。中国的百姓，许多人知道有个唐伯虎，但那是因为有许多关于唐伯虎的民间传说和有个闹戏《点秋香》的缘故。许多人眼中的唐伯虎，顶多是个风流才子的形象，并不知唐寅（字伯虎，1470—1523 年）以其画作与沈周、仇英、文征明并称“明代四画家”；以其诗文与祝允明、徐祯卿、文征明并称“吴中四才子”。许多人知道郑板桥是个大书画家，然而更多的人只是把他和那个被人曲解得与字面一样糊涂的“难得糊涂”四个大字联系起来了。有几幅古典名画的获得普及，还得归功于邮电部，如不是先后发行了《簪花仕女图》和《韩熙载夜宴图》邮票，这两幅唐和五代时期的佳作，恐怕至今还闷在藏室里。看来，对内宣传搞好了，人人都可以作祖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那时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就会有个新局面。

（1997 年）

神圣的科隆大教堂

德国的法兰克福是我们赴西欧访问的第一站。第二天，便从法兰克福去了科隆，主要目的是参观科隆大教堂。路上，代表团的导游告诉大家，科隆大教堂始建于十三世纪中叶，历时百余年才初具规模。二战期间，莱茵河畔的建筑被战火毁之殆尽，惟科隆教堂只小有损伤。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连敌对国也未敢将其毁灭。

离教堂还有一段路程，从车窗望去，那典型的哥特式建筑的教堂尖顶，已经赫然出现在眼前，给人一种庄重感、神圣感。加之那天阴雨绵绵，仿佛又为大教堂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才下大轿车，就见一名抱小孩的年轻妇女，朝我们一行快步走来，不容分说，把怀中的小孩拱手送向了走在最前边一位团员。那同志不知所措，忙用双手推挡。说时迟，那时快，一推一挡中，早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孩混在其间，伸手就向那位团员鼓鼓的衣兜掏去。大家看得真切，忙喊：注意，小孩掏你衣兜了！在大家的解救下，我们这位同志才幸免于难！那妇女没有得手，悻悻然抱着小的领着大的走开了。据团里的导游说，用这种方式向外国

游客扒窃，也是这里的一大景观。

教堂确是宏伟，两座线条挺秀的尖塔，高达150余米，从剥蚀的墙体看出，整座教堂全是石块雕砌而成。虽经几百年风雨，但神采犹存。它与法国的巴黎圣母院、英国的林肯教堂、意大利的米兰教堂，同是欧洲哥特式建筑艺术的代表作。走进教堂的拱形大门，更觉肃穆庄严。一尊尊神像，一幅幅圣画，一座座石雕，满目琳琅；天拱上的彩绘，玻璃窗上的彩块，与整个建筑浑然一体。在一尊高大而华美的圣像前，摆放着一大片排列齐整的燃着的蜡盅，一旁还放着许多未曾点燃的蜡盅，那是等待着人们或出于信仰、或出于好奇、或出于入乡随俗去一个个点燃。好比中国许多寺庙烧香要“摞香钱”一样，谁若去点燃蜡盅，也必须有所“表示”，但敬奉多少，似乎是没有神也没有人过问的。

走出教堂，细雨仍下个不停。我撑开雨伞，才走几步，就见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双手举着一张皱巴巴的报纸向我走来，和她并肩而来的，是一位十三四岁的姑娘。两个姑娘的装束使我蓦然联想起在电影里见到的吉卜赛女郎。我正思忖她们要干什么，忽见那大点的姑娘高举双手把摊

开的报纸朝我脸上糊来。我连忙后退躲闪，但接着另一位小姑娘也紧逼上来，而且一只纤手已经伸到我的怀里。我意识到“大事不好”，忙用手使劲捂住那装着护照和有限的几张硬通货的上衣口袋，高喊：“快来帮我！”身旁的几位同行者早已看明真相，连喊带拉，总算替我解了围。两个女孩子看看惊恐的我，若无其事地拉着手一蹦一跳地离去了。这半似抢劫半似戏耍的闹剧，着实弄得我啼笑皆非。

我回首望着那古老而庄严的大教堂，心里的滋味是涩涩的、怪怪的。我默默地想：神圣与荒唐，怎么竟只有一墙之隔！

（1997 年）

雅加达逛旧货市场

雅加达的旧工艺品市场，占了整整一条街，一家紧挨一家，至少有百十家店铺。说是店铺，实际上是就是沿路边搭建的简易棚铺，屋里没有空调，多数连电扇也没有。我们去时正值暑热天气，进店铺不到三分钟，便满头大汗，所以实在想进去看看的也只能是速进速退——此地不可久留！店铺的档次与北京的潘家园市场相似，但比起古玩城就差了许多，与琉璃厂文化街就更无法相比了。

所售商品虽与中国市场不同，但因为同属东方文化，看上去也不觉生疏。以铜制品、木制品居多，也有观赏石或古生物化石。铜制品有餐具、酒具、灯具和一般日用摆设，铜铸佛像等；木制品以雕刻为主，弥勒坐像，菩萨立像，还有佛手、寿星，也有现代风格的线条柔美的裸女，活泼动人的童子。有的店铺摆设许多海贝、贝雕制品。看上去大部分是旧货，也有不少铜、铝、木制品明显是仿旧，而且仿得不算高明。

有几个店铺里卖钱币，但多是日本过去年代的硬币。偶尔可以碰到中国钱币，多是宋、清圆钱，虽都是大路货，但价格

不低。一枚小平“开元”开价两美元，在北京市场上几块钱能买一大把的清道光、乾隆之类的钱，每枚要价也在一美元以上。有一处摆着满满一脸盆宋、清两朝圆钱，我抓了几把细看，竟无一可取者。

这里的旧货市场也有中国某些市场上可见的恶作剧发生。我从一个店铺出来，迎面过来一位身材瘦小的中年人，手拿一座一尺高的黑色人型木雕让我观看。我接过来一看，整体造型不错，线条流畅，比例得当。但开脸技艺实在不佳，故无心问价，便客气地送还给他。他伸过双手来接，但待我刚一撒手，他却装作没有接住一般，木雕往下落去。我心里一惊，难道这儿也有“碰瓷”的吗？但木雕将要落地的刹那间，他迅捷地一捞，又把几乎沾地的木雕拎了起来。他瞪大眼睛说：“若不是我拎起来，就一定要打坏的。你应该感激我，把这木雕买下。”我看出他是故意要敲我一下，便决定就是再好再便宜也不买他的。可能见我们是好几个人，他除去唠唠叨叨以外，再没使出别的什么伎俩。

无独有偶，我们中的两个女同志要买海蚌壳，一个年轻人拿出几个让她们挑。在没有选中送还他的时候，那年轻人再明显不过地故意“没有接住”，海蚌摔了个

粉碎，那年轻人立即要求赔偿，我们即与他论理。一会儿又过来几个年轻人，看上去明显都是一伙儿，我们不想也不敢再与他们继续纠缠，付给他三千盾了事。后来发现，像那样的海蚌壳，若在海边向渔民购买，三千盾可以买上三、五个。

我原只以为真正的艺术是没有国界的；逛了一趟雅加达的旧工艺品市场，方知艺术市场上的“花活”敢情也没有国界！

(1995 年)

卢森堡集币

刚刚迈进荷兰的“风车村”，就见一位金发碧眼的女郎手持相机对着游人拍照，而且不容分说，“咔嚓”、“咔嚓”拍个不停，等你反应过来，你的倩影早已几次进入镜头了。待参观游览完毕走出“村”门的时候，才发现在一处搭着遮阳篷的板壁上，挂满了游人的彩色照片。只要你留心看，保准至少有你一张，而且让你觉着摄影技术不错。喜欢吗？交钱即可以取走；若不想要，也没有人向你表示不满或遗憾。我戏称这是强拍而不强卖。

走进郁金香公园，迎面站着两位少女，身着华丽的民族服装，春风满面地向游人致意，手里举的是公园的导游图。导游图并不惹眼，两位少女的服饰和风采却引得不少游人驻足或与她俩合影留念。凡请求合影的她们都欣然允诺，但几乎与她俩一起照过像的都买了她们的导游图。妙的是，照不照像，或照了像买不买她们的导游图，她俩都一视同仁，一样给你以热情的欢迎和亲切的微笑。

巴黎的卢浮宫和凡尔赛宫，游人如云。绘画、雕塑、古代器皿，藏品极丰，称得上是世界级的艺术宝库。在这样的宝

库里遨游，没有译员和导游，是要大大影响观赏效果的。但如果都提供导游服务，恐怕馆力难以承受。为了方便参观者，宫里准备了几国语言的“导游器”，如对讲机一样大小，带上它，一路欣赏一路听，如同每人陪伴一位导游兼翻译。只可惜没有华语解说，给我们留下一大遗憾！

卢森堡大公国是个只有三十几万人口的国家，首都卢森堡市人口不到十万，但建城已逾千年。卢市始建于公元 963 年，当时名卢泽尔堡，即小城堡的意思，卢森堡即由此而来。它的货币与周边的比利时、荷兰等国家通用，而且据说卢森堡已经不再发行自己的货币，因而卢森堡的钱币在流通中很少能够见到。同行者中有几位钱币收藏爱好者，午餐时便相约着向餐馆的服务员提出兑换卢币的请求。服务员可能是向餐馆老板反映了，不一会儿不知从哪里“变”来了好几套用塑料布包装的卢森堡硬币，一套五枚，任你挑选。当然价格也相当可以，全套硬币面值折合不过两美元，但每套索价却要五美元。物以稀为贵嘛，藏友们心甘情愿地抢着掏钱。

我们一行曾逛过一家巴黎有名的免税店。进店门，一位说得满口流利华语的亚裔小姐便迎了上来。先领到香水柜台，一

样一样地介绍，一种一种地喷洒让你品味；又领到时装柜台，一件件地展示，一件件地帮大家试穿；又领到首饰柜台……整个商店转了一遭。难得的是你买不买一个样，导购小姐始终保持着那样得体的一种风格：热情而不勉强，让你对她有一种信赖感。

体验过这些服务，我曾简单地想：这一切不过都是利益驱动使然。利益机制不仅在发生作用，而且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进而我又想：如果是用诚挚、热情、周到的服务换取正当的利益，那对人对己有什么不好呢？这不正是正常的社会生活所非常需要的吗？

（1997 年）

各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

人们每到一地都想留下一些特别值得纪念的东西，这是人们共同的心理。于是，旅游工艺品便应运而生。什么样的旅游品最受旅游者青睐？回答当不会引起争议：最能代表当地特色的旅游品！

西欧诸国，可谓抓住了这个真谛，把旅游工艺品市场搞得各有特色，品种繁多，但又多而不滥。

去比利时布鲁塞尔，人们都要去看看“撒尿的小铜人”。因为这个青铜铸成的小孩雕像记述着一个古老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西班牙入侵者撤离布鲁塞尔时，策划用炸药把这座城市夷为平地。夜里，正当导火索燃烧着接近爆炸物时，一个小孩起夜到室外撒尿，正撒在哧哧冒烟的导火索上，炸药没有炸响，城市得以保全。人们把这个名叫马纳根比的小孩称作布鲁塞尔“第一公民”。1916年著名雕塑家杜洛斯诺根据传说创作了这尊只有半米来高但却是不朽的雕像。小铜人铜雕像建在市政厅大广场旁的一个小巷里。以此为轴心，向四处延伸，至少有上百家卖旅游品的小店，琳琅满目的诸多旅游工艺品中，最突出的就是“小铜人”，而来此的旅游

者最感兴趣因而销售最畅的也正是“小铜人”。“小铜人”规格不同，大的盈尺，小的不足寸；工艺水平各异，工艺粗糙些的价廉，精工细雕酷似原作的就要你多掏腰包。

旅游品特色最突出的当属荷兰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是个有名的港口城市，人口不过百十万，但每年的旅游者高达四五百万。在那里，有三种特色旅游品随处可见，那就是风车、木鞋、郁金香。

荷兰盛产郁金香。今年五一前后，北京中山公园曾举办过直接从荷兰运来的郁金香花展。但展品比起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公园来，那可真谓是九牛一毛了。郁金香公园的郁金香，品种不计其数，花色争奇斗妍，加之园林布置艺术高超，逛上一圈真觉没有看够。没看够不要紧，你随处挑选一件工艺品，可能都会看到郁金香图案。阿姆斯特丹郊外有个风车村，小桥流水，绿草红枫，一座座欧式的村舍，突兀地伫立着一台台风车，有的高耸入云，有的伸手可及，整个村落显得和谐宁静，古朴自然。于是，大风车也就成了这里的旅游品题材之一。最有意思的是木鞋。木鞋可能是荷兰人曾经日常穿用的，随着时代发展，实用品转化成了艺术品，在街市

上，曾见有几家小店专卖木鞋。鞋面是用整块木头雕成，各种颜色都有，以红、黄、白三色为多，鞋面上大多绘有花色图案。曾见有人在那里试穿，各种尺码齐全，但街巷里从未见有人穿过。看样子木鞋作为实用品的功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艺术品的功能却正方兴未艾。作为旅游工艺品的木鞋，品种很多，小的如钥匙链坠，大的比真鞋要放大多少倍。更妙的是，风车、木鞋、郁金香三种特色旅游工艺品不仅不互相排斥，而且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在让人分不出高低主次来。我曾在商店里选购了一只烧瓷的烛台，造型是一株盛开的郁金香，但烛台上绘的图案却是大风车。我还买过几只钥匙链，链坠是一只微型的木鞋，鞋面上的彩绘则是更微型的大风车和郁金香。

我们国家，特别是首都北京，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和传统工艺产品，为旅游工艺品的开发制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有关的部门和人士，如工艺美术品的开发制作部门和旅游工艺品的销售部门，工艺美术界的专家与工艺品的生产厂家，应该紧密联起手来，充分利用首都和古都的优势，以市场为导向，把旅游工艺品市场丰富起来、繁荣起来。要看

到，北京市每年的境外旅游者已超过二百万人，内地的旅游者已达六千多万人，这是个多么大的市场呵！而且作为祖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的北京，责无旁贷地应该为中外旅游者提供更多的最有中国和北京特色的旅游工艺品。

（1997年）

方继孝收藏故事

藏友方继孝兄继2000年与人合作出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墨迹》不到三年，又编著了一部《文人笔下流出的故事》即将付梓。足见其收藏之丰，研读之深，写作之勤！

出于藏谊，方兄将书稿送我先读并令为序。先睹可以为快，何乐而不为？作序则实属强我所难，但又友情难却，想来也只得从命。

方兄收藏始于集邮，后钟情于文化名人书札墨迹，几乎消费了所有业余时间和生活必需之外的工资收入。十几年下来，无论所藏数量还是品级，都可跻入此道大家之列。

本书收录著者所藏名人书札墨迹60余件，评点文章20余篇。可贵的是著者不是就书札论书札，或是如某些书信集编者那样，再加上几句对书札作者的简单介绍了事。著者是以收藏家的眼光和热情，解读他的藏品，加之他深厚的文史功底，论之所及，多有精譬之笔。论人，则学问道德同述，有褒有贬，爱憎分明；论事，则前因后果周全，娓娓道来，细腻动人；偶及书画之道，亦能评点有据，人情人

理。著者还在一些篇目中写到了某些藏品的收集之道，如滬上搜求严复团扇（《放眼世界的黄遵宪和严复》），以老股票易名人手札书画（《钟泰先生藏友人墨迹》），锲而不舍搜求陶行知先生墨迹（《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等，从中既可看到著者的收藏之苦，也可感受到著者的收藏之乐。读着这些篇章，就仿佛听到一个又一个收藏的故事，引人入胜又给人以知识和启迪。

藏海无涯。方兄正当盛年，时下又逢盛世，相信在名人书札墨迹的藏海里，一定会不断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2003 年）

后　记

这是20多年来我写作发表的有关收藏主题的散文结集。

我在上小学前后，即萌发了收藏的兴趣。不过，那时候不懂收藏，也不叫收藏，而叫“攒”。比如那时候我喜欢攒烟盒、攒烟画儿，把同一品牌的烟盒放在一起，什么“金枪”、“哈德门”、“粉包”、“兴亚”……比较、把玩；把烟盒里的烟画儿，也分类摆放，花儿的，鸟儿的，美人儿的，动物的，戏出儿的——实际是古典小说的连环画……我尤其喜欢戏出儿的，如《水浒传》，但从来也没有攒过一组整套的。十几岁又开始收集邮票，随便一枚信销票，哪怕缺齿短角，也视若珍宝。到了20岁，我已经是有几年工龄的排字技术工人了，业余爱好又转向了文学创作，开始发表小说，烟标、邮票就置诸脑后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先拾起了集邮，接着又恢复了写作。这时就有意无意地开始把集邮和写作结合了起来。90年代初，集藏的兴趣日渐广泛，从集邮而集信，由信札而旁及有关文艺文化界及文化人的文字信息资料，偶尔也涉及图书、钱

币、石头、旅游纪念品……似乎看什么都有点兴味。与此同时，开始有意识地把收藏过程中的所见所感、趣闻轶事随手写了出来，于是，就有了这些篇什。在文物出版社崔陟先生的支持鼓励下，又汇编成了这个集子。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收藏活动是我这本小册子的不尽活水。

二〇〇四年春月于江月阁